

炎黃春秋

第 10 期
2013年

中国市场化转轨之路

毛泽东与砸烂公检法

丁石孙：我在北大当校长

周扬与清除精神污染

亚纳耶夫的“最后一搏”

目 录

春秋笔	
1	毛泽东与砸烂公、检、法 尹曙生
7	中国市场化转轨之路 萧冬连
访谈录	
13	我在北大当校长 丁石孙 口述 袁向东 郭金海 整理
21	“文革”从华东局开始的三件史事 唐荣智 口述 金大陆 采访 孙路遥 王芳 整理
亲历记	
25	我参与起草《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郝怀明
33	周扬与清除精神污染 顾 嘉
38	我在西南联大读书 胡邦定
往事录	
41	两次长春之战与三位报人的命运 张 刀
46	蒋介石反贪枪毙孔祥熙亲信 杨天石
人物志	
50	韦君宜：革命与知识分子的标本 孙 郁
54	劳教难友巫宁坤 杜 高
57	黄药眠的“新民主主义观” 黄大地 张春丽
品书斋	
62	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艰难转向 王海光
67	苏联衰亡史的缩影——读《古拉格：一部历史》有感 唐少杰
沉思录	
72	小说“一句话”等六则 邵燕祥
77	平凡的刽子手 寿 石
怀人篇	
80	父亲陈企霞百年祭 陈恭怀
82	我和林希翎的交往 卢 弘
文荟苑	
85	古装传统戏：《讲话》前后的延安主流艺术 王克明
海外事	
90	亚纳耶夫的“最后一搏” 朱 正

顾 问

杜润生 于光远 李 锐

编委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 实	王俊义	冯 健	冯其庸	卢跃刚
曲润海	何 方	吴 象	吴明瑜	宋木文
张文彬	张岂之	张希清	张荣华	张惠卿
杜 光	杜导正(召集人)		李一蠡	李大同
李冰封	李步云	李宝光	李维民	杨天石
杨奎松	杨继绳(副召集人)		沈志华	苏双碧
陈 敏	邵燕祥	周瑞金	金冲及	胡德华
赵德润	保育钧	钟沛璋	郭道晖	资中筠
凌 云	展 江	徐小岩	秦 昕	袁 鹰
袁伟时	高 放	高尚全	陶斯亮	钱理群
章诒和	萧蔚彬	韩 钢	董 健	曾彦修
鲁 谦	雷 颀	魏久明		

社 委 会 杜导正(主任) 吴 思(副主任) 杨继绳

李 晨 徐庆全 胡竞成 张晓鸥

社 长 杜导正

法定代表人 常务社长 吴 思

副社长 杨继绳 李 晨

社长助理 胡竞成 张晓鸥 杜明明

总 编 辑 吴 思

副总编辑 徐庆全

执行主编 洪振快 黄 钟

总 经 球 李 晨

副总经理兼网络总监 张晓鸥

财务总监 胡竞成

发行部 孔 屏(主任)

办公 室 王海印(主任)

理 事 长 杜导正

副理 事 长 莊其環

李 琼

秘 书 长 吴 思

副秘 书 长 杜明明

主管主办单位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 (吴来赵阁律师事务所010-68083211)

步凌云 (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010-85869163)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100045

网 址 <http://www.yhcqw.com>

编辑部邮箱 yanhcq@sina.com

yanhcq@gmail.com

发行部邮箱 yhcqfbx01@126.com

电 话 发行部 010—68532048

编 辑 部 010—68534879

68523512

68539058

财 务 部 010—68525374

办 公 室 010—68522852 (兼传真)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印 刷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单本定价 8元 全年定价 96元

毛泽东与砸烂公、检、法

○ 尹曙生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发生过很多重大政治事件,影响深远。“彻底砸烂公、检、法”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造成的后果很严重,影响也很深远。本文就这一事件和毛泽东有什么关系,进行探讨。

毛主席说,听到砸烂公、检、法这句话我就高兴

从1949年共产党掌握全国政权开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爆发,毛泽东对公、检、法机关、尤其是公安机关是十分重视的,始终把它置于自己的绝对领导之下,别人不得干涉。由于文革前17年,公安机关在公、检、法三机关中一直处于老大的地位,检察院、法院实际成了陪衬,在“大跃进”年代,检察院、法院甚至一度被取消,只保留名称,其领导人带上公章到公安机关联合办公,以政法部的名义代替了公、检、法;文化大革命中,公安机关被军事管制,而检察院、法院被撤销了。所以我说毛泽东十分重视公、检、法,主要说的是十分重视公安机关,文革中提出的“彻底砸烂公、检、法”的口号,实际上就是“彻底砸烂公安机关”。

让我们来考察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毛泽东要(支持)砸烂公、检、法,主要是砸烂公安机关的历史事实:

1966年11月12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各地来京的造反派时说:“公安机关十七年来干尽了坏事,要打倒、要砸烂。”参加接见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中央文革领导。公、检、法,尤其是公安机关,是毛泽东直接领导的,如果没有毛泽东的首肯,她敢这么说吗?

1967年武汉发生“七二〇”事件,毛泽东受到围困,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脱离险境,安全到达上海。7月23日,谢富治、王力随周恩来飞回北京,受到英雄般的接待。江青亲自到机场迎接,并和周



文革初期的毛泽东

恩来、谢富治、王力合影,电视台当晚播出。接着,谢富治在公安部大礼堂向迎接他的公安部干部讲述处理武汉事件经过。会议结束后,他对公安部副部长李震、副部级政治部主任施义之说:“毛主席说,‘听到砸烂公、检、法这句话我就高兴’。你们要把这句话捅出去。我当面听主席讲砸烂公、检、法没有十次也有七八次。”李震、施义之当晚通过公安部造反派报纸《红旗》将这一消息刊登,并迅速传遍全国,立即在全国掀起砸烂公、检、法,主要是公安机关的高潮。谢富治是一个有谋略、有头脑、非常谨慎、圆滑的政治人物,他知道领袖的厉害,如果毛泽东没有说过这样类似的话,他是没有胆量敢假传“圣旨”的。

1968年3月18日,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中央领导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接见浙江赴

京汇报的代表时,江青诬陷说:“浙江省公安厅干部在叶群代表林副主席向毛主席汇报时,在屏风后头搞窃听、偷听和秘密录音(指的是1965年秋,叶群受林彪指派到杭州告罗瑞卿的状,导致罗瑞卿被打倒)”;“叶群走一步路,都有人盯梢,进行监视”;“公安机关用特务手段检查主席和我的信件,这是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比国民党还坏,是法西斯”;“要彻底砸烂资产阶级反动的公检法”。没有毛泽东的同意,江青敢这样公开讲吗?!

毛泽东要(支持)砸烂公、检、法最有说服力的直接证据是:1968年7月28日,他在召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红卫兵五大领袖时,当有人汇报谈到北京市公安局揪出很多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分子900多人时,毛泽东说:“提出砸烂公、检、法,我说好!”据韩爱晶记录,毛泽东还说:“实际上砸烂公、检、法是谢富治第一个(公开)提出来的,北京市公安局三万人,弄出九百几十个地富反坏右。因此提出砸烂公、检、法,三万人只剩百把十几人,其余进学习班”。当时在场的有周恩来、康生、张春桥、姚文元、陈伯达、江青、谢富治等中央文革成员。

1966年、1967年,在毛泽东的批准下,从军队选调兵团级干部1人,军级干部3人,师级干部10人,团级干部20人,以后还调进大批军队干部,进驻公安部,实际掌控了公安部的权力,公安部绝大多数干部被遣送黑龙江农场审查、改造。1967年12月9日,毛泽东亲自批发中共中央(67)379号文件,要求“凡全国公安机关未军管的,一律实行军事管制”。文件下发后,大批军人浩浩荡荡开进公安机关,95%以上的公安干警被集中下放农村改造。一直被称为党的刀把子的公安机关,像解放初期国民党的警察机构一样,被解放军接管。如果毛泽东还信任公安机关,能这样干吗?

为了寻找砸烂公安机关的理由,扩大宣传影响,对公安机关极尽造谣污蔑之能事。1968年8月9日,谢富治授权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主任刘革新,炮制了《旧北京市公安局反革命集团与美蒋特务勾结进行特务活动的一些情况的报告》,诬陷北京市公安局“长期与美、蒋特务勾结,进行特务间谍活动”;“死心塌地为美、蒋效忠”;“市公

安局的特务间谍活动是在刘、邓黑司令部的支持鼓舞下,在大特务彭真、罗瑞卿、刘仁的指挥下,遵照美、蒋旨意进行的”。这么一个荒唐可笑的报告送到中央,毛泽东看了,亲自批示:“请各地军管部门注意此类情况。”根据毛泽东批示,中共中央于10月7日以“中发(68)142号文件”转发全国。对这样一个充满谎言的报告,以毛泽东的睿智,他真的相信吗?可是他确实作了批示,而且要全国公安机关军管会,像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那样来调查类似问题,这就说明他老人家这时对公安机关确实不再信任了。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毛泽东是坚决要(支持)砸烂公安机关的。

在砸烂公安机关的两年多时间里,全国有3.4万公安干警受到打击迫害,其中被打死1200多人,伤残3600多人,被判刑1300多人。公安部5位副部长被捕,政治部主任隔离审查;罗瑞卿、谢富治的老搭档、二把手副部长徐子荣被捕后被迫害致死;未被逮捕的副部长刘复之、于桑在军人部长李震1973年10月20日自杀后,涉嫌被监禁。公安部正副司、局长49人中,有43人先后被打成叛徒、特务、历史或现行反革命分子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北京市公安局有1693名公安干警受到打击迫害,其中有225人被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包括10名正、副局长,117名正、副处长、分(县)局长,都被打成特务、叛徒、三反分子,47人被捕入狱。上海市公安局被砸烂后,有2980名干警受到残酷迫害,有78人被迫害致死,96人致残。浙江省公安厅666名干警,被审查、批斗298人,隔离审查88人,受处分74人。前任厅长王芳、现任副厅长吕剑光等6名干部被怀疑在毛主席住处安装窃听器,押解北京囚禁审查。全国203位公安厅、局长,所有的人都被审查、打倒过,有45人坐过牢,自杀、死在监狱里17人。

毛泽东为什么要(支持)砸烂公、检、法,特别是他亲自领导、关怀有加的公安机关?

公安机关是毛泽东亲自培育、领导下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在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上做出了重大贡献。解放后,中国大地上曾经一度出现过没有吸毒、没有赌博、没有卖淫嫖娼,刑事犯

罪案件很少,甚至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良好和谐的社会环境,受到国内外一致赞扬。但是,随着“左”倾路线逐步抬头,毛泽东在国内开展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必然要遭到抵制和反抗,社会治安出现动荡。毛泽东运用公安机关对这些抵制和反抗不断进行镇反(见《大跃进前后的社会控制》一文,载《炎黄春秋》2011年第4期),保证了这些运动能够顺利地进行下去,因此,公安机关也犯了严重的错误,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但是对毛泽东而言,公安机关是绝对忠实于他的,他没有理由不信任。

文革前的全国公安会议上,毛泽东多次与各省、市公安厅局长合影留念,以致不少其他部门领导人羡慕当公安机关领导。文革前,无论是罗瑞卿,还是谢富治当公安部部长期间,毛泽东对公安工作有过批评,曾经批评过“不像样子的公安局长”,但那是关心、爱护,从来没有说过、表示过要“砸烂”。文革一到,为什么突然要砸烂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原因:

一是政治斗争的需要。文化大革命主要目的是要打倒以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打倒刘少奇,首先拿他的得力干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开刀。而彭真是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直接分管领导政法工作;罗瑞卿更是直接管了十年公、检、法,当了十年公安部部长,影响很大。彭真、罗瑞卿被打倒了,他们直接领导的公、检、法,尤其是公安机关,就好比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难逃厄运。就像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被打倒了,中宣部也就成了“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是一个道理。彭真被打倒了,他主管的北京市委也变成了“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独立王国”,被彻底改组。罗瑞卿在文化大革命前夕的1965年底,就被打倒,并不是他犯了什么大错误,仅仅是因为和林彪有矛盾,而毛泽东为了发



1966年12月24日,罗瑞卿被批斗后,由四个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大汉用箩筐抬着,左脚缠着厚厚的绷带。

动文化大革命,需要林彪领导的军队全力支持,不得不牺牲他,而他当公安部部长达10年之久,如果不否定公安机关,也是说不过去的。

二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起来以后,各地的造反派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打的旗号都是要打倒本地区、本单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特务”,要从他们手中夺权。但是,公安机关广大干警长期受到的教育是要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对党不能有任何怀疑,各级党委就是代表党的,所以公安机关组织起来的造反派基本上是保守的,被称为保皇派,“奉命造反”,就是名曰造反,实际暗中保护“走资派”过关,等时局变了,在党委领导下抓右派,像1957年反右派斗争时一样。公安机关是专政工具,公安干警有组织性、有战斗力,还有武器,社会上不少造反派慑于它的威力,不敢轻举妄动,所以各级公安机关成了造反派造反的最大障碍,不清除这个障碍,文化大革命就进行不下去,因此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之后,公安机关首当其冲成了社会上造反派一致攻击的目标。但是,没有中央、没有毛泽东的允许,谁也不敢贸然夺它的权。文革初期,北京政法学院造反派要夺北京市公安局的权,但是谈何容易,他们请示谢富治;可谢富治也不敢擅自做主,只好请示周恩来同意,允许先夺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区公安分局

的权,作为试点,但是不久就被勒令造反派退出,由军队接管。1967年到1968年,正是毛泽东号召造反派全面夺权的高潮,公安机关却成了最大障碍,一些地方党政领导在公安机关秘密安排下转移,躲避造反派的批斗。青海省省长王昭,被造反派非法关押,公安厅干部将他秘密接走,送到洛阳治病,连中央想找他也找不到,后来还是公安部造反派奉中央领导命令,把他找到,交给中央。毛泽东为了文化大革命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顺利进行,就必须毫不犹豫地要(支持)砸烂公、检、法,主要是公安机关,以便清除阻碍文化大革命的障碍。但是他也担心会造成乱子,所以“砸烂”后,实行军管,没有让造反派掌管。要砸烂、要军管,就必须制造砸烂的理由,中央1968(142)号文件就应运而生了。其实毛泽东心里清楚,如果公安机关真的像文件上所说的彭真、罗瑞卿、刘仁(北京市委常务副书记、二把手)是大叛徒、大特务,勾结美、蒋,进行特务间谍活动,他能安全活到文化大革命吗?所以在1970年11月召开的第15次全国公安会议时,与会代表对彻底砸烂公安机关有意见,要求公安部领导解释,于是部长李震(原沈阳军区副司令,司令是陈锡联)以公安部领导小组的名义,直接写信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批示道:“砸烂公、检、法口号不科学,应该提公、检、法彻底闹革命。”这个批示没有说彻底砸烂公、检、法是错的,仅仅是说口号不科学。不科学就在于“砸烂”这个词难以理解。改为“公、检、法彻底闹革命”,就能理解了。就是说,公、检、法是有严重问题的,要革命,而且要“彻底”革命。“彻底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仍然是不信任公安机关。这从毛泽东亲自批准下发的《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纪要》上可以看出。“纪要”对文化大革命前17年公安工作进行了严厉批判,说刘少奇、彭真、罗瑞卿在公安战线上“顽固地推行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要彻底清除刘(少奇)、彭(真)、罗(瑞卿)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的公安路线”,“要彻底改造公安机关”。

把“彻底砸烂”变成“彻底改造”,意思是一样的,这样就合乎“科学”了。

三是毛泽东过去信任公安机关,文革爆发后不信任,并不奇怪。这时的毛泽东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疑神疑鬼,认为有人要发动政变,搞资

产阶级复辟。1966年5月16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毛泽东在这个通知中亲笔写道:“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的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林彪在5月18日的会议上,从历史的角度,大谈特谈政变经,杯弓蛇影,似乎中国有人正在企图搞政变、搞复辟,以呼应毛泽东的话。林彪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为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

要搞政变,一是发动军事政变,达到政权更迭的目的,而这时军队掌握在毛泽东最信赖的接班人林彪手里,他大可放心;二是利用秘密警察,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把领导人抓起来,实现政权更迭的目的。这样做,只有长期掌握警察大权的人有这个条件。彭真、罗瑞卿在公、检、法系统影响深远,文革一开始,他们就被打倒,其追随者会不会这样干呢?毛泽东是一个疑心很重的人,他有不安全感,并不奇怪。十月革命后,苏联秘密警察头子,除创建者捷尔仁斯基过早病死外,没有一个人有好下场,都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毛泽东对十月革命后苏联内部的政治斗争,十分清楚。文革初期,江青那样咬牙切齿痛恨公安机关,不能仅仅归结为她的个人恩怨,难道没有领袖的担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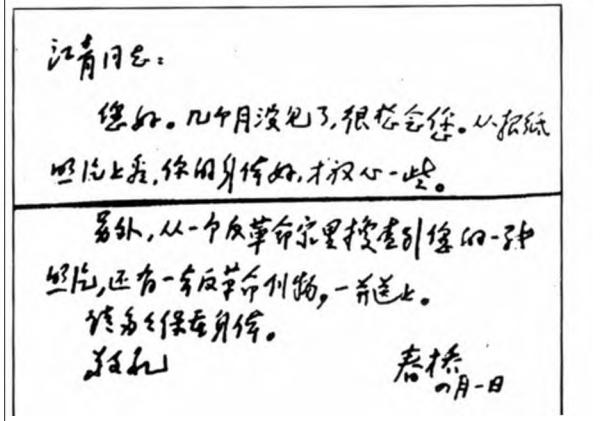
四是解放后公安机关接收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大量敌伪档案,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后,就成了一些人的心病,生怕有人从这些档案中发现不利于自己的材料。红卫兵抓叛徒、清理阶级队伍、专案审查,都离不开敌伪档案。所以公安机关受到“格外重视”,都想把公安机关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利用敌伪档案,抹黑对手,洗刷自己历史污点。这就必须通过夺权手段来实现。要夺权,就要先造舆论,抹黑公安机关,然后“砸烂”,乱中取利。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68年春,上海造反派发现江青30年代在上海的丑事,并编成

小册子散发。江青看到后哭哭啼啼地对周总理说：“这么搞怎么得了，看来是上海市公安局搞的（这时上海市公安局已军管，她说是上海市公安局搞的，实指上海市公安局原来的干警）”。然后由周恩来、陈伯达、江青、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等中央文革碰头会参加人，集体授权吴法宪到上海去收缴有关江青的传单、材料。吴法宪在张春桥的具体操办下，收缴了大量传单、小册子，并逮捕了搜集、编印的人，连同原公安局长黄赤波等人，一起乘专机飞回北京。材料封好，全部交给江青自己处理，人被非法关押起来。公安机关被军事接管后，组织大量军人清理敌伪档案，寻找所谓叛徒、特务，为中央专案服务。对刘少奇的定性是“叛徒、内奸、工贼”，材料就是从这些档案中找来，断章取义形成的。公安机关敌伪档案帮了毛泽东大忙，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分子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混进各级领导层呢！这样才能证明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十分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五是窃听器风波又起，公安机关成了重点怀疑对象，不砸烂不罢休。用窃听器搞窃听，是侦查工作的一项手段，国内外间谍、情报机关都利用这一重要手段。我们国家对利用这一手段有着严格规定：只准用于对敌斗争，严禁用于党内，而且有着严格的批准手续。江青污蔑公安机关对她和毛泽东使用窃听手段，是天方夜谭，荒唐可笑。

被渲染成窃听风波的录音风波，是从中央办公厅刮出来的，跟公安机关无关。1958年11月，毛泽东的机要秘书、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出于对领袖毛泽东的崇敬，感到有必要运用现代化手段“尽量把毛泽东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多次向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和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人汇报他的想法。最终毛泽东也认可这一做法，并对叶子龙说：“录音要搞个规定，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办机要室对录音范围和内容做出规定：“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央召开的大、中型会议和其他重要会议上的报告、讲话；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与地方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中央召开的电话会议；中央领导指定的需要录音的内容。”对这个规定，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主要领导看了，都签

▼ 張春橋 1968年寫給江青的一封信（節錄）



字表示同意。但是，毛泽东有些讲话不愿意录音。1959年11月，中央在杭州召开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谈到中苏关系问题时，关照大家不要做记录。胡乔木插话说：“还有录音呢。”毛泽东批评说：“是谁让录音的，搞这干什么？”叶子龙立即让录音员停止录音。叶子龙在回忆录中说：“从此，机要室就再没有自行派录音员跟随主席外出录音”。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61年1月至4月，毛泽东外出视察，在武汉停留期间发现在他的专列上安装的录音设备，没有拆除，录下了他和服务员的谈话。毛泽东大为愤怒，指示汪东兴报告中央书记处。中央书记处严肃批评了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给予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副主任康一民严重警告处分；给机要室副主任吴振英以警告处分，连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几个秘书也被牵连进去，受到处分。1961年5月17日，中央书记处批准了《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做出了关于中央和地方党政军群一律不准搞录音的五项规定。到此，录音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了。

五、六年过去了，再也没有人敢搞录音了。可是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后，早已解决了的录音问题，被重新提起，把这样一项正常的、曾经被毛泽东批

准的秘书工作的一个环节、一项业务工作,变成了公安和情报机关搞窃听,搞侦查,从而为打倒某些人寻找口实。杨尚昆首当其冲,他被打倒,一条重要“罪行”就是对毛泽东搞窃听。尽管给中央领导录音是中央办公厅所为,跟公安机关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把录音提升到搞窃听,性质完全变了,那就只有公安和情报机关才有资格、才有本事做这件事。文革前,国内反间谍侦查工作是公安机关的一项重要任务,对特务、间谍搞窃听,属于侦查工作的一项手段,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说公安机关对党和国家领导人使用这项手段,那就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北京、上海、杭州、武汉等地是毛泽东住过、去过时间最长的地方,比如杭州,毛泽东到那里去过40多次,住的时间很长,仅次于北京,仅1966年毛泽东就8次去杭州。因此这些地方的公安机关是重点怀疑对象。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1966年二、三月间,根据中央最高领导旨意,中央有关部门派出若干检查组到这些地方毛泽东经常住的宾馆、别墅,检查有无安装窃听器情况。副部长徐子荣被派往上海、杭州检查。其时他已经被怀疑是窃听中央领导的主人之一,派他去检查是在考验他。他在上海、杭州检查,没有发现在毛泽东常住的宾馆、别墅(如西湖边上的汪庄、刘庄别墅)根本没有安装过窃听器,参与检查的还有中央办公厅的人员。他从上海、杭州回北京后,谢富治不听他汇报,把他排除在公安部领导之外,不给他分配工作,不和他见面,文革一开始,就将他打倒。

尽管在“彻底砸烂公、检、法”的几年时间里,没有发现一个地方公安机关搞过这种违反党纪国法的事,但是被怀疑而抓进去的几十名公安机关领导迟迟不放、不审、不判,从精神上、肉体上进行折磨,有的人就死在监狱里,如徐子荣。上海市公安局长黄赤波因窃听罪1968年2月被秘密逮捕关押北京监狱,直到1975年释放,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精神、肉体都遭到极大摧残,十根肋骨折断,一身是病,1978年过早死亡,被上海市政府批准为烈士。他在公安局长任内,每次毛泽东、江青到上海,鞍前马后,为领袖夫妇的安全操碎了心,到头来被污蔑对毛泽东、江青搞窃听,真的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可悲的是,黄赤波在主政上海市公安局期间,同样以莫须有的罪名冤枉了很多人,但是,直

到他去世,也没有觉悟,没有丝毫悔意。1978年8月22日,他在《解放日报》发表题为“追忆罗部长对上海公安工作的关怀”一文中说:1953年4月,罗瑞卿部长到南京,把他找去,要调他到上海市公安局工作,“谆谆叮嘱我把扬帆包庇下来的、甚至混入公安机关内部的一批反革命特务分子进行严肃处理,消除了一大隐患”。是啊!当年他不负罗瑞卿的重托,在上海市公安局掀起了一场风暴,给闻名于世的“潘汉年、扬帆事件”大冤案火上浇油,大批干部受株连,以莫须有的罪名关押,有的死在监狱里。他曾经在上海市公安局干部大会上说:“扬帆是一只坏母鸡,生了一窝子坏蛋”,“打开来蛋黄都是黑的”;“我就是要搞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这就是阶级斗争”,“扬帆是一只大辣椒,还有小辣椒,辣椒面呢!”在他的这种思想指导下,株连无辜就成为必然,上海市公安局有600多名干警蒙冤入狱,有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他主政上海市公安局十年之久,没有主动纠正和向上级反映纠正这一大冤案。一直到1978年,“四人帮”已经被粉碎近两年,他还认为自己是对的,真是悲哀!同样,他的顶头上司公安部部长罗瑞卿,1955年5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亲自带领人员到北京饭店逮捕潘汉年后,并与副部长徐子荣一起亲自审讯,积极指导专案人员几十次审讯潘汉年、扬帆,审理“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尽管长时间找不到证据,不能定罪,他们没有主动纠正,也没有向中央反映,请求纠正,就这样把那些蒙冤的人长期关在监狱里耗着,把人耗死、耗疯、耗残废、耗得家破人亡为止。罗瑞卿、徐子荣、黄赤波等人奉命以莫须有罪名整人,可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们却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整,被抓进监狱里耗着。徐子荣被耗死,罗瑞卿、黄赤波被耗成残废,过早去世。到头来,他们都不过是在政治斗争中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的一颗棋子而已,是典型的现代版的“请君入瓮”,令人唏嘘不已。

历史一再证明,封建专制独裁体制不清除,“请君入瓮”的故事,还将会重演。“干公安的就好像在刀尖上跳舞”,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

(作者为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曾在青海省公安厅工作)

(责任编辑 徐庆全)

中国市场化转轨之路

○ 萧冬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之路,也开启了中国市场转轨之路。
图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会场。

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并不是从中国开始的,当中国上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自己的改革试验时,社会主义改革已成趋势。然而,由于受到普遍观念和既得利益的强大阻力,通过渐进改革实行市场化转型,鲜有成功的先例。中国的市场化转型没有导致经济衰退和体制崩溃,而且推动了中国持续 30 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出现所谓“中国奇迹”。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模式”的解释很多。一般都认为,中国改革与苏联东欧改革有“渐进”与“激进”之别。所谓渐进式改革,首先是先经济、后政治的改革次序选择,保证了政府控制改革进程和协调利益的政治能力。其次是经济改革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通过不断的试验逐步推进,允许不同选择进行竞争和比较,减少了掉进理性陷阱的机会。上世纪 80 年代的决策者有一个指导思想,就是改革要让多数人受益。改革措施的出台考虑社会的承受力,注重照顾各方面的利益,对利益受损实行补偿,避免了可能的社会震荡,争取了支持者。有学者认为,所谓“渐进”改革实质是一种“增量改革”或“体制外改革”,就是在计划体制的主体部分不能

作重大改革的情况下,允许和扶持集体企业、个体经济、私营企业、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的发展,这几种经济的所有制性质不同,但都处在计划体制之外,以市场为导向,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到 90 年代初,体制内与体制外两块经济几乎可以“平分天下”了,

这就造成了一种竞争态势,迫使受制于旧体制的国有部门不得不进行“制度创新”。这就是中国改革实际走过的路。

然而,苏联、东欧国家并非没有进行过渐进改革尝试,事实上,从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到 80 年代,苏联、东欧进行了三波改革,但都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没有扭转经济增长率下降的趋势,迫使决策者转向激进改革,最终导致体制崩溃。鉴于此,不少研究者把目光转向中国不同于苏联东欧的一些结构性因素。诸如:(1)改革初期,中国劳动力 75% 在农业部门,苏联 75% 在工业部门。中国外延性增长和“粗放型”发展的空间很大,高增长率可以通过将农业劳动力转到工业中去的办法取得。(2)苏联已将社会保障网扩展到城乡全体劳动者,而在中国享受保障的只占劳动者的 20% 的城市劳动者。这使改革只轻微触动很小的既得利益,政府也不必为了维持稳定而把国民收入的很大比例用于社会保障。农民处于国家保障体系之外,既是中国改革相对阻力较小的原因,也是中国改革巨大动力的源泉。(3)在计划、投资和物资分配方面,毛泽东时代比苏联或

任何东欧小国有大得多的地方分权，并存在相当大的非国有经济。客观上存在两种经济体制：一是受中央政府控制的；一是由地方政府控制的。这有利于国有和非国有部门之间的竞争，也增强了地方政府发展地区经济和改革试验的动力。(4)中国经济体制实质上是一种命令经济而不是理性计划经济，前者较后者更缺乏效率，但放弃它所付代价要小得多。(5)香港、台湾、新加坡以及散居在东南亚和北美的华人中有许多企业家，这些人是重要的知识与投资的来源，起到与世界经济沟通的桥梁作用。(6)毛泽东时代留下了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使国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掌控能力，得以进行大规模社会实验，这种政治和组织资源既支持了毛泽东的文革，又支持了邓小平的改革。(7)苏联民族差异性很大，俄罗斯族只占苏联人口的53%。中国90%的人口为汉族，民族同质性降低了改革进程的国家分裂风险，等等。

这些分析是有启发性的。需要补充的是，改革初期并没有清晰的路线图。当时，从领导人到经济学家都意识到，必须改，但谁都说不清楚究竟应当怎么改，更没有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最终目标。中国改革是一个不断试验和学习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说，“摸着石头过河”是唯一可能的选择，许多情况下是实践推动政策走。市场机制具有为自己开辟疆域的力量，观念和政策的突破往往是对事实的追认，所谓“与时俱进”也可称之为“顺势而为”。

1. 放权让利改革

最初的改革思路比较简单，就是放权让利，调动积极性，搞活经济。充其量是适当引入市场机制和竞争，以增加计划经济的活力。放权让利是以往经验的延续，实质上是重拾《论十大关系》和中共八大前后的一些想法，不同的是放权的范围扩大了。为调动积极性，邓小平提出了一个经济政策：允许一部分人“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对于以追求平等为核心价值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这的确是一个大胆的政策，首次把利益驱动而不是“革命精神”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以承认差距来激励进取，增加财富总量，达到最终惠及全体的目标。这个政策把人们积蓄

既久的趋利动机和致富欲望调动起来，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也成为经济改革的驱动力。另一个思想亮点是，对市场作用的重新估计。在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上，许多经济学家批评了要求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的“左”倾观点，提出应更多地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例如，孙冶方重提“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薛暮桥提出应当为长途贩运平反，要利用市场活跃流通等。1979年2月22日，李先念在一次会议上说，他同陈云谈过计划与市场的问题。陈云同意“在计划经济的前提下，搞点市场经济作为补充。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是补充，不是小补充，而是大补充”。他还说，“国内要竞争一下”。3月8日，陈云在《计划与市场问题》提纲中提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都必须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这两种经济。1979年11月，邓小平在接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副总裁吉布尼等人时也说：“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邓小平讲的与陈云讲的是一个东西，就是在计划经济中引入市场调节和竞争，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一个理论模板。不同的是，邓的思想更具开放性。

在经济学界，讨论向前推进了一步。1980年初夏，薛暮桥在为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起草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这份讨论中的文件指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我国经济改革的原则和方向应当是，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的条件下，按照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自觉运用价值规律，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在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这已经超越了放权让利的界限，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的主张。他的话给赵紫阳很大影响，但在决策层未能成为共识。最初的放权让利改革激发出经济活力，也引出了体制摩擦，1979、1980年连年出现巨额财政赤字。1980年底，中央确立经济紧缩政策，陈云提出“重调整，缓改革”，改革服从调整。在这个背景下，引发出关于经济改革的第一场争论，“计划取向”的主张在政治上占据上风，“市场取向”的主张受到批评。从总体上看，决策者的改革思路

没有超出适当引入市场机制以增加计划经济活力的框框,它的形象比喻就是“鸟笼子”经济。

2.体制外力量的成长

中国经济改革被称之为体制外先行的改革,不过改革的重点从国有部门转向非国有部门,并不是事先设计好的方案。决策层在酝酿和试行改革时,选择的突破口恰恰是工业管理和企业管理,办法是扩大企业自主权。据袁宝华回忆,从粉碎“四人帮”以后,国家经委就运作企业改革这件事。至少在1978年至1980年,改革的焦点一直放在国有企业扩权试点上。整个80年代,在国企改革上作了一系列的摸索,先后试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两步利改税、承包制等不同的办法,寻找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途径,让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实体。同时,在计划、价格、投资、金融、财政、外贸、物资等领域作了相应变动。这些改革至少具有两方面意义:一是肢解了旧体制,二是释放出市场空间。国有企业的身子虽然还在计划体制内,但它的一条腿已经伸到了市场。不过,80年代的国有部门改革总体上没有取得突破,经济改革的真正突破发生在非国有部门。

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回忆说:改革的起步阶段有两件事做得很成功,第一是最初几年把改革的重点放在农村,这一改革打破了农业长期停滞的局面,对整个经济改革起了重要推动作用;第二是加快集体经济的发展,并允许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三资企业的适当成长,很快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格局。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城镇非国有经济包括个体经济的恢复发展,没有遇到太大思想障碍,并不是因为理论上率先突破,而是因为迫于现实压力。2000万人待业,是70年代末最具“爆炸性”的社会问题之一,波及21个省、市、自治区的知青“返城大请愿”已经引发了某种动荡。为了缓解就业压力,各地政府在向现有单位硬性分派就业人员的



市场转轨,企业改革是助产婆。图为山东一家改制后的企业

同时,开始考虑在国有部门之外开辟新的就业道路。中央的政策逐步放开,从允许到积极鼓励城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鼓励劳动者多渠道就业和自谋职业。在城乡个体经济中发展出雇工经营的私人企业,是一个自然过程。然而,它的出现却不像个体经济那样顺利。这里又触及一个核心价值:社会主义是否允许“剥削”。中央的政策开始是:允许带两个徒弟请5个帮手。这也是依据经典,雇工8人是个体经济与私人经济的理论分界点。但现实很快突破了这个限制,结果引起很大争论。《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展开了持续的讨论,一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中央的方针是:“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看一看再说”。这个方针的提出,对决策者来说,多半出于绕过争论的策略考虑,事实上默许了雇工经营的自发发展。于是,以1984年为拐点,雇工大户和私营企业开始成批地产生,特别是原来集体经济力量不强的地区发展很快。如浙江省温州市1987年有私营企业1万多家,产值占该市乡镇企业总产值的70%。福建省晋江市有私营企业4500多家,产值占该市乡镇企业总产值的84%。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明确肯定“私营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生产,活跃市场,扩大就业,更好地满足人民多方面的生活需求,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第11条增加了一段内容:“国家允许私营企业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

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发展。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至此,自上世纪50年代消灭私人经济以来,重新确立了私人经济的法律地位。

3. 农村突破的意义

农村改革的突破具有全局性意义。不过它并不像有的论者所说的是领导人预先选择的改革突破口。自始至终参与决策的杜润生说:“农村改革并没有一幅事先描绘好的蓝图,它是在农民、基层干部、地方政府和中央领导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互动过程中完成的。”农村改革是农民对政策底线的冲击与地方上开明的领导人相互推动,一步一步获得共识形成全国性政策的过程。最初的农业政策基本属于调整的范畴,并没有把体制改革提上日程。然而,正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供的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引导出农村管理体制和经营方式的重大变革。放宽农村经济政策,为农民松绑解禁,使农民获得了过去所没有的自主权和选择权;调整宏观农业政策,让利于民,又使农民的选择获得了利益刺激。于是,多数农民选择了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如果把集体化比作筑堤,包干到户就像是决堤,“势不可挡”。农村出现的这股潮流,在城市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在传统的观念中,坚持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之一,“包产到户还是社会主义吗?”反对的声音很多。但支持者也不在少数,包括中央和地方许多官员。

农村改革大大提高了改革的声誉,9亿农民稳定了,也使决策者可以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环境下从容地推进城市改革。农村突破的意义更在于它推动了市场化趋势。一是出现了专门从事商品生产经营的专业户,其中孕育出一批雇工经营的大户,私人经济破茧而出。二是开拓出一片市场。先是城乡农贸市场的恢复和繁荣,既而出现农民长途贩运,异地经商,出现了各种专业市场。三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这是农村改革引出的最积极的成果,而且出乎人们预料。毫无疑问,乡镇企业是上世纪80年代带动中国经济增长加速的引擎,同时成为市场经济转轨的重要推力。农村改革的后续发展推动了中国社会结构

的历史性变迁。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持续的“民工潮”引发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人口流动浪潮。“民工潮”不期而至,却并非偶然,这是长期封闭式人口管理积聚起来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及其进城冲动的集中迸发。源源不断的农民工无疑是制造“中国奇迹”的主角之一。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农民工功不可没。“民工潮”出现的历史含义,更在于它为解构城乡二元结构提供了持续的压力,大大推动了城市化进程。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1年的51.3%。城镇化还有一条很长的路要走,关键在于实现权利平等,让进城农民真正变成市民。然而,如果没有农民“自己解放自己”的行动,这一过程至今不可能由政府启动。

4. 开放推动改革

中国的改革之所以走得这么远,就在于它是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下展开的。如果说国内经济改革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路线图,那么有一点从一开始就很明确,这就是对外开放主要是对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开放,充分利用外部资源(包括资金、技术、市场和管理经验)来发展自己。在20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周恩来手上,中国通向西方的政治障碍已基本拆除;1978年,又在两个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一是中日缔约,一是中美建交。至此,对外开放的政治平台完全形成了,中国获得了进入世界主体市场的通道。美苏战略对峙和经济全球化这两大国际因素,使中国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以开放促发展的机遇期。外部因素的引入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如果说上世纪50年代初东西方冷战格局下的封闭环境,是中国加速选择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根源之一。那么70年代以后的开放环境,则成为推动中国一步一步趋向市场化的重要因素。

第一,注入增长动力。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奇迹”有不同的解释。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肯定对外开放对增长的贡献。除了通过利用外资弥补发展中国家通常面临的资金瓶颈以外,主要有两条:一是通过引进技术的方式,加速本国的技术变迁,进而提升产业结构。在相当程度

上,中国“奇迹”得益于对西方技术的模仿。二是利用世界自由贸易秩序,通过进入国际市场获得增长动力。时至今日,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国家,出口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有人甚至把中国的高增长归因于外部因素。认为“过去30年的发展与其说是中国的奇迹,还不如说是世界带来的奇迹”。近30年,中国恰好遇到了两个外部历史条件:已成熟的工业技术和有利于自由贸易的世界秩序。这些条件在晚清时期和民国时期都没有,因而当时不可能出现今天这种经济增长。中国不过是加入了世界潮流,搭上了全球化的便车。这种分析不无道理,但是仍然需要解释,同样的条件为什么唯独钟情于中国?显然与中国内部因素有关。例如,稳定的政治环境、高信用的政府、低通货膨胀、高储蓄高投资、低廉的土地租赁和劳动力成本等,这些增长因素在制度创新中得以释放。尤其是极其充沛的成本低廉的劳动力资源,是中国能够持续高增长的独特因素。众所周知,珠江三角洲经济的率先起飞,是由两大因素推动的:一是引进外资和技术,二是雇用数以百万计的拿低工资又特别吃苦耐劳的农民工。

第二,引入市场因素。对外开放在引进外资的同时,也引进了新的规则和制度。1979年初,邓小平请原资本家荣毅仁出来主持引进外资之事,具有象征意义。荣毅仁当面向邓小平提出:“利用资本主义资金,也应用资本主义去对付”,得到邓小平的首肯。经济特区更是市场经济的试验区。1992年6月,邓小平肯定地说:“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圳特区开办之初,就有“按国际惯例办事,和国际市场接轨”的明确指向。原深圳市委书记李灏说,特区政府做的工作,主要的不是直接招商引资而是体制改革,包括劳动、工资、价格、土地使用、外汇管理、资本市



中共十五大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图为十五大会场。

场等一系列方面。这种市场化试验起到了为全国探路的作用,从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沿海开放区再到腹地,市场化逐步扩散开来。中国的企业经理们从与外商打交道过程中逐步理解了什么叫市场经济,逐步学会了市场运作。对外开放把国际竞争引入中国,竞争是改革的动力,逼迫国有企业为了提高效率而改革体制。

第三,提供思想资源。1978年以来,中国一直在向西方学习。中国必须改革,这个结论是从自己的经验得出的,但这并不一定走向市场经济。中国人在计划经济体系中生活太久了,从领导人到经济学家,谁都没有市场经济的切身体验。对外交往扩大以后,官员和学者才第一次亲眼看到市场经济是怎么回事,一个成功的市场经济已经摆在那里,这为中国提供了具体的参照物,引发出许多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想法。对于中国经济学界来说,接触现代经济学是一次思想启蒙,那些对改革发生了重要影响的经济学家,都是在重新接受现代经济学的训练以后,才使自己的思想更加明晰起来的。对于西方经济理论和国外专家建议,决策者采取了开放的心态。1985年9月的“巴山轮会议”就是一例。来自国外的顶级经济学家与国内著名经济学家超越意识形态,就中国改革和发展问题展开了一次无拘束的对话,这次会议在帮助决策者和经济学家理清思路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这样的例子还

有很多。不同于其他转型国家的是,中国决策层始终坚持自主选择的原则。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没有任何成功的经验和现成的理论,更何况中国是这样一个如此巨大的经济体,不可测的风险很大。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没有接受任何“一揽子”方案,主要诉诸自己的实践的探索。例如“价格双轨制”以及一系列“双轨运行”的过渡方式,就是中国本土的创造。

5. 越过市场化门槛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改革走到了一个重要关口。一方面,改革遭遇到瓶颈。80年代的改革近乎于“帕累托改进”,即改革让多数人受益而很少有人受损。这是因为当时进行的是一种增量改革,允许和扶持体制外经济的发展,体制内原有利益格局没有根本触动。这种改革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使中国经济获得了第一份增长红利。然而,到了80年代末,容易改的改了,难题留了下来,改革遭遇到两道难过的坎。一是1988年价格闯关失败,价格市场化改革受阻;二是国有企业承包制效益递减,国家“让利”的空间已经用完,而企业并没有真正搞活。到90年代初,由于体制外经济的竞争,企业“内部人控制”对资产利润的侵蚀,加上市场疲软的宏观环境,国有企业亏损面扩大,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放权让利改革的功用基本耗尽,改革亟待新的突破,触动产权及原有的利益格局,这就触及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核心。另一方面,由于国内改革受阻,接着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转入低潮,关于改革的争论骤然激烈。一些改革者因改革受阻而沮丧,社会上普遍对物价疯涨和“官倒”现象强烈不满,而保守力量对改革提出了根本质疑,认为改革开放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而是在抛弃它。他们认为,激进改革导致了苏东社会主义的垮台,“和平演变”是当前的主要威胁。在决策层召集的座谈会上,两派学者针锋相对,激烈辩论。反对市场化改革的声音占了上风,改革一时失去方向和推动力,社会上普遍存在焦灼情绪。

邓小平南方谈话正是在这样一个关口发表的。南方谈话有一句名言:“不坚持社会主义,不

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邓小平讲这个话,斩钉截铁,显然不只是从中国自己的经验出发,而且看到了世界大势,包括对刚刚发生的苏东剧变的思考。他把社会主义稳固的首要条件归结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而发展的唯一之道是改革开放。只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任何经验都可以借鉴,不要怕资本主义多了,不要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不要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其实,客观情势并不像高层争论表现出来的那么缺乏方向感。10年的改革开放为它自身造成了一种不可逆转的形势,放权让利使地方政府和企业成为受益者,体制外经济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发展势头正旺,加上城镇集体企业、个体工商业、三资企业,各种非国有经济的比重已占“半壁江山”,面临困境的国有企业必须寻求出路,地方和部门都在等待中央明确表态。改革已经逼近市场经济的门槛,需要有人登高一呼,凝聚共识,越过这道门槛,“南方谈话”的意义就在于此。

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标志着中国市场化改革越过了它的临界点。经济改革重点从增量转向存量,从体制外转向体制内,90年代上半期,价格市场化并悄悄无声息的完成;1994年分税制改革奠定了今天中央雄厚财力的基础,并强化了已经形成的地方竞争机制;债券、证券、期货等市场的建立和1998年中央银行制度改革建构起较完整的资本市场;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从制度上和世界接轨。相比较而言,90年代中期之后的国有企业改革更是触动传统体制根基的改革,以“抓大放小”为核心的产权改制和资产重组展开了一个“国退民进”的进程,由此形成了产权多元化的市场经济基础。90年代以来的改革其深刻程度是80年代不能比的,一种市场经济的框架基本形成,并加速了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的社会结构也由此发生了极为深刻变化。正是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全球化两大引擎带动中国近20年,特别是21世纪以来的持续高增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起飞”,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责任编辑 徐庆全)

我在北大当校长

○ 丁石孙 口述 袁向东 郭金海 整理

我是北大的民选校长

访：您是什么时候知道要当北大校长的消息的？

丁：1983年10月。在这之前不久，我在哈佛数学系收到我爱人的信。她说现在北大正在酝酿校领导班子。教育部、人事部、中组部在北大搞了一次由副教授、副处长以上的人参加的民意测验，事先没有提任何候选人，让大家任意填写校长、副校长人选，不记名。然后，教育部有专人把票收走。我爱人也参加了投票。不久，有人告诉我，北大有位领导要到哈佛来访问。北大并未告诉我有这件事，我也不知道谁来。有一天，我跑到哈佛大学的办公室去问这件事，想了解来的人的访问日程。办公室秘书说：“你来的太好了。”因为北大的客人来的时候是礼拜天，没人办公，他正愁没人帮助接待。于是，他让我到机场去接一下，并事先把教职员会所(faculty club)的一把钥匙给了我，让我直接把客人送去。

到机场我才知道来的人是北大代理党委书记项子明。他在“文革”前任北京市委秘书长，是彭真很得力的干将。他来的那天，哈佛大学专门挂了中国的旗子，以示重视。到教职员会所后，他就告诉我，要我回去当校长。他跟我聊到很晚，差不多聊了3个小时；说我要当校长，他当党委书记，两个人合作；并谈了很多想法。他显然雄心勃勃，想在北大干一番事业。他的年龄比我大一点，身体很好，表现得非常积极，当时就要我跟



1984年邓小平(左五)接见陈省身(左六)及夫人(左四)时，丁石孙作陪(左二)(左三为何东昌，左七为胡国定)。

他一块回去。我说不行，因为我还有一个月的进修时间，并安排了到西部访问的计划，也已经买好去西部和回国的机票。听我这样说，他没有勉强。当时他完全没想到回国后并没有让他当北大的党委书记。

访：项子明为什么没有当成北大党委书记？

丁：据说是得罪了彭真。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时，彭真说项子明不能用。“文革”前，彭真搞了个写作班子，地点在长春园。“文革”中，项子明顶不住压力，揭发说这个写作班子是反毛泽东的。这对彭真很不利。项子明就成为彭真眼中的叛徒。对我个人来说，项子明没有当党委书记是件好事。因为他党龄老，主意多，如果他担任这个职务我有很多事不好办。

访：在您之前，北大校长都是被任命的，并不是民主选举的。您当校长这次是北大第一次民主选举校长。这次民主选举，把您——一位屡遭政治运动冲击的学者，推上了世界著名学府

——北大的校长职位。您在美国时,是否听到一些人对您要当校长这件事的反应?您知道自己回去要当校长这个消息后,对做校长有哪些方面的考虑?

丁:1983年12月我到伯克利后见到的华裔数学家,比如项武义、伍鸿熙等,知道我要回去当校长,都很高兴,认为这是中国改革的标志,并跟我说中国能启用一个毫无背景的人当北大校长,表明中国以后有希望。

当时我对回去怎么当这个校长考虑得比较少,但意识到这个校长不好当,会得罪很多人。我跟当时在美国的北大一些教员说:“我要回去准备上下左右前后都要战斗。”我虽然不能预料回去当校长的具体困难,但知道中国的改革的难度很大。事后我感到我对困难的估计还远远不够。

访:您是什么时候被正式任命为北大校长的?

丁:1984年3月。我从美国回来后,情绪比较乐观,认为前途非常美好。但一直待到春节后,组织上也没找我谈话。我搞不清楚是什么道理。事后才知道,彭真不同意项子明当北大党委书记,要重新找书记。一直到3月份,北大才开了个范围很小的会。会上,何东昌代表教育部宣布我当校长,王学珍当书记。项子明当了顾问。我的前任校长是张龙翔。

访:在何东昌宣布您当北大校长的会上,说明校长的产生经过了吗?您在会上表态说:“不要希望我有三把火,中国的事情不是三把火解决得了的。”是这样的吗?

丁:何东昌没有说明校长的产生经过。我确实是这样表态的。记得我的发言很简短。大意是说:我对学校的工作没有经验,希望大家给我3个月学习的时间。在这3个月里,原来怎么搞的,还怎么搞。我还说,一般的说法,叫新官上任三把火。我大概没有三把火,一个理由是,我在北大工作了这么多年,火气早没有了。同时,我也认为中国的事情比较复杂,不是靠三把火能解决的。我只希望能够做到下一任校长接任的时候,比我现在接任的时候条件要好一点。这就是我的目标。

访:当校长后,您提出过办校原则吗?

丁:1986年暑假王学珍住院,有一段时间学

校党委常委会是我主持。有两次常委会专门讨论办校原则,我记得提了六条或七条原则。其中一条是从严治校。因为北大一贯工作效率比较低,也比较松散。二是发扬民主。当时提出对不同的事情应该采取不同的民主形式。如对学术问题不能全校讨论,由学术委员会讨论决定。对生活问题,要在教代会上讨论,要发动全校的教职工参与。三是要坚持“双百”方针。我同意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思想,认为学术问题不能有任何框框。考虑到当时有一种议论,反对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我就提出坚持“双百”方针。四是干部不能越权管事。我自己也是一样。如有人向我抱怨他的住房条件太坏。对这样的事情,我很少当场表态,总要跟管住房的干部商量,征求他的意见。再如学校的招生工作,不归我管,我绝对不给负责招生的干部写条子。我不能越权,越权的后果就是人家就不管事了。

管理科学中心和北大方正

访: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是目前国内最有名的商学院之一。据厉以宁说,光华管理学院的历史要从1985年北大成立经济管理系和管理科学中心算起,而管理科学中心的成立跟您密不可分。而且,这个中心的办学方针,是您和厉以宁、陈良焜、王恩涌在您家的小会客厅内决定的。是这样的吗?

丁:对。当时我提出成立管理科学中心,是为了帮助厉以宁,让他躲开经济系,有自己的发展空间。1957年划右派时,厉以宁属于右派边缘人物,1958年跟我一起下放到门头沟劳动锻炼,“文革”开始后又跟我一起关在黑帮大院。“文革”后,他在经济系受排挤,有些人认为他是搞邪门歪道,不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厉以宁想入党,在系里的党支部就是通不过。我当校长后,别的领导跟我说:对厉以宁要控制使用。他会画画,如果办展览,可以用他。但当时赵紫阳很重视厉以宁,长时间让他住在中南海。中央认为他可以入党,胡启立曾打电话过来问:“厉以宁为什么不能入党?”

访:中央过问后,厉以宁入党了吗?管理科学中心属于什么性质的机构?

丁:入了。中央一过问,情况就变了。管理

科学中心是学校领导的跨学科的学术性机构,跟系的地位类似。当时我有一个看法,成立系需要有比较成熟的条件,如教学计划要很清楚;但中心不需要,能搞研究就可以。这个中心的研究范围比较宽泛,包括管理、经济等各个领域。中心的人员来源也很广,各种人才都要。它成立不久就有了十几个人,中心的主任由我当;副主任有两个,一个是厉以宁,另一个是陈良焜(陈良焜原为北大数学系教授,研究经济计量学。管理科学中心副主任还有王恩涌,是北大地理学教授)。

除管理科学中心外,我当校长期间还成立了四个中心,其中包括人口中心、环境科学中心。现在北大环境科学中心,非常热门(北大环境科学中心成立于1989年5月4日)。在我之前,张龙翔校长曾提出成立几个中心的设想。因而,在北大成立中心不是我首先提出的。我当校长后成立这些中心的大目标,是想突破北大的框框,改变系里原来的传统。

访:北大方正是您当校长后成立的一个公司,现已成为我国计算机行业中的一个知名品牌。请您回忆一下这个公司成立的经过。

丁:成立北大方正是我1986年做的一件事。之前,北大跟山东潍坊的华光公司合作,利用王选发明的汉字排版系统,生产汉字排版印刷机已有多年,1986年已经做到华光四型机。有一次我问起卖出这么一台机器,北大能得到多少钱?他们说卖出一台机器,华光公司给北大一万元钱。我记得当时一台机器至少卖十万以上,或者更多。我觉得这对北大不公平,因为潍坊的公司也不会生产机器,只是从日本买来机器,安装上王选的汉字排版系统。我就提出:“为什么我们不自己搞?”王选的重要发明是信息压缩技术,这项技术就是把包括大量字型字号的信息进行压缩,而只有把各种字型字号的汉字储存下来,才能印报纸。

当时要把王选发明的这个系统固化,做到芯片上,国内还做不到,要到英国去做。我们和英国的公司联系,他们答应为我们做,还负责保密。这样,学校就出钱派王选到英国去,把他的系统固化,拿回来。很快北大自己办了一个公司,开始不叫方正,叫北大新技术开发公司。我考虑王选不会做生意,就跟有关同志商量,把王



丁石孙任北大校长期间留影

选的工作跟公司的工作分开,给王选成立一个研究所,负责研究开发;公司负责生产销售。

我在学校里挑选了两个人筹建公司。一个是无线电系的技术员,叫楼滨龙;另一个是数学系的总支副书记,叫黄禄平,是学计算数学的。记得我专门和楼滨龙谈过一次话,因为当时要动员教师出来开公司难度相当大。我有一点很明确,就是出来开公司的人一定要跟学校脱钩。你挣多少钱学校不管,但你不能再保留国家公职人员身份。公司的水电费也要跟学校明算账。我跟他们讲:“你们要学游泳,就要跳到水里去。”我印象中公司开始时没有招工人,干活的都是大学生和研究生,整个技术水平比较高。

访:公司成立后,北大和潍坊华光公司中断合作关系了吗?

丁:我们把潍坊华光公司抛开了。但由于华光这个品牌由我们跟这家公司共同拥有,我们不能再用华光这个名字,于是就有了方正这个品牌。它是怎么想出来的,我不知道。一开始,方正没有办公地点,就在北大附近零散地找了些小房子。我去看过,里边也没有什么机器,只是看到很多人在忙着写字,因为很多字体要靠人写出来。记得当时市场相当大,从中央级报纸到省级

报纸,甚至地市级和县级报纸都要上激光排版系统;楼滨龙到处去推销。

访:北大方正崛起后,跟北大脱钩了吗?

丁:我说要它跟北大脱钩,但实际并没有。当时我就感到,像方正这种公司,所有制不清楚;但另一方面,北大也没有向方正注入资金。方正启动的时候,向北京市的一家公司借了几十万元作本钱。方正的产权归谁所有,始终是一个问题,这一点我当时就看到了。

没有闹大的学生事件

访:您当校长的时候,北大不太平静,经常有学生闹事,向学校提出各种要求。对几点熄灯都要闹一闹,我们对此只略有耳闻,实际并不了解具体情况,您能详细讲讲吗?

丁:可以。1984年发生了熄灯事件。这是我当校长后,北大的第一次学生运动。过去北大学生宿舍晚上不熄灯,有很多学生到十一二点还不睡觉,在听收音机或洗衣服等,影响别的学生休息。在一次校长办公会上,我们议了这件事。有人提出部分学生晚上不睡觉,搞得大家不得安宁,应该11点熄灯。我知道这件事很敏感,北大学生自由惯了,突然让他们改变作息时间,恐怕会引起不满。为慎重起见,我叫沙健孙开了两个座谈会,听听学生的意见。有一天,沙健孙告诉我,座谈会开了,多数学生支持熄灯。他认为可以实行。所以我们就决定晚上11点熄灯。

实行熄灯这天晚上,数学系的干部打电话到我家,说学生闹起来了,一会儿就要到我家里来。我想在中关村的家里给围住就不好办了,赶紧骑自行车到办公室。因为怕半路上碰到学生,我绕道中关村,从西门进了学校。我住中关村的四十二楼,学生没搞清楚我住哪座楼,他们包围了四十三楼。看到这种情况,桂琳琳就在我家阳台上喊:“丁石孙不在四十三楼,在这里。”她还跟学生们讲,她不怕他们闹,“文革”时比这厉害得多。丁干这时年龄还小,看到这么多人,觉得很好玩。

学生发现我不在家里,就没劲了。这一天晚上,我睡得很晚。第二天开了个教职员会,我讲了话。会没开完,何东昌到北大来了,坐在我的

办公室里。我开完会,把学生闹事的情况给他讲了,他听后才放心:熄灯事件没闹大,也不是政治事件。我让沙健孙给学生做了些工作,事情就解决了。

访:您做过班主任、年级主任、系主任,应该对做学生工作有些经验。当校长后,您还亲自去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吗?

丁:1984年,我应校党委组织部的要求,给学生讲过一次党课,有几百人听。当时学生的思想有点虚无主义,对共产党不相信。这次党课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说服学生相信共产党。在党课上,我没有讲大话、空话,主要是结合亲身经历,讲解解放前怎么相信了共产党,解放后怎么加入了共产党,以及改革开放后共产党又纠正了自己的错误。我当时主要是想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证明共产党是值得相信的。

访:这次党课成功吗?

丁:比较成功,至少没有引起学生反感。我讲的也是我的真实思想。当时我确实对改革开放的复杂性,对后来的曲折,对可能的困难没有充分的估计。我的讲话充满了信心。现在来看,我当时的讲法过于简单,过于乐观。记得讲完党课不久,我的一个在《人民中国》日文版当编辑的老同学车懋祺来找我,要给我写篇报道。我把讲课的录音带给了他,他把录音整理出来请人译成日文发表了。

访:您的坦诚,在处理学生事件时起了作用。之后又遇到过别样的学生事件吗?

丁:1985年9月,北大学生由于对我们国家的对日政策不满,闹得很厉害,贴了很多大字报。那时胡耀邦想跟日本搞好关系,准备邀请3000日本学生来中国访问,引起了学生的反感。再加上电视台在播《四世同堂》,激发了反日情绪。当时王学珍作为中央委员到中央参加全会,不在学校,只有我来面对学生。

我在大会上讲,希望同学们顾全大局。我说:我是经历了抗日战争的,从个人感情上,我对日本人的痛恨比你们要强得多。我的小妹妹亲眼看到,我的一个亲戚被日本人一枪打死。你们对外交政策不能感情用事。我的讲话虽然把学生的嘘声压下去了,但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学生还是闹,并扬言要在9月18日上街游行。

9月17日晚,我召开学生干部会,希望他们劝说学生不要上街,但学生的情绪还是非常激烈。有的学生贴出大字报,说第二天要在图书馆前集合,上街游行。当时北京市领导很紧张,因为学生一上街就变成北京市的事。副市长陈昊苏到北大来,拉我到学校的广播电台发表讲话。讲话的稿子是他给我准备好的。

9月18日早晨,我在办公楼听说学生已涌向南校门。当时南校门已经关了,学生被堵在校门内。究竟是谁下令关的,至今我不清楚。有些学生干部站在铁门上做工作,希望同学不要冲出去。经过几个小时的僵持,学生终于散了,但校园里并不平静,贴了很多大字报,把我骂得狗血喷头。有张大字报,把我的讲话跟吴德“四五”时在天安门的讲话比较,说我已经堕落成了吴德。最终这个运动没有闹大。

阻止学生出去时,学校准备在校内开个大会,让学生把他们的想法讲讲。当时没人敢主持这个会,怕学生情绪太激动,控制不了局面。这时我认识了校研究生会主席张来武,他说他主持。当时学生聚在南门准备冲出去,五四广场就在开这个会,把很多学生吸引过来了,减轻了南门的压力。

访:对学生要冲出校门、上街游行这件事,北京市领导很紧张。您也一样紧张吧!

丁:我对这件事不是很紧张。当时整个国内形势没那么严重,中央抓学生工作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李鹏,代表国务院;一个是胡启立,代表党中央。事后他们把我和王学珍找到中南海谈了一次话,主要是强调要把善后工作做好,把学生的思想和情绪稳定下来。当时中央比较重视北大学生闹事,政治局专门开会研究过,让我和王学珍列席了会议。这是我唯一一次参加这么高层次的会议。

访:在这次政治局会上,您和王学珍发言了吗?政治局领导对北大学生闹事是什么态度?

丁:在这个会上,轮不到我们发言。胡耀邦



1984年接待到北大访问的德国总理科尔

是总书记,主持了会议,李鹏和胡启立汇报了这次北大闹事的情况。当时我觉得胡耀邦对学生游行好像并不赞成采取强制措施。因为当李鹏和胡启立汇报学生因校门关闭没出去时,胡耀邦就问:“你们干吗关校门?”他是冲着我和王学珍问的。胡启立赶紧把话头接过去,说是为了避免出更大的事。我感觉胡耀邦比较开明。

访:据说,一年多后的1987年元旦,北大有几千学生包围过您的办公楼?

丁:提起这件事,要从1986年说起。这一年是知识界思想比较活跃的一年,背景是将要召开中央全会,要对过去的一些重大历史问题做出决定,知识分子希望这个决定能对过去“左”的东西做出结论。总的说来,会后发表的文件跟很多人的期望值有距离,特别是对毛泽东的评价。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各种想法。1986年年底前,北京市出台了一个关于游行的条例,内容是允许游行,但必须向公安局申请。出台这么一个条例,本意是不希望游行,但又不能明说。当时北大学生想利用这个条例,申请合法游行。

1987年元旦这天,北大大部分学生到城里游行。下午,有学生打电话到我家里,说有同学被公安局抓了,听得出来他们情绪非常激动。我不知究竟出了什么事,放不下心,吃过晚饭就去了校党委办公室。这天正好王学珍的女儿结婚,在

家里请客。有人告诉我确实有些学生被抓,学生游行时,警察在路上泼了很多水,路面结了冰,很滑,有些学生摔倒,被警察抓了。

大概晚上8点钟,我在办公室听说学生要包围办公楼。这时王学珍不在,党委副书记郝斌在。时间不长,就有三四千学生把办公楼包围了。这时我想如果学生冲进来就更乱了,于是,我下到办公楼东门,让人从楼上放下一个话筒,我手持话筒跟学生对话。这时气氛非常紧张。郝斌立刻跟市委通了电话,说办公楼已被包围。

访:还记得您跟学生的对话内容吗?

丁:我要他们冷静。我说有人被抓了,我们去交涉;把我围起来没用,我只有腾出手来才能做事。我刚讲完,有学生大声喊:“不要听丁石孙的话。他用的是缓兵之计。”这时楼上有人下来跟我讲,市委准备放人。我一下子心里有了底,就大声说,谁说我骗人,站出来,我从来不骗人。听我这么一说,学生安静了。这时是晚上8点多钟。我让他们11点再来找我,听答复。这样,学生慢慢散去了。

访:在这之前,您肯定没有骗过学生。否则学生不会听您的话。

丁:对。学生散去后,我和郝斌跟北京市联系,了解清楚被抓的学生有几十个,分别关在四个分局。我们商量决定派人去接,但不敢让校园里的学生知道,怕他们跟去把事闹大。随后,我们打电话通知车队,把汽车开到校外,让学生干部到校外集合上车,分几路去接被抓的学生。记得负责接学生的有校办主任黄槐成。

据说,被抓的学生在公安局里还是很受优待的。警察请他们喝茶,吃点心,看电视。他们被接回来时,已经快12点了。11点时,有个别学生到办公楼来听答复。我说接人的车已派出去了,还没回来,但他们依旧等着。这次学生运动就这样平息了。

不久,我到京丰宾馆参加民盟代表会议的小组会。我对参会的人都不熟悉,很多人问我学潮的情况。我说,学生要去游行,绝对不是少数人煽动,而是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如果是少数人煽动的话,就说明我这个校长无能。我掌握学校的领导权,都煽动不起来,他们怎么能煽动起来呢?

这次学潮之后,胡耀邦下台了。那时我的情

绪很坏。因为市委经常把我们找去开会,市委书记在一次会上还点了我和王学珍的名。他说,你们书记跟校长一定把学生带好,要负起责任。我听了这话很不高兴,但也不好顶他们。我只好说,我们只有在市委的正确领导下,要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其实,那时北大并没有闹得太厉害,闹得最厉害的是中国科技大学。

在政协会上“闯祸”

访:1988年您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当时是民盟推荐的,还是北大推荐的?

丁:可能是民盟推荐的。这时我已是民盟中央常委。1957年反右运动后,我跟民盟几乎没有联系。1986年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高天找我,让我参加一点民盟的活动。他告诉我,他看中了我和清华大学校长高景德——高景德也是民盟盟员。这年年底,民盟开了一次代表会议,我跟高景德在会上当选为民盟中央委员。此后我跟民盟有了比较多的联系。北大也有可能推荐我当政协委员:王学珍是党中央委员,书记和校长要有个平衡。记得高景德和我一起当选为政协委员。那一届北大在民盟组的政协委员还有中文系王瑶和化学系的邢其毅。

访:您当政协委员后参加了1988年3月召开的七届全国政协一次会议。您还记得参加这次会议的经过吗?

丁:记得一些。在这届政协会开幕前,民盟开了个会,参加会的人是全部的盟员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高天主持会议,让我上去讲话。我说我毫无思想准备,记者来采访我才知道当上了政协委员,在学校里人们并不太关心谁当了政协委员。我讲话的调子比较低,说我尽量反映一点老百姓的情况和意见。那时我不大清楚政协委员能起多大作用,但知道不可能起太大的作用。所以我的调子比较低,也没把当政协委员看成很重要的政治待遇。

参加这届全国政协会议的民盟组委员住在国谊宾馆,教育经费不足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记者专门采访了我和高景德。我们两人都说教育经费不够。我简单地算了一笔账:教育部给多少钱,文科学生一人多少钱,理科学生一人

多少钱,这些钱是远远不够学校支出的。我们两人共同的想法是:校长赚不来钱,多招一个学生,就要赔多少钱。

在这届政协会上,钱老(钱伟长)代表民盟做大会发言。1987年下半年,费老(费孝通)就让我负责准备这个发言稿,内容是谈教育问题。为此民盟组织了一个班子,成员主要是民盟的人,记得有张毓茂、有吴修平的侄子(当时的福建民盟的秘书长)和黄景钧,我从北大找了两个博士生参加。准备这个材料前后花了一两个月时间,我也抽时间参加过几次讨论。当时我的一个主要想法是:不能说共产党的官员一定不重视教育,也不一定说共产党的官员是在说谎,只是口头说重视,我们要找出教育经费总是落实不下来的原因。

访:在这届政协会上,有没有令您印象深刻的发言?

丁:王瑶的名言“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就是在这次会上讲的。千家驹的大会发言引起了轰动。最初他是在小组会上讲的,大家都认为他讲得好,就让他到大会上讲。两次讲的内容一样。千家驹说他的发言是在从深圳到北京的火车上想出来的。

访:千家驹的发言主要讲了什么?

丁:他讲了腐败问题,也讲了教育。他的发言反映了一些实际情况,并没有夸张。我们在小组会上听他讲时,没想到反响会如此强烈。他的口才很好,讲话有鼓动性。

访:您在这届政协会议上发言了吗?

丁:在民盟组最后一次会议上发了言。我在民盟组除了北大之外的人,对其他人基本都不熟悉,所以一直没发言。最后一次小组会来的人不多,大家的话也讲得差不多了,我说我讲一点。我讲的内容也很普通。我说:现在做思想工作的理论水平比建国初高得多,但为什么效果不如过去好?主要在于行为。我之所以加入共产党,主要并不是因为我在理论上对党搞得很清楚,而是因为我看到周围的共产党员真正为别人办事。我



1988年北大90周年校庆,丁石孙(左)与费孝通(右)合影

当了校长,有一点和过去不一样,就是能接触到一些上层人士,也不是地位很高的,就是学校一级的。我过去想,校领导党性都非常强,等到我当了校长,才知道这些领导对利益、名位等等考虑得很多。我最后讲了一句话,让当时的领导不高兴。我说:很多领导觉得现在年轻人的思想有问题,个人考虑多;实际一些老同志、老革命也不见得觉悟就很高,没有私心。老同志应该扪心自问。

访:您的发言反响大吗?

丁:我觉得自己讲的都是些大实话,没想到会有什么轰动效应。小组秘书曲伟把我的发言记了下来,当晚寄到报社,第二天《中国青年报》就登了。第二天早上我到学校时,报纸已经到了。我的发言发表后,很快在学生中传开了,引起了强烈反响。学生们认为我为他们说了话。

1988年“两会”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发言,报道得比过去都充分。即使如此,我的发言跟千家驹的发言都未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了两天,有人传说赵紫阳在内部对我们两人的讲话都有很重的批评,把一个说成是哗众取宠,把另一个说成是耸人听闻。有人说我闯了祸。

访:这说明您的发言确实使一些领导不高兴。

丁:1988年暑假期间,国家教委认为学生不大稳定,在北戴河办了个学习班,让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参加。学习班时间不长,快结束时,中央领导接见我们。其中有邓小平,记不清是否还

有赵紫阳。接见完要合影,这时有一点出乎我的意外,我被安排坐在第一排,别的校长都坐在第二排,邓小平还跟我握手。看来他们是有意这样安排的。我没什么特别的表示,邓小平跟我握手就握了握。

过了暑假,统战部突然通知我,说部长阎明复要请我吃饭。那天在统战部,吃饭的人连我一共4人,有阎明复,还有一局局长孙楠、孙公麟。在吃饭的过程中,阎明复跟我说,中央是信任我的。他说他参加了中央的一些会,发现中央对我没有什么意见。这是我第一次去统战部,我搞不清楚中央为什么要让阎明复请我吃饭。事后我把这事跟邓小平和我握手联系起来,才意识到这些是中央的表态。大概中央觉得对我在政协会上的发言批评重了,我并不是学生闹事的后台。

提出辞呈,卸任校长

访:辞职卸任是什么时候?

丁:大概在1989年8月份,教育部在北戴河开了个会。每个学校去两个人:校长和党委书记。我检讨自己政治上比较简单,做了一通自我批评。

8月下旬,何东昌找我去教育部。何东昌和滕藤两人跟我谈话。他们没说我有什么错误,只说你不是要辞职吗?现在可以辞,教育部批准。谈话很简单,我说我很高兴接受这个决定。回来后,我的情绪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我跟桂琳琳说教育部终于同意我辞职了,我让她晚上做顿红烧肉,吃得好一点。

访:在此之前您提出过辞职?

丁:1988年,我给教委主任李铁映写过两封信,说我已经干了4年,身体也不好,请让我辞职,后来,教委副主任朱开轩亲自到我家劝我继续干。

访:何东昌到北大宣布批准您辞职的决定。何东昌对您是怎么评价的?您也讲话了吗?

丁:何东昌到北大宣布决定时,说了我一些好话,肯定我在北大做了一些好事,但讲得很抽象。在会上,我讲了一些客套话。我说:当了5年校长,由于能力有限,工作没做好;我是历史乐观主义者,相信后来的校长会比我做得好,会把北大办得更好。这样,我就结束了校长的工作。

记得第二天报纸还登了消息。

访:辞去校长职务,是您人生一个阶段的结束。辞职之后,您对自己在校长任期内做的工作有何感触?

丁:我确实感到没有做好自己的工作。我真想把北大办成一个思想自由、学术活跃的大学。为此我付出了很多努力,如当时我觉得北大文科的教条主义太厉害,就想通过研究方法论等途径突破这点。但在当时整个大环境下,没有做到,我的很多措施也没有实现。如1985年我对职称评定抓得很紧,但在后来几届的职称评定中,我就坚持不住了。当了5年校长,我能够得到安慰的,就是我离开北大这么多年,北大的多数人还对我留下了比较好的印象。

1989年9月,我就没什么事了,有时跟桂琳琳一起骑自行车到处转一转。有一次,我在紫竹院碰到北大一个教政治课的老教员,叫陈哲夫。因为在一篇文章中提出应该为陈独秀翻案,他在“文革”中受到过激烈的批判。这次他看到我,为我流了眼泪。中文系的严家炎也专门到家里看我,来安慰我。实际上,我对不当校长无所谓。

访: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季羡林说在北大历史上有两位校长值得记住,一位是被称为“北大之父”的蔡元培,另一位就是您。他对您的评价很高。您当校长期间,北大哪一年发展得最好?

丁:季先生是在报上发表的这个评论。他把我抬得太高,让我受宠若惊。我觉得1988年,北大的工作表现得比较突出,各项指标都达到了一个高峰,教师和学生的情绪也非常高。这一年恰好是北大建校90周年。当年新闻电影制片厂要拍一部叫《北大素描》的电影,讲述北大整个的情况,后来拍出来了。里边有我两个镜头,一个是我坐在校长办公室,讲北大的历史;还有一个镜头,是让我从家里走到办公室,并且要在雪地里拍。导演的意思大概是表明北大今后的道路还有很多困难。

访:您不当校长后,北大对您是怎么安排的?

丁:回数学系教书。我找了数学系主任李忠,告诉他从下学期开始可以安排我的教学工作。我的组织关系又转到了几何代数教研室。■

(责任编辑 徐庆全)

“文革”从华东局开始的三件史事

○ 唐荣智 口述 金大陆 采访 孙路遥 王芳 整理

迄今所有的研究,包括纪实文章、学术论文,甚至连有关文件都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在上海发动的。但我认为是通过华东局发动的。为什么是在华东局?我(原华东局宣传部理论处干事)作为亲历者认为有三点理由,也就是发生在华东局的三件大事。

—

第一件大事,我要讲的就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是毛泽东率先让华东局组织的,而后再到上海市委的。

1963年,俞铭璜时任华东局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主持工作。他是原江苏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1960年11月调来上海。我是1961年2月到华东局报到,报到地点在衡山宾馆,那个时候华东局还没有房子,就在一、二、三楼,宣传部办公占一个楼面。俞铭璜抓工作的时候,理论处就两个人,一个是洪泽,一个是我,洪泽是处长,九级行政干部,省委书记级别的。俞铭璜也是九级,他们两个是老战友,关系非常好,大家都是苏北地区来的,又都是陈老总手下的,俞铭璜是新四军的才子。俞铭璜经常到我们办公室来,一个办公室就这么大,他们两个人讲话我全听得到,他们也不避我。

那一天,俞铭璜来了,他说:老洪,柯老把我找去,说主席要批北京市委的修正主义,要我组织人写文章,我和他们讨论了,出了十个题目,这十个题目可以写成文章,一篇是《有鬼无害论》,这篇文章由我来写。还有一篇《评“海瑞罢官”》,我组织姚文元写,另外还有几篇,总共十篇。俞讲到最后说,“《阶级的产生和消灭》这篇文章,小唐啊,你写”。当时我坐在旁边,他不叫我唐荣智,叫我小唐,我当时只有29岁,他当时40多

岁。我前几天正好写过一篇文章《阶级的起源》,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这是我业余写作投给《解放日报》的,复旦的蒋家俊也写了《阶级的起源》,两篇文章有共同的题目,但各有侧重,编辑找到我说:“你们两个人的文章合起来吧!”就共同署名发表了。俞铭璜肯定是看到了,他说,“小唐,你写过《阶级的起源》,再写阶级的消灭,就是第十篇文章”。俞铭璜就是这样布置下去的,因为他明确说,要批北京市委修正主义的,江青来叫华东局组织写文章。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我们是知道的。但我们不称江青的,叫“客人来了”。

一个礼拜后,俞部长又到理论处来找老洪了,他对老洪说:“今天我放松了,我奋斗了一个礼拜,开夜车,把《有鬼无害论》写出来了,今天早上送《文汇报》了。”后来,《文汇报》就登出来了,用的笔名是“梁璧辉”,不是“俞铭璜”。隔了几天,俞部长的秘书张森昌跑来跟我说:“俞部长的文章稿费来了。”他问俞部长,你为什么笔名叫“梁璧辉”?他说璧辉和铭璜是对称的。当时我们就拜读文章,文章真是写得非常漂亮。(采访者注:据《文汇报》记者郑重在《毛泽东与“文汇报”》一书中的说法:1963年5月6日、7日两天,《文汇报》以几乎两个整版的篇幅,发表署名“梁璧辉”的《有鬼无害论》。其实,《文汇报》的人当时就知道,此文为华东局宣传部俞铭璜奉柯庆施之命而写。俞铭璜将文章交给陈虞孙,陈虞孙再交给唐振常,编辑一字未改,全文照发。后来才知道,柯庆施看了俞铭璜的文章,认为写得太学术气了,柯庆施就叫张春桥改。文章写好后,柯庆施说:你们两人合作写的,笔名就叫“两笔挥”吧,后来用其谐音即成“梁璧辉”了。又:1966年11月28日,江青在文艺大会上说,它是“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1967年,江青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1962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谈话,他们都不听。



1965年5月,华东京剧会演期间,华东局宣传部同志与大会工作人员在锦江饭店合影,前排(左9)为部长夏征农,(左10)为副部长洪泽。

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真正解决战斗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呵!“)

为了你们的这次采访,我特意打电话向宣传部文教处的张文香核实。据张文香说,俞部长这段时间很怪,常常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鬼的故事你看过没有?”我说看过的,这个鬼那个鬼讲了一通,李慧娘是鬼。他就问你觉得李慧娘这个鬼怎样,我说李慧娘是好鬼,人中间有好有坏,鬼当中也有好有坏。后来还叫张文香抄稿子,因为张的字很端正。实际上这《有鬼无害论》是十篇文章的第一篇,姚文元的文章还没有出来呢。

我的文章写了一个月后交给俞铭璜,一个礼拜后,俞部长到办公室,他不找洪泽,直接找我说:“小唐,文章我看了,前面写得还可以,后面你要改。”我就按俞部长的意见改成第二稿。又是一个礼拜后,俞部长说:“后面还是要改改。”直至第三稿送上去,好久不见俞部长来,我就去找秘书,秘书说俞部长生病了,在华东医院住院。我到华东医院去看俞部长,俞部长住的是一个人的病房,他一只手按在肝上,原来他得了肝癌,一只手拿着稿子坐在床上改。我看改的正是我的文章,我说,俞部长,你养病要紧,文章还是我来改。于是,俞部长讲了修改的意见:阶级是在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经过若干年以后,要消灭阶级,一定要把这个历史条件消灭掉,如果这个历史条件还存在,还会产生新的阶级。现在社会主义公有制解决了,但阶级产生的条件没有完全解决,比如说分配,有的人利用分配这个环节,多分少分,产生新的阶级。总之,他讲了列宁的观点,要

消灭阶级,就要消灭阶级产生的条件。但是,俞铭璜不久就过世了,我的这篇《阶级的产生与消灭》也就搁下了。

这十篇文章中,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也是俞铭璜组织的。记得我在改文章的时候,俞铭璜就说你要改,姚文元的文章我也看了,也叫他退回去再改。当时根本谈不上张春桥。张春桥实际上是柯老办公室的,柯庆施办公室有四个人,一个楼面四间房间,柯老一间,张春桥一间,蒋文杰一间,他们两个是高级秘书,还有一间是柯老的机要秘书,管文件。华东局成立后,柯老是书记,把蒋文杰放出来了,于是蒋文杰到理论处当副处长,作为洪泽的助手,我在洪泽、蒋文杰的手下当干事。张春桥是高级秘书,是帮柯老起草文件,出点子的参谋。张春桥我不熟悉,只知道他写了一篇《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受到毛泽东重视。所以,“文化大革命”不是从上海开始的,批判《海瑞罢官》也不是从上海开始的,是华东局柯老着手组织的。柯老兼上海市委书记,华东局包含了上海,但上海不能代表华东局,俞铭璜就不是上海的,他是从江苏来的。由俞来组织批判《海瑞罢官》,怎么能说是张春桥组织的?

总之,江青带着毛泽东的意见来找柯庆施。柯老写过《乘风破浪》,得到毛泽东的称赞。但柯老不具体搞理论,搞理论的就是俞铭璜。柯庆施为什么会找俞铭璜?因为柯庆施当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的时候,俞铭璜是江苏省委常委、文教部部长兼宣传部长,柯庆施和俞铭璜关系极好。柯老一到华东局当书记,俞铭璜就调来了。俞铭璜

组织这十篇文章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这是历史事实。

姚文元的文章共八稿在那里面磨啊,但第一稿是柯老通过俞铭璜布置的,是俞铭璜磨的,不是上海市委讨论的,是由华东局牵头的啊。后来,为什么到上海市委去了呢?柯老叫华东局抓,宣传部长抓,但俞铭璜去世了,那柯老找谁去啊?!谁知柯老不久也过世了。这样就由上海市委来组织了。我的意思,也是史实,就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先有江青、柯庆施、俞铭璜起的头,所以华东局是最早的发动地。现在所有的文章,都说江青到上海来找柯老,由张春桥来布置写《评“海瑞罢官”》,这个说法与史实不符。

我要作为当事人,作为历史的证人,还要告诉大家一个情节。姚文元文章出来的当天,就是1965年11月10日。毛泽东在哪里?是在北京,还是在上海,我不知道,反正是我接的电话,是中共中央打电话给华东局宣传部的,说主席要华东局通知华东六省第二天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于是,我立即报告洪泽副部长。洪部长说与夏征农部长商量后,要我向电话总机通知六省宣传部转接。那个时候没手机的,全是红机子的保密电话。总机通知六省宣传部后,大概10分钟第一个电话来了,是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欧阳惠林。我马上叫洪泽部长来听电话,洪泽说:中央通知,今天《文汇报》上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你们省委的《新华日报》明天要保证登出来,明天见报。一个电话结束,这样六个省的电话全是我接的,然后由洪部长电话通知。整整一天,上午布置电话,下午接听电话。下班时,洪部长对我说:明天你到阅览室把各省报纸拿来,你看一看,他们把姚文元的文章登了没有?登在第几版?你再写个简报。第二天上班我到阅览室一份一份核对后,便起草了一个《简报》交给洪部长,洪部长看后交给夏征农签字送书记处魏文伯,魏文伯签发后,再印成简报上报中共中央。关于这个情况,从来没有人讲过,我是经手人。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

这么一个大事,单独借助一个大城市,尽管上海很有典型意义,但它没有腹地,也是不行的。所以华东局六省就为腹地,上海在华东局之内。这样既有柯老,又有腹地,包括上海在内,六省都响应,影响就很大。这是我对史事的分析,后面两件事情也印证了我的观点。

二

第二件大事是戏剧革命。

1963年年底,华东搞了华东地区话剧会演。1964年6月,我们接到文化部通知,全国搞京剧会演。所以,1964年6月到8月,华东局组织了一个观摩团,洪泽部长带队,一个文艺处副处长吴伟,就是石西民的夫人,还有我,三人代表华东局宣传部到北京去看长达两个月的京剧会演。我在这两个月里看了六十八场戏,天天看京剧。全国各地的京剧团,有的是正式演出,有的自己带来节目,也要来露一手。江西有个《强渡大渡口》,演出的时候周总理来看。第四排全是给贵宾的,我坐在他旁边,赶快去叫洪部长。演出完毕,周总理、洪部长上台祝贺,周总理还讲了强渡大渡河怎么打法,戏应该怎么改等。

京剧会演结束后,一大批剧目出来了,有几个比较好的,江青就在京剧会演的基础上搞样板戏。1964年8月以后,江青到上海找了柯老。说要搞现代戏,要华东局帮忙,柯老就找了宣传部部长夏征农。夏征农又找洪泽商量。夏征农是



唐荣智(右二)与采访和整理者合影

有一套想法的,既然柯老要夏征农参加么,夏老就找江青了。江青说:我们要抓现代戏,夏老你来抓。夏老说,上海不大好抓,我抓不动,因为夏是从山东省委书记调过来的,他说上海抓不动,说华东地区那么多剧目,那么多剧团,那么多京剧、戏曲、话剧,我搞普及,你江青同志来抓提高。夏征农就是这样子跟江青讲的,江青非常不开心。结果,江青找柯老提意见,说夏征农不支持,柯老就找了魏文伯,魏文伯就找夏征农谈话,说:你怎么搞的呢,江青同志对你有意见,叫你搞现代戏你不搞。夏征农说不是不帮忙,是不好搞,上海推不动啊。我们搞普及,她搞提高,不是蛮好嘛,普及、提高不是都要搞嘛。这样,江青就找了张春桥。在这个过程中,有一段时间,就是江青到上海来看戏,一个小剧场,除了演出的人,下面看戏的一共十几个人。市委宣传部文艺处两三个干事,其中有徐景贤,张春桥有时也来。我们华东局这里,夏征农部长,洪泽副部长,带华东局宣传部几个干事都坐在后几排。

华东的京剧会演,我们搞普及嘛。我就跟着洪部长到江苏、安徽等华东六省到处看戏。所以现在讲“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一个就是《评“海瑞罢官”》;一个是搞京剧革命,搞现代戏,这两件事情都是从华东局开始的,后来才转到上海。

三

第三件大事,就是要打倒所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这要从上世纪30年代思想文艺战线上的斗争来讲。“文化大革命”发动的正式文件,应该是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这是正式的中央文件。中央文件下来时,我正在浙江平湖搞“四清”。突然部里来了通知,说外出的干部统统回来,有重大事情要回来参加学习,参加“文化大革命”。

我回到部里,有一天,通知部里的干部统统开会。当时由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杨凯来传达中共中央文件。这个中央文件,就是《五·一六通知》。下达后,大概隔了不到十天,中共中央新发的一个文件——即免除华东局宣传部夏征农部长的职务。文件通知很短的,但中间有一句我印象很深的,就是说夏征农是“三十年代文艺黑线

代表人物”。我是第一次看到中央文件提到“三十年代文艺黑线”。以正式的中共中央文件,来发动“文化大革命”,来“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全党第一个就是夏征农,就是在华东局。

昨天,为了这次采访,我跟徐扬通了电话。徐扬是华东局宣传部的一个干事,他原来在江苏搞《群众》杂志。他说夏征农100岁的时候,大概2004年了,原华东局宣传部的人为夏老祝寿,那天我没有去,徐扬参加了。本来以为夏老不会来的,100岁嘛,跑不动了,哎,他来啦。来了以后,大家坐下来,主持会议的人还没讲,夏老自己讲,他说因为今天都是宣传部的人嘛,我不怪大家批判我,打倒我。他说我告诉你们,1965年杭州会议时,主席讲,夏征农不适合做宣传部部长。这个话从来没有透露过。毛泽东讲夏征农不能当宣传部部长,你还当得了?!结果回到上海,魏文伯书记见夏征农,说主席讲,你不好当宣传部部长了,你是不是就不当了?你来当华东局副秘书长。夏老说我不干,我为什么不能当宣传部部长啊,主席也没有讲我有什么问题啊。夏老这个人很硬啊。结果他没下台,一直到《五·一六通知》后来了中央文件,还是由周总理签发的,他当然要下台了。

所以我说“文化大革命”的初级发动阶段是在华东局。从华东局机关推向华东六省,包括上海市,然后再推向全国。而“文化大革命”在华东局第一个采取组织手段,第一个罢官打倒的就是夏征农,就是华东局的宣传部部长。■

(责任编辑 徐庆全)

本刊调价启事

尊敬的读者:

感谢您们对《炎黄春秋》杂志的支持和钟爱,为缓解不断上涨的成本压力,自2014年1月起,《炎黄春秋》杂志每期定价10元,全年定价120元。希望您们理解并继续支持《炎黄春秋》。

炎黄春秋杂志社
2013年8月16日

我参与起草《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 郝怀明

1985年1月至5月,我参加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起草工作。这个文件的起草始于1984年10月。现将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文件起草的全过程,及我所知道的有关情况,特别是中央领导同志的主要意见,如实介绍如下。

弊端在哪里?改革改什么

1984年10月20日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后,科技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提上日程。10月29日,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决定成立领导小组,由胡耀邦、赵紫阳主持,日常工作由万里领导。万里在会上提出让胡启立负责。领导小组下设两个工作班子,分别由教育部和国家科委主要负责人牵头,尽快提出关于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的初步方案。

11月14日,中央书记处开会,听取教育部部长何东昌关于教育改革提纲的汇报,并进行了讨论。

当汇报到现在社会上普遍轻视职业技术教育时,万里说:就是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学是为了做官。从现代化的观点、发展商品经济观点来看,教育存在的问题可大了。

当汇报到高等学校部门所有制的弊端时,万里说:部门所有制的弊端还没有说够。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综合,有许多边缘学科,因而越来越需要知识面宽的人。可是我们的高等学校专业越分越细,走的是相反的道路。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弊端。部门所有制,人才部门所有,也是一种封建割据,培养的人知识面小而窄。

当汇报到现在大学毕业生是“统购包销”,对学校没有压力时,万里说:学校没有压力,更主要的是学生没有压力。这是更坏的一个没有压力。学生考上大学就有了铁饭碗,学好学坏一个样。要是有个后门,学习坏的还可能比学习好的

分个好工作。应该研究,学生考上大学后,怎样使他们有学习的动力。现在勤奋学习、为国家多做贡献的空气还不浓。

当汇报到今后毕业生分配指令性计划要缩小时,万里说:我们的政策应保证大学生不失业,但在分配上不能保证。有的大学生不好好学习,没有知识,就不能分配,宁可用中专生也不用他。改革能不能大胆一些。可能有人骂娘,说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没有了。社会主义培养懒人,那还行?胡启立说:不管好坏都统一分配,待遇一样,这个办法不好。还是要用物质手段和思想工作吸引他去,不要迷信计划分配。

教育问题是个老问题,其弊端到底在哪里,改革到底改什么、怎么改,其目标和方法是什么?它不像经济体制改革那样,已经搞了多年,又开展过许多讨论,并且农村改革已经在实践中获得了成功,教育改革不具备这些有利条件,所以文件起草难度大。

部长的汇报,没有抓住主要矛盾,大家听了觉得主次不分,眉目不清,相继发表意见,就文件怎么写,写什么,进行了讨论。

胡乔木说:万里同志提出打破部门所有制,非常重要。不下这个决心不行。否则高等学校、中专都不容易发展,就连在职人员的培训也不行,统统分散在各企业、各部门,质量无法保证。打破部门所有制后,钱从哪里来?(万里插话:扣嘛。你不出钱,我不给人。可是教育部要真正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部,统筹规划全国的教育事业,不要只是直属高等学校的教育部。不然,部门不放心。总之,要使部门觉得比他自己办大学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好人才。)胡乔木还就就业后教育、党政干部的来源问题发表了意见。

胡启立说:究竟教育改革的最迫切的问题是什么?教育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究竟在哪里?

都要进一步思考一下,也不一定就是一个问题。小平同志提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教育要“三个面向”,当前最大的弱点在哪里?我觉得可能是职业技术教育。胡启立对看不起职业技术教育,热衷于办大学的现象进行了批评,并就办学规模问题、政府和学校的责任、是否实行校长负责制问题,以及教育改革的方法问题,发表了比较系统的看法,强调文件只能讲基本的思路,具体情况不同,具体办法不能完全一律。

田纪云说:教育改革有三个问题要研究透:一个是高等学校是不是同部门脱钩?这是体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教育要适应社会各方面的需要,培养的人要能人尽其才,就很难办到。因此,部门办学的利弊到底是些什么,要研究透。如果说好处就是能解决投资这么一条,那就可以否定它。我们搞经济的人有办法解决。二是职业教育和基础教育采取什么体制。我认为,光由教育部门一统天下不行,必须多渠道、多层次办学,发挥多方面的积极性。但质量要求要统一,教材要统一。万里同志说过把一批中学改为职业中学,大家非常赞成,培养这么一批人,比大学生降格使用好。受过职业训练的人很顶用。总之,高等教育要相对集中,普教、职业教育要放开。三是对企业提政企分开,教育要不要提政教分开,这要慎重。我倾向提扩大学校自主权,不提政教分开。现在把文凭身价提得太高了。要适当降低文凭的价值,应当强调实际水平。

胡耀邦最后说:将来的文件写成什么样子?我看要写成教育改革的基本纲领性的文件。题目可以放小一些,比如叫关于教育改革的若干主要问题或者一些主要问题。次要的、零碎的问题不要写,情况也不要写太多。他还就文件写几个问题发表了具体设想。他说,是不是可以写八个、十个部分,第一部分写个总论,至少可以写四条:一是教育改革的重要性;二是教改的总目的,讲教育改革是为什么服务的,赞成万里同志的讲法,是为了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好人才,什么是好人才要具体化一下;三是人才的规格是什么;四是出人才的两个矛盾:教育内部的弊端要改革,二是国家财力物力有限,大家想办法出力解决投资问题。第二部分写加强基础教育,也写

三、五条。第三部分写中专和职业教育,把万里、启立同志讲的几个问题写进去,也讲几条。第四部分写大专教育,结构不合理,体制改革,教学方法,一直写到分配,这一部分可能要多写几条。第五部分写在职教育。第六部分写教师队伍问题。第七部分写管理体制。第八部分写加强对教育的领导。他要求,要提纲挈领,写得清清楚楚,要求要明确,旗帜要鲜明,不要含糊,不要绕开矛盾走,也不要啰唆。教育部想办法先拿出个稿子,12月中旬再讨论一次。时间宜早不宜晚,尽快拿出个稿子来,走群众路线征求意见。

主要做法是: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改革高等教育体制

从11月20日起,胡启立亲自率领教育部、中央办公厅和文件起草班子的同志,先后到安徽、江苏、广东进行了为期半月的调查,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大、中、小学的领导和教师座谈,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对教育问题严重性,以及教育改革的紧迫性有了深切的感受。

12月22日,胡启立给胡耀邦、赵紫阳及中央文件起草领导小组写了一份题为《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几点意见》的报告。报告陈述了现行教育体制存在的弊端,并对文件的起草提出建议。“其基本观点是: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教育改革的目的是培养人才,要培养适应现代化建设的数以亿计的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数以百万、千万计的社会各个领域的专门人才;教育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经济体制相配套的,符合中国国情、适应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要求的教育体制。主要措施是:一、改革高校管理体制,首先是改革招生计划和分配制度,在党和国家大政方针指导下,逐步改变高等学校全部按国家计划招生、毕业生全部由国家包下来分配的办法,增强高校主动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动力和活力,改变政府对学校统得过多、管得过死的弊端,使高校成为依照国家法律和教育规律办学、相对独立的办学实体,逐步建立和完善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充分调动高校办学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二、改革中等教育结

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这是德国、韩国等许多国家快速发展的“秘密武器”,我们应认真研究和借鉴。三、稳定中小学教师队伍,组织全社会力量,加强基础教育,在中国建立九年义务教育制度。义务教育的经费应当由国家和社会“包”起来。四、为了加强对教育体制改革的领导,建议成立中央、国务院教育领导小组,统筹考虑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大政方针,研究制定相应对策,把教育事业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之中。”(胡启立:《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前后》,《炎黄春秋》杂志2008年第12期)

这些意见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肯定。邓小平12月30日批示:“很赞成”。

于是,以这个报告的基本精神为骨架,1985年1月8日教育部写出了《关于教育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送审一稿)。下午,胡耀邦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

教育部部长何东昌宣读完《决定》后,胡耀邦让大家谈谈观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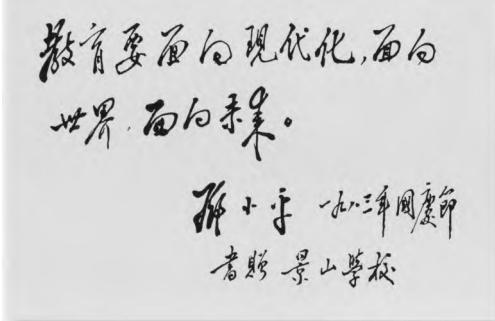
清华大学顾问刘达首先说:我一年半跑了黑龙江、四川、安徽100多个地方的小学、中学和师范,找学生谈,看他们的作业,一个明显的印象是师资队伍实在太差,我看起码有一半教师不合格,有的简直是胡说八道。他建议教育投资不要撒胡椒面,要集中力量办师范。

胡耀邦说:要多搞一些人去察看察看。发号施令的人太多,调查研究的人太少,各条战线都是如此。刘达同志一年跑了那么多地方,假如大家都意识到基础教育搞不好不行,那就好了。大学的情况多少也是清楚的,大学教员、教材都陈旧落后。刘达讲的中、小学的情况加深了印象,师资、教材水平惊人的低劣。

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于光远说:教育要分成远期、中期和短期起作用这三个层次,一层一层来搞。师范有两大问题:一是愿不愿意去,二是师范本身如何教人家做教员。教师光有知识是不够的,还要懂教育。《决定》有很多新的想法,但就是没有一个贯穿的思想。



邓小平为景山学校题词



1983年10月1日,邓小平为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胡耀邦说:我看了还是抓不住。你们做了一个很好的大面包,但不知从何下口。面铺得很宽,少数民族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在职教育,都有很多死规定。面面俱到,无从下手。

万里说:刘达讲的问题是根本性的。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21世纪还是翻不了身,还是贫困落后。这个文件面面俱到,还是要把一些问题突出地写出来,不能搞得那么长,有三、五条就行了。部门办学,你们就是不敢接触这个实质性问题。大学除军队院校外都独立出来,启立讲的几条很好,你们怕什么?

胡耀邦说:取消那个重点大学的话。那是我们自己封的嘛,要取消。谁办得好谁就是重点。

胡启立说:重点大学是不能领导封的,而是要靠自己创出来的。

于光远说:这个《决定》要使大家对教育作用的认识大大提高。大学的主要问题是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特别是文科,死记硬背,表示学生

成绩的是一大堆的分数。学经济的不做习题,只是读书。文科要进行案例教学,让学生学会分析。我们现在的教法是“缺点再生产”、“愚蠢再生产”,高分低能。一辈子花在考试上有多少时间!

万里说;为什么中国人是有聪明智慧的,而发明创造却那么少?要研究中国的历史。为什么欧洲的科技这么发展,中国这么差?就是我们的教育有问题。

胡启立说:我总的觉得,这个文件教育部是花了很大力气和心血写的,有许多新的改革思想,有很多好的东西。但确如耀邦同志所指出的那样,从高等教育写到民族教育,写得多了,必然面面俱到,有的比较原则,有的又过分具体。究竟怎么做?我觉得中心就是教育必须面向经济建设,培养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相适应的各级人才。过去确实是脱离实际。过去总强调要明确教育的重大意义,明确教育的指导思想,这些都是不错的,必要的。但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要找到一个杠杆,使教育外有压力,内有动力、活力,有能自动按社会需求调节的机制。现在一套工资、劳动、人事制度确定要使大家都来考大学,就只有这一条路。又是全国统考,一张考卷考10亿人。农民为了鲤鱼跳龙门,都要送子女上大学。我们不能怪下面的同志和基层干部追求升学率,因为这个指挥棒是客观存在的,它指挥了我们的教育体制,也指挥了我们的教学内容。不按这些来教学,上不了大学,家长就不答应,所以不得不都来念这部经。这个如果不改变,还是一张考卷考10亿人,一次考试定终身,怎么能培养出国家需要的各种人才?而这种状况是由于实行统包统配而形成的。统包统配,大家都来上大学,这一条不打破,教育就会与社会需求背道而驰,同时也不符合人类智力结构的比例。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同现在的统包统配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目前的局面,不抓住这一个不行的。我们同何东昌、彭珮云(教育部副部长)、张文松(教育部副部长)商量,想从招生分配入手把原来的教育制度冲一冲。这个稿子试图找出这么一条路子来改变目前的状况,这样供求就要见面,教育就要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否则就没有人来出经费,你就不能招到那么多学生。这样学校就有

压力,有必需的动力和活力。这个龙头抓住了,就不会形成90%的学生都去考大学,可以使中学和职业中学的调整成为可能和必要。应该把现在头足倒置的状况改过来,小学教育要国家和社会承担起来,把大学的包袱甩掉。作为中小学经费来源的一个辅助手段,就是以厂养校。大学收学费可以有浮动,办得好的可以多收学费。科研基金、拨款应该以科研成果作依据,同行评议,择优支持。

何东昌:耀邦同志,能否按启立同志讲的路子写,把教育部管的事情统统删掉。

胡耀邦表示赞成,并就文件写几个什么问题讲了他的意见。他说:第一,还得讲讲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的极端重要性。方针不要讲那么多,就讲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好人才,讲与事业很不相称。成绩讲几句就行了,着重讲讲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教育上不去,国家就发展不了。第二,是从大学写起还是从下边写起,我没有想好。从长远看,先从国民教育写起有好处。基础不好是不行的。我提出这样一个思想:明确地说,从明年开始,认真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要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钱从哪里来?收入300元以上的乡镇收1%的教育税,不到300元的由国家补贴。上不起学的,要照顾一下。领导的责任,农村归乡镇,城市归街道、大企业,放权一直放到下面。(万里:城市放到区。)还要讲一条训练学生标准是什么。第三个问题,中等技术教育怎么搞?70%改成职业技术学校,来一个死比例。学校归谁管,经费从哪里来,要明确一下。(何东昌:基础设施所需经费由国家拿,其他是谁受益谁拿钱。)第四个问题,大学怎么改革,小平、紫阳都同意启立的意见,你们就综合一下,简化一下。第五个问题要写一下师范的问题。优待师范要拿出几条来。进师范都免费,教员、学生都要优待。毕业后必须为教育服务10年才能改行。把毕生精力贡献于教育工作的人要给予荣誉,解决待遇问题。第六,写写支持其他的办学形式。最后一个写尊重老师的问题,设立教师节。

万里:6个问题很够了。

胡启立:可以先写基础教育。

万里:最不受重视的先写。写思想、政策,具

体问题尽可能少写,让大家创造去!启立同志,你们再精心设计一下。

讨论一次比一次更加深入,改什么,怎么改,一次比一次更加明确。简要地说,就是从最不重视的发展基础教育,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写起;下大力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力争职业技术教育有一个大的发展;改革高等教育体制,改革高校的招生计划和毕业生分配制度,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1月19日,写出《关于教育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送审二稿)。根据上次书记处会议讨论的意见,这次进行了很大的修改,归纳为5个问题,分别是:一、充分认识教育的重要性和教育体制改革的迫切性;二、依靠国家和社会共同努力加强基础教育;三、建立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四、高等学校应该成为相对独立的办学实体;五、加强宏观指导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体制。与送审一稿相比,面貌有了很大改观。

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

1月22日下午,胡启立召集林润青、周杰(中办副主任)、艾知生(国务院副秘书长)、郑必坚(胡耀邦秘书)、罗劲柏(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科技组组长)等开会,研究教育体制改革文件的修改问题。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在此之前,林润青已受命组织班子,承担修改这个文件的任务,他说我是老中宣部教育处的,这几年来又一直研究文教方面的问题,让我也参加这项工作。

胡启立说话一向干净利落,直截了当。他说:关于教育改革的文件,教育部已经改了两次。改革的基本方针,领导小组议论过几次。现在的二稿,比初稿有了很大进步,但还显得单薄。有些地方很具体,有些重要的地方又很简单,道理讲得不够透彻。还有前后矛盾的地方。从内容上说,好像什么都说到了,但作为一个文件草稿,还不成熟。我们自己觉得还不行,还不能拿出去征求意见。请你们几位大手笔来改一改,在这个稿子的基础上加工、提高。他还就普及教育的经费问题、教育的弊端和改革的突破口问题、政府同学校的关系问题以及学校后勤社会化

问题发表了系统的意见。

如果说在这之前,教育改革文件的具体起草是教育部为主导的话,那么,在这之后就是在林润青的具体主持下进行的了。

以林润青为组长的起草组的成员中,龚育之、郑必坚、罗劲柏是林润青“文革”前在中宣部科学处的老部下,不久前他们刚刚参加过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起草。此外,还有胡启立的秘书张德勤,中央办公厅办公室的王永海、陈逖先,教育部的李键、张天保,以及我,共10人。

1月23日,林润青主持起草组开会。他说:《决定》看了一下,不太有吸引力,不得要领。接着,他讲了自己对文件的要求和主张。他说,题目做在体制改革上,但首先得有教育思想。要把教育体制和教育思想、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结合起来,不讲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光讲体制不行。总结经验得有教育思想,建立什么样的体制也得有教育思想。教育指导思想、改革的指导思想、文件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出什么样的人才是决定的,为此就需要改革什么,要鲜明地提出来。1958年教育革命的突破口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次教育改革突破口是体制。学校只照上级指标培养学生,不管社会需要不需要。社会要给学校一种压力,学校培养人才,加工订货,人才质量高,学校就是办得好,要鲜明地反映出来。各个环节上社会的压力写得鲜明,就有鼓舞、动员作用。他强调说,题目还是叫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但要和教育指导思想、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结合,统一在体制上,都不是展开去讲。决定应该是有吸引力的,从实际中来的,能付诸行动的。他最后说,工作尽可能快、紧凑,但心情不要紧张。先看三天材料,消化消化,然后讨论。

从1月29日至2月2日,在林润青主持下,起草组连续开了五次全体会议进行了充分的讨论。讨论围绕着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高等教育、宏观管理等问题展开,大家发表了不少好意见,既有世界眼光,又有政治高度、全局观念,有理论,有实践,有措施。记得林润青在发言中特别强调基础教育的重要性。他说:中国不抓基础教育,不能跻身于文明国家之林;落后地区不抓基础教育,不能跻身于先进地区。他认为对老少边穷地区最重要的支援,就是从基础教育上支

援。比较发达的地方要派教员去落后地区任教，工作两年，由国家给优厚待遇，回来后加两级。他还提出1990年以前，在5年内把现有不合格教师轮训一遍；5年内毕业一批合格师范生，替换一批小学教师；从现有大专院校抽调教师办教师培训学校。

3月10日拿出第三稿。14日，征求教育部同志意见，共同改出第四稿。题目为《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五个部分为：一、教育体制改革的目的是多出人才、出好人才。二、把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并征收义务教育税，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三、调整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劳动就业制度，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四、改革高等学校的招生分配制度，扩大学校自主权，使高等教育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五、加强领导，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保证教育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3月16日，文件起草领导小组开会讨论《决定》稿，就教育体制改革中的若干重大方针政策问题拍板定案，并提出意见。

3月21日改出第五稿，即“征求意见稿”，由郑必坚报送耀邦：“此件改出来，拟即由中办送人大及地方征求意见。”耀邦当天阅后批示：“完全可以发出去，广为征求意见，只有早日广为征求意见，才能改得更好，更周全。要力争五月中旬最后定稿，要告教育部抓紧这个进程。”

3月22日，中央办公厅发出《印发〈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征求意见稿）的通知》，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军委政治部，各人民团体党组，在常委、党组范围内讨论，并吸收一些主管部门的负责同志和知名教授、校长参加，提出修改意见，并将各方面的意见加以整理，修改出一个本子，于4月15日前送来。

4月16日，万里同林润青谈话。他说：文件中教育思想涉及一点，但未展开。自古以来，教育思想没有根本改变：听话是好学生，听父母的话、老师的话，听领导的话，听毛主席、马克思的话，老是一代又一代因袭下来，不是启发受教育者去思考、去创造。这一点不改变，搞现代化不可能。在中国发明不出来，到外国搞成了，那里束缚人的东西少。现在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

候了，要改变教育观念。（林润青：根深蒂固，要几代人才能改变过来。）不解决教育思想问题，光解决体制有什么用？经济落后，所以教育落后，问题是教育思想培养不出人来。

起草组收到各地、各部门、各方面的书面修改意见达360余份，广纳群言，由教育部改出第六稿，又由林润青等人改出第七稿，由胡启立批印，发中央政治局常委、参加书记处会议各同志。

5月3日，中央书记处讨论了第七稿。在谈到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时，胡耀邦说：要区别情况，对城市、发达地区不成问题，问题是老少边穷地区。首先在大中城市、沿海发达地区加快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其他地区，约2亿多人，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如阿里地区，4万人，要它普及很难。万里：2亿人口地区，10年普及教育困难，认了。首先解决了3亿人口的沿海地区30%-40%达到中专以上，就是两个日本。在谈到人才问题时，万里说：对人才、教育的认识要解决。“四化”看人才，看智力。党的发起人都有知识。进城后应发展教育，但几次运动都搞知识分子，“文革”中更不办学校了。我们的教育思想没有根本改变，家中教小孩要听话，不听话就打。春秋战国时期是百家争鸣，秦以后就是子曰、圣旨、八股文，唯上不唯下，唯书不唯实。“文革”中是“一句顶一万句”。要提倡敢于提问题，敢于想问题，不要怕群众有什么“异端”，教育思想要有个根本的转变。不勤奋创造赶不上去。文件不要太烦琐，就解决战略思想和政策问题。胡耀邦说：德智体全面发展，智—现代科学知识，独立思考、独立生活能力，独立明辨是非、处理问题。德—艰苦奋斗精神。不改革思想政治工作不行。每年都要为中小学教师做一两件事。赵紫阳说：“文革”前教育取得很大成绩，要充分估计，不要因为要改革，就说过去都不好。教育改革，一是因为面临科技革命，二是国内改革开放，教育不适应。欧美教育也在改革，灌输的知识落后，怎么“三个面向”？10年普及计算机，要有紧迫感。

为了扩大和提高教育改革的国际视野，教育部特派了一个调研小组，带着第八稿，赴美国征求美籍华人专家、学者对教改的意见。他们访问了杨振宁、李政道、林家翘、聂华桐等几十位专家、学者，他们发表了许多中肯的很有价值的

意见。

此后,起草组连续改出两稿,即第八稿和第九稿。记不清是哪一稿,最后由我把大家的意见都集中改到一个稿子上,改得非常之多。

5月13日,中央书记处开会,逐段逐句逐字讨论了第九稿。会议认为这是一个好文件,是同十二届三中全会制定的经济体制改革决

定配套的纲领性文件,是个贯彻了积极改革精神而又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比较稳妥的文件,原则上通过了这个稿子,同意将这个稿子再作修改后作为主要文件提交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学习、讨论。

5月13日,形成第十稿,即“草案”稿,提交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讨论。

在这期间,起草组还为邓小平起草了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得在讨论讲话起草时,龚育之说:工作重点的转移,就包括文化教育在内,经济方面转得较好,教育还不能这样说,有的地方还在门外。这个问题不解决,“四化”无以为继。这个文件即使有一千条缺点,也是正儿八经做了这个题目,是“四化”的重大步骤,提的是时候,再不提就贻误时机。要讲讲一个有远见的党、阶级、民族,不能不抓好教育。最后要讲讲教育有希望,中心是党要抓。经济形势是乐观的,只要抓,教育也是乐观的。把教育、经济搞成良性循环。

5月15日至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这是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后,教育战线的一次空前的盛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研究实行教育体制改革的步骤和措施,共商发展和繁荣教育事业大计。

5月17日,万里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谈到发展教育和改革教育体制



1985年6月25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教委主任李鹏在中南海主持召开国家教委第一次会议

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教育改革为什么要从体制改革入手;进一步提出必须改变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教育思想、教育方法等三个重大问题。他说,今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败的一个重要关键,在于人才。只有对这一点有了深刻的一致的认识,才会对教育改革有迫切感,才会有共同的思想基础。他特别强调,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说的“善于发现人才,团结人才,使用人才,是领导者是否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一段话非常重要,值得每一位领导同志深刻认识并身体力行。他指出,轻视教育仍然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必须坚决改变。他指出,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多年来,我们的学校教育,甚至干部的理论教育,在教学方法上不善于实行启发式,在不同程度上还是用灌输式或填鸭式,上课听讲义,下课背讲义,考试主要靠死记硬背,受教育者的主动性很不够,这种教学方法主要是受陈腐的传统教育思想的束缚,是一种封闭型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如果不彻底改变这种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即使国家增加很多教育经费,仍然培养不出大量的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新型人才,特别是世界一流的人才。

5月19日,邓小平到会讲话,他说,教育决定草案是个好文件。纲领有了,蓝图有了,关键是要真正落实。他强调说:“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

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中央提出要以极大的努力抓教育,并且从中小学抓起,这是有战略眼光的一招。如果现在不向全党提出这样的任务,就会误大事,就要负历史的责任。”他还强调说,全党全国工和重点的转移,本来就包括教育。“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如果只抓经济,不抓教育,那里的工作重点就是没有转移好,或者说转移得不完全。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建设。”(《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0、121页)

5月22日,根据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讨论意见,改出第十一稿,即送政治局会议审议“草案”稿。主要改动是在第一部分的标题:“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多出人才、出好人才”后面加了一句:“提高民族素质”。这是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其他几个部分的标题最终定为:“把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改革高等学校的招生计划和毕业生分配制度,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加强领导,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保证教育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还有就是在普及教育部分,加了一句:“国家还要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加速发展教育事业。”在职业技术教育部分加了:“凡是没有升入普通高中、普通大学和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可以经过短期职业技术培训,然后就业。”此外就是几处技术性的文字处理了。“草案”由万里批印发参加政治局会议各同志。

5月27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文件“草案”,同意正式公布。

当天,林润青、郑必坚等又作了几处修改,是为第十二稿。最重要的一处修改是,第一部分的标题,原来是“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多出人才、出好人才,提高民族素质”,现在把“提高民族素质”一句提到了“多出人才、出好人才”的前面,改为:“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把提高民族素质摆到了更加突出的地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动。现代经济是知识经济,国家之间的竞争,人口的素质越来越成为决定的因素,依靠廉价劳动力取胜的机会越来越小,所以强调提高民族素质就显得非常必要和重要。接着,有一句讲教育的

重要性的话,原来是这样的:“今后事情成败的关键在于人才,而解决人才问题的基础在于教育。”现在改为:“今后事情成败的一个重要关键在于人才,而要解决人才问题,就必须使教育事业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有一个大的发展。”这样一改,教育的重要性,教育改革的紧迫性就更强烈了。还有,就是现在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部分,加了“生动活泼地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学生很不够”;在发展盲、聋、哑、残的特殊教育加上了“弱智儿童”;在着重职业技能训练的后边,补充了“训练的范围不要太窄,基础教育也要适当配合,以适应长期广泛就业、进行技术革新和继续进修的需要”;增加了实行“双学位制”,“有指导地开展勤工助学活动”;在“新的信息传递手段和认识工具的出现”前边,又加了“新科学技术成果的产生,新的科学技术领域的开辟”。在改革时限的要求上也稍微松动了一点,如“要争取在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使绝大多数教师能够胜任教学工作”,将“五年左右”改为“五年或者更长一点”;“力争在五年内,使大多数地区的各类高中阶段的职业技术学校招生数相当于普通高中的招生数”,改为“五年左右”。此外,还有个别技术性的改动。

当天,林润青、郑必坚署名,送“请启立同志审阅后转耀邦同志审阅。”启立当即阅批:“拟同意,请耀邦同志审示。”胡耀邦当即圈阅同意。

这个文件是一个与《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相配套的重要的纲领性文件,对我国教育事业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责任编辑 徐庆全)

启事
《炎黄春秋》杂志尚有少量往期刊物零售,有需要的读者可电话咨询购买。

联系人:崔秀岭

手机: 13611159388

电话(传真): 010-60342528

汇款地址:

北京市房山区102488信箱3分箱

邮政编码: 102488 收款人: 崔秀岭

周扬与清除精神污染

○ 顾 骚

批判人道主义、异化,清除精神污染,是“文革”后第二次“左”倾思潮回潮,是“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第二次高潮,是思想启蒙运动中一起大的波澜。

十年“文革”的空前浩劫,引发全民族进入一个反思的年月。人们追寻的那场浩劫的根源,并上溯20世纪50年代以来几十年中国人民经历的曲折、不幸、挫折、苦难的缘由,人们发现“神道”的沉重,“兽道”的施虐,“人道”的泯灭,人的价值的跌落。人们陷在现代个人迷信的愚盲之中。展望新时代现代化的建设,尊重人,重视人之紧要。广义的人道主义是一种重视人的价值的价值体系、价值观念。我国历史缺乏个人主义的文化传统,只有暂时坐稳了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人身依附的奴隶主义、蒙昧主义和专制主义、皇权主义的历史传统。对于20世纪新的启蒙运动汹涌而来的思想解放潮流所做的抵抗,其顽强程度可以想见。迨至马克思忌辰100周年纪念活动时,其冲突程度达到白热化的地步,这就是近现代先进人文主义、人道主义思潮,与我国深厚的、久远的、强大的、专制主义文化传统观念及党文化的生死大搏斗。这就是周扬《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一文的理论价值与意义,也是周文遭到强权势力话语剿杀的历史背景。

周扬报告引起胡乔木的不满

1983年3月7日是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中共决定开两个会,一个是纪念会,由中共中央名义召开,总书记胡耀邦作报告。一个是学术讨论会,以中宣部、中央党校、社会科学院、教育部的名义联合召开。由周扬作报告。周扬决心对马克思逝世后100年来,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得失教

训用100年来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进行检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行探讨;而不是写一篇应景的文章,说些空话、套话。周扬对这篇报告确实十分认真,十分重视,想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作科学的探索,力求在理论上有点新意。他说:“写纪念马克思的文章,对我有一种吸引力,也有一种责任感。我希望能够说一点多少有些新意的意见——新意就是探索。”

他亲自挑选了王若水、王元化和我三个人协助他写这篇文章,起草这个报告。我们在天津人称作“天津钓鱼台”的一处园林式宾馆,从2月初到3月6日,关起门来静心写作近一个月。宾馆对外封锁。一开始,周扬同志即要求大家先不谈报告怎么写。写些什么;先谈马克思逝世后100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我们四个人做到敞开思想,毫无顾虑,毫无顾忌。我们既看到100年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他的青春活力;也看到他在一定时期和一定场合,也有过停滞、倒退,甚至质变这样触目惊心的事实。我们看到了被称作一盏“欧洲共产主义明灯”熄灭了,亚洲的一个佛教国家四分之一人口被杀戮,犯下反人类罪行的刽子手,曾被册封为“共产主义英雄”。那时我们还未能看到尔后出现的苏联的解体,东欧的剧变。我们谈了整整两天,每人半天。周扬同志最后发言,他的理论概括能力很强,他谈完,报告的四个部分框架也出来了,即,一、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二、要重视认识论问题;三、马克思主义与文化批判;四、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讨论完毕,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若水因有重要家事变故,不得已,第三天便回京了。执笔起草落到元化和我两人身上。报告分四个部分,我写第一、四部分,元化写第二、三部分。第四部分第一稿写出交周扬同志后,第二天周扬同志将



1983年4月8日上午,周扬会见法共《人道报》代表团之前与《人民日报》的同志们交谈。(左一为袁鹰,左二为秦川,左三为周扬)

稿退我修改,郑重地说:“还要写‘异化’。”他说他一宿未睡好。苏灵扬同志也证实说:他昨晚一夜翻来覆去未睡好。第一稿我未写“异化”,是因为周扬同志谈报告提纲未谈“异化”问题。写“异化”,我当然赞成。黑格尔提出“异化”概念后,费尔巴哈将它用来说说明宗教的起源,宗教的本质,一下子就把问题说清楚了,上帝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异化”,用的真精彩。崇拜上帝就是崇拜自己吧。马克思提出“劳动异化”到“人的异化”,研究政治经济学,达到革命性结论。联系到当前社会,联系到改革开放,防止国家工作人员,从人民公仆,变成社会主人,这一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得出的教训,“异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辩证概念。要说这篇文章理论有突破,就在这里。周扬同志在这前三年的1980年9月,应胡耀邦同志之邀在中央党校作了一次演讲:中心思想就是通过改革,克服各个领域“异化”现象实现人的物质和精神的全面解放。演讲有一节就是“人道主义与异化”,和我们这次报告稿第四部分标题一模一样。我们起草的报告稿,便以周扬同志这篇演讲作为底本。其中移用了若水发表文章的某些论述。我在1980年发表的为人性论正名的《人性与阶级性》文章,也涉及了“异化”问题。(见《文艺研究》1980年第三期;《顾骥文学评论选》,《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文学理论卷一)若水是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最早提出“异化”问题的,人称“人的哲学家”。他有精湛理论修养。批周扬连

带批若水,似可理解,但说“周(扬)文(章)的最厉害并已形成祸害的部分,正是出于他(王若水)的手笔或构想。”(引自1983年8月13日“胡乔木给秦川的信”)是不负责任的臆断。

1983年3月7日马克思忌辰100周年学术讨论会,如期在中央党校大礼堂召开。周扬作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报告(由人代读)同时周扬将报告稿送请胡耀邦、胡乔木和贺敬之三人审看。第三天,周扬同志告我。耀邦同志已将报告圈

阅退还。事情到此似乎很正常过去了。可是,会议第二天出现了一个很不寻常的现象,意识形态大总管胡乔木下达命令,研讨会休会两天,做了准备后继续开会。组织了黄楠森等四人对周扬未点名、对报告未提名,但是明显的针对周扬报告,作了批判人道主义的发言。

1983年3月16日,周扬未被压服,本着学术自由原则,得到秦川、王若水支持,“探讨”报告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这样一来胡乔木大为恼火。1983年3月20日胡乔木指令邓力群起草了给中央的报告《中宣部关于〈人民日报〉不听招呼擅自发表周扬讲话的情况和处理意见》送交书记处,由中央下发全党。这个处理意见直白地说这么三条:一人道主义问题还要批判;二对王若水撤职;三周扬要检讨。事情一步一步升级,已经上升到“违纪”、动用组织手段处理的地步了。耀邦同志出面了,干预了。他提出文件要与当事人见面,材料要核实的意见。习仲勋明确反对邓力群要周扬做检讨的意见。于是则有了3月21日核对事实材料,胡乔木与周扬双方撕破脸皮争吵的一幕。周扬直指胡乔木的鼻子斥他“不正派”。在中宣部会后,周扬写信给胡耀邦,说明邓力群的报告许多歪曲事实之处。显然胡耀邦袒护了周扬,他根本不赞成处分王若水、周扬。后来他将文件压了下来,不予理会,这样,3月份以后,这场较量实际已在胡耀邦与胡乔木之间展开了。双方处于僵持

状态。争论的焦点,逐渐由“人道主义”向“异化”问题转移。

对“异化”争论的背后

多年来,我一直心存一个疑团:当年起草关于几个理论问题探讨报告,周扬决定谈“异化”时,为何会彻夜不眠,辗转反侧;即使说这是重大理论问题需要郑重考虑,也不至于如此啊!三十年来,我认真梳理了这个批人道主义、“异化”并清除精神污染事件的相关材料,掌握了有关的物证,在坚持实证的研究方法同时,加进精神分析法的研究,终于豁然开朗,自信是打开了谜团,解开了一环套一环的扣子。这就是周扬在决定谈“异化”问题时,有一个人横亘在他面前。这个人像幽灵一样,也像一条线,贯穿这个历史事件,或隐或显。这个人就是著名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德热拉斯。这个人,周扬未曾跟我们谈过,批判者也小心翼翼在避开,公开批判中从未与周扬挂上钩。可是就是这个似乎神秘的人物,使得周扬的担心终于不幸而料中了。

1956年人民大学何思敬教授在我国第一次将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翻译出版,国人接触到了“异化”理论问题,但并未引起广泛注意。在王震主持的马克思忌辰100年学术讨论会上,他还向周扬请教“yiyuan”两个字怎么写,称赞周扬讲得好。在座的邓力群也称赞周扬讲得好。这一年下旬,十二届二中全会前夕,邓小平先后找了胡乔木、邓力群谈话,要胡乔木主持,邓力群起草中央全会文件。胡乔木说了“当前思想领域情况和问题”。“邓小平谈了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胡乔木说“他没有向小平同志提出这个问题”。(转引自卢之超《80年代那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妙极了,胡与邓谈学术思想领域的情况和问题,却绝口不谈他认为极其严重的祸国殃民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而是邓小平主动谈这个大家很生疏的理论问题,才引出胡乔木的话题。此地无银三百两!

这个谈话在党内小范围传达,胡乔木、邓力群解释这个“异化”是怎么一回事,“异化”是怎么来的,不谈黑格尔、费尔巴哈,不谈马克思,单谈德热拉斯。

德热拉斯何许人也?他原是反法西斯战争时的南共元老,南共联盟二号人物,被认为是南联盟最大的修正主义理论家,后被开除出党,沦为阶下囚,客死他乡。他在1947年出版了一本书《新阶级》,这本书中首先使用了“异化”概念。这本《新阶级》的一个主要论点时共产党原来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已“异化”为官僚特权“新阶级”。他认为“共产主义革命是以消灭阶级为号召,最后竟造成一个握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共产主义导致了极权主义和党国体制,剥夺了人民的政治权利,人民政治权利遭到了垄断滥用,与经济和商业相结合,以至出现了对资源贪婪占有,对国民财富的贪婪掠夺。他说“当代共产主义最主要的一面,是这个所有者兼剥削者的新阶级”。

共产党最忌讳被攻击为官僚特权集团、官僚特权阶级。若是倒退到十年前,这样“反动言论”够得上坐大牢的。原来这“异化”的来源与实质在这里,难怪邓小平雷霆震怒,引起改变二中全会原拟讨论整党问题,又临时加进“不搞精神污染”的议程。一个人,德热斯;一本书,“新阶级”;一个论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已“异化”为官僚特权新阶级。邓小平引申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不是“异化”思想导致的啊?胡乔木、邓力群就在等着这句话呢(引自邓力群《十二个春秋》),德热拉斯的《新阶级》是1963年作为“批修”材料,由人民出版社作为“灰皮书”出版的。周扬1964年在社会科学学部第四次扩大会议上讲话,谈到“异化”,应是读到这本书的。他担心若是将他的“探讨”文章与德热拉斯联系起来,由此将带来祸端。这恐是周扬彻夜难眠内心恐惧的缘由。邓力群说,邓小平把问题看得这么严重,是周扬送了十八条马克思语录,这是放烟幕弹。

批“异化”已不仅不是什么学术问题,也不是胡乔木后来别出心裁造的帽子:“政治性学术问题”。有据可查的,这是地地道道的政治权谋。这一年三、四月份,胡乔木、邓力群,又将德热拉斯端了出来。他们紧紧抓住要害,背后整黑材料,向几位老人打小报告,告黑状,构陷人罪,炮制了七期黑材料,其中突出的“社会主义国家异议人士关于‘异化’的言论”,就是他们概括成的



1984年,周扬与夫人苏灵扬

“社会主义‘异化’论”,又是这个德热拉斯!

在周扬同志逝世后,我在周扬同志所藏的档案材料中,发现了周扬同志签存的我给周扬同志的一封信,可以看出当年书记处研究室是如何整材料的。

周扬同志:

书记处研究室编的《情况简报》是送政治局、书记处、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中纪委副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并加送中宣部的文件。除其中764期(83.4.22)注明:“加送周扬同志”外,加送中宣部的,几位副部长传阅,机要室同志说,因为只有一份,是不送您阅的,可能您未看到。我读了三月份在四、五天内编的几期《情况简报》真是感到不寒而栗。看来给你戴了多少年的“修正主义”帽子,有些人又要加冕了。问题还远不止如此,现抄录有关片断,请一阅,他们就是这样,在不到一周时间内,向政治局、书记处,送了一批这样别有用心的材料,这些材料的组织方法是“文化大革命”中习见。这样再来看,公开发表的讲话,究竟有多大价值?您看了也不必过分介意,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也请不要去查询,不要同他们说了。

望多保重

顾骧(83)五.四.

11月6日,首都各报发表了新华社5日电文,周扬与该社记者谈话,表示拥护邓小平在十一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轻率地、不慎重地发表了那篇有缺点、错误的文章。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周扬在胡乔木软硬兼施之下,“顾全大局”、“维护党的团结”“维护领导威信”,达到“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原则压力之下,在中顾委组织指令下,作了公开的违心检讨。

1984年1月3日,胡乔木仍然选择了中央党校礼堂,也就是十个月前周扬学术报告的同一地点,宣讲了他批判周扬的重头文章:《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同样,讲话也是由广播电台播音员代读。这一相似的形式,似乎是在宣布,这一场政治、学术理论较量中,胡乔木最终胜利。显示了胡乔木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的地位。胡乔木这篇讲话得到了一柄尚方宝剑,显赫一时。全国报刊转载,单行本印行三千万册。近三十年过去了,那种以势压人,以图在学术研究领域一锤定音的霸道做法,是“妄抛心力”了。“以人为本”已成为社会核心价值主流。虽然,嘴上说的,还不等于实际做的。“真理不是权力的儿子”,培根说得好啊!

1983年10月,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召开。二中全会以后,思想战线不能搞清除污染衍变为清除精神污染。清污呼地一下子在全国铺开,浪涛滚滚各省市自治区领导人和知名学者专家公众人物被权威部门敦促在全国广播联播节目表态,各种报道、表态性文章、批判文章充斥报纸版面,声讨“精神污染”和“人道主义、异化”等“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对已经发表出版播映过的文章、言论、图书、节目,要进行清理。“重新组织理论队伍”的举措,使人不由得联想起“重新组织阶级队伍”的提法。“清污”迅速向各个领域推开,什么是“精神污染”?当时有一句顺口溜:“‘精神污染’是一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就像“文革”开始时的“四旧”。生活中妇女留披肩发,青年穿喇叭裤(所谓奇装异服),跳迪斯科舞,都被说成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影响,当作“精神污染”的表现来反对。

一时间满城风雨,一时间人心惶惶。

可是时代毕竟不同了。人民群众不满,党的高层人士不满。主管农村工作、科技工作、经济

工作的领导同志说：农技、科技领域、经济领域不搞清除精神污染。

耀邦同志，又是耀邦同志，力挽狂澜，站出来讲话了，他11月22日向各省市先后打了电话，通知各地停止执行“不叫运动的运动”。并在12月4日，采取一竿子插到底的办法，召集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电部门负责人谈话，讲了八条意见。后来邓力群攻击胡耀邦“抵制清污，二十八天就刹车。”就是指这大概齐的二十八天。

胡耀邦给周扬平反与《周扬近作》

在作协“四大”开幕式上，未能与会的胡乔木与病中的周扬都向会议发来贺电，对于胡乔木，在会上得到礼貌性稀稀落落的几声掌声，而周扬的信却得到长时间暴风雨般的掌声，掌声如波涛般一阵阵翻滚，有好几位代表作了统计，有人掐着手表，说鼓掌时间长达两分钟，我在会场人群中，当时便感到，这非同寻常。

不能轻佻地说这是会议“插曲”、“花絮”。它是反映了广大文学家的心声。这不仅看作为过去整过人的周扬，现在经过思想解放运动的实践为人们所谅解、接纳；不仅看作为在批“人道主义”“异化”中受到冤屈的思想解放的先驱人物的同情、支持；还应该看到这实际上是成千上万文坛作家们反对那场不得人心的“清除精神污染”情感大渲染，大爆发。

1985年1月29日，《人民日报》以整整一个版篇幅发表了我写的一篇篇名《兰叶春葳蕤》“评周扬近作”的文章。（《人民日报》1985年1月29日）（《文汇月刊》，1985年第1期）这篇文章，酝酿于四次作代会前，我以一种悲愤的心情写下这篇文字。我以为总得有让人说话的时候，有说话的地方。本拟由老友梅朵当时办得很热火的《文汇月刊》发表。《人民日报》袁鹰等同志得悉，得到总编辑秦川同志拍板决定，《人民日报》与《文汇月刊》同时联合发表。针对批周扬“散布对社会主义不信任”，“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我明确表示，周扬在社会主义历史新时期，一直站在时代思潮的前头。文章最后说：周扬同志这两年“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文学艺术的发展，而进行着‘探讨’，这些探讨的是非得失，要由实践来检验，要由人民

来评判；也只能由实践来检验，由历史与人民来评判。”港报评说，这些是针对胡乔木、邓力群的，此言不虚。这篇文章同样受到外电瞩目。他们与观察《苦恋》事件的方法一样，认为这是“在‘清污’中受到批判的周扬平反”。但是，这次他们的猜测、分析、评论不准了，根本不是那回事。他们难以了解中国政治生活中矛盾的复杂性，后面没有什么背景，周扬并未“平反”。

第四次作代会以后，周扬同志病情恶化。北京医院曾报了一次“病危”通知。耀邦同志念念不忘，要给周扬同志平反。这并非仅是出于私人感情，而是对启蒙运动中先驱者的彰显。他启动给周扬平反的安排。他曾建议最高领导人，到医院探视周扬，以这种方式向公众显示周扬得到平反的目的；但是未果，碰了一鼻子灰。他又提出重新公开发表《马克斯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文章，显示这篇文章已得到当局确认，周扬得到平反。如何重新公开发表不显得太突兀？以出版周扬一本新的文章选集，将这篇文章收进，以达此目的。耀邦同志指示习仲勋同志，找秦川同志办理。秦川同志向周扬夫人苏灵扬与张光年同志传达了耀邦同志指示；灵扬同志、光年同志要我具体完成这项任务。这对我说，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我要抢在周扬同志生前，做好这件事。大约花了约半个月时间，从材料收集到编辑，文字整理、审定，突击编选了一本名为《周扬近作》的文集，交由刚刚恢复业务的“作家出版社”，于1985年6月出版。将一年多前遭到铺天盖地批判的这篇“探讨”文章，一字不改地收进文集。了却了耀邦同志一份心愿。这些年，我看到作家出版社显示他们出版业绩的材料或广告，却只字未提他们出版过这本书，应知这本书不是出版社哪位拍板决定的，也不是作协党组可能决定的。作为作家出版社开宗明义的第一本书，是中央书记处部署，贯彻耀邦同志意图出版的，也许当时出版社负责人就不明就里；由于年代长远，出版社负责人换了一茬又一茬，不了解他们出版社社史，不了解他们出版这本书在启蒙年代的意义与贡献，十分可惜。■

（责任编辑 徐庆全）

我在西南联大读书

○ 胡邦定

我1942年进西南联大，1946年联大结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各自复员回归京津，我自然也就告别了哺育我的母校。日子过得真快，一晃间，67年过去了。这半个多世纪我们经历了多少风霜雨雪、崎岖坎坷，但对联大的记忆、眷恋和遐想，却始终萦回脑际，难以忘怀。

世有“红学”，是专门研究《红楼梦》的。我看现在应该说又有了一门“联大学”，中外专家学者发表的研究西南联大的著述越来越多，有专著，更有难以计数的单篇文章。大都就联大的优良传统、办学理念、孜孜矻矻的勤勉学风、追求民主自由的斗争事迹等等进行了深入研究。誉联大为“学术重镇”、“人才摇篮”、“民主堡垒”，已成为举世公认的共识。我不想就这些问题作进一步的论述，只想从自己的切身感受，谈谈西南联大给我的教育。

1942年秋季新生开学在9月末，正是联大校园内政治空气相对低落时期。因为1941年1月发生了“皖南事变”，蒋介石在全国掀起了反共高潮。联大部分地下党员被迫疏散离校。1942年1月6日，联大一千多名同学走上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声讨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的大游行，直指国民党政权的核心人物，后被称为“讨孔运动”，引起蒋介石的震怒，派大特务康泽到昆明抓人。因而又有部分进步同学转移到云南的州、县隐蔽，许多社团活动也停止了。这样，学校里的课外活动就少了。当时我刚从四川长途跋涉到昆明来，怀有进了自己多年向往的名校的兴奋感，一切都觉得新鲜，一点也没有生活艰苦的感觉。其原因，一是抗战已经5年，对生活物资匮乏已习以为常；二是刚刚毕业的中学生活还没有联大好。看到有些联大老学长写的回忆文章说，他们当时吃的是“八宝饭”，即饭里有沙子、稗子乃至老鼠屎之类。这种情况，应该是联大早期的事情。我1942年入学时，吃的米一直很好，没有吃到过“八宝饭”。因为这时的伙食由学生自办，四五十人组织一个伙食团，从训导处把

同学的贷金统一领出来，自己下乡直接向农民采购大米，米的质量是很不错的。当然，贷金有限，菜不是很好。多数伙食团是一天吃午、晚两顿饭。早饭自己解决，没钱的就饿到12点。我们都是20岁左右的大小伙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饭尽管可以吃饱，但没油水，容易饿。老实说，每天上午上10点至12点的课的时候，肚子是饿得很难受的。

大一新生的课程基本都是必修课，包括：大一国文、英文、中国通史、逻辑学、一门社会科学、一门自然科学，还有伦理学等等，都由名家授课。如教大一国文的，有中文系的罗常培、朱自清、罗庸、杨振声、闻一多、沈从文、浦江清、李广田……皆一时俊彦。先后担任大一英文讲席的有：陈福田、莫泮芹、叶公超、柳无忌、潘家洵、钱钟书、陈嘉、谢文通、胡毅、卞之琳、刘世沐、杨周翰、李赋宁、查良铮……真是群星闪耀，目不暇接。而教逻辑学的是名教授金岳霖；教伦理学是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社会科学课中教经济学的是法商学院院长陈岱孙；教政治学概论的是著名政治学家张奚若、浦薛凤、楼邦彦、龚祥瑞、王憲愚……诸大师；教社会学原理的先后有陈序经、吴泽霖教授。真是名师荟萃，对学生来说这是一种幸运，是因抗日战争而得到的特殊机遇。因此多数人是想好好读点书的。

就我的感受来说：首先是中文系教授自编的大一国文课本使我大开眼界，体现了联大的特立独行。当时国民党教育部提倡复古，社会上“尊孔读经”的舆论颇盛。部颁大学国文教材以古文为主。联大反对这种逆流，选材既有古文，也有语体文。以我们1942年的课本为例，就有：《论语》(节选)、《左传：崤之战》、《三国志·诸葛亮传》、李清照《金石录》后序》、王国维《人间词话》(节选)，还有陶渊明、杜甫、欧阳修、辛弃疾、秦观、李清照的诗词；语体文则选了胡适《文学改良刍议》、鲁迅《示众》、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林徽因《窗子以外》、丁西林的独幕剧《压迫》等等，都是经典之作，而且全无学究

气。所选古文大都思想清新、感情真挚、朗朗上口，我至今还能背诵其中的一些篇章。尤其给我印象深刻的是《论语》选了《先进》篇的一小节。原文不长，摘录如下：

子路(名由)、曾皙(名点)、冉有(名求)、公西华(名赤)侍坐。

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

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夫子哂之。

“求！尔如何？”

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

“赤！尔何如？”

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

“点！尔何如？”

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

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

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

这一节不仅是一篇优美的散文，而且其思想、意境都使人十分向往。我上过六年私塾，读过《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也读过《论语》、《孟子》，那时年幼，基本不懂。朦朦胧胧地觉得这些书都是“讲道德、说仁义”，或者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的。《论语》有20篇，一万多字，联大中文系老师独独选了《先进》篇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一节，实在是慧眼独具，发人深省。老学长汪曾祺对此评价极高，说“这不仅是训练学生的文字表达能力，这种重个性、轻利禄、潇洒自如的人生态度，对于联大学生的思想素质的形成，有很大的关系，这段文章的影响是深远的。联大学生为人处世不俗，夸大一点说，是因为读了这样的文章。这是真正的教育作用，也是选文的教授的用心所在”。我是认同汪的说法的，虽然不免如汪君所说，有一点“夸大”。回到主题，这篇《论语》节选，确实是“联

大给我的教育”的范例之一。

前面已说过，联大的大一国文课有许多名师任教，而且都是小班，一班不过二三十人。谁分到哪位教师的名下，并不是由同学自选，而是由教务处分配的。我想大概是因为，如让同学自选，那朱自清、闻一多诸先生的班就会爆棚。由于学生人数多，除教授任课外，还有一些讲师、教员（这是联大特有的职称，比助教高，比讲师低，可以独自授课）也担任大一国文老师。他们与教授不同的是：国文每周三节课，由教授担任两节读本课，一节作文则由助教担任。而讲师或教员任课则是读本、作文一肩挑。我上的那个班的老师就是教员，叫张盛祥。我记得他教书十分认真，每次对同学的作文都要讲评一番。印象深刻的是一位爱好文艺的同学第一次作文就写了5000字。他给我看了，小说不像小说，散文不像散文，实在不敢恭维。讲评时张老师专门不点名地批评了这篇文章，事后还专门找那位同学长谈，希望他端正思路，真正想好了再写，主题是什么，怎么表达，不要杂乱无章，不知所云。看来张老师对学生是很负责的。联大名家众多，职称也比较严。我只知道第二年，张老师就转到四川白沙女子师范学院任副教授去了。教我大一英文的是诗人卞之琳，他是著名翻译家，他教外文系三年级的翻译课，据说他每次给同学出翻译题目，他往往自己先想一个很好的底稿，然后让同学翻译，每次讲评同学们的译作之后，他再拿出自己的底稿，往往语惊四座。这些事当然不是我亲历的。我要说的是我每次上大一英文课之前（作文是由一位叫陈彼得的助教担任），事先总要查查字典，了解一下课文的大意。卞先生讲解时，实际上也是他对课文的译作，我们听了以后，真觉得既准确，又典雅、通达，实在令我们叹服，真正体现了“信、达、雅”。我深感这是联大学生之福，能亲聆这些名师的教诲，至少能收“取法乎上”的作用，至于究竟能得乎中还是上或下，那就看自己的资质与努力了。

再从《中国通史》一课来说，讲授者是吴晗教授。当时他很年轻，不过33岁。中国历史教科书传统上是按朝代顺序讲的。吴先生讲课不是这样，而是按石器时代、殷商社会、春秋封建、战国七雄、土地制度、从募兵到征兵、刑法制度、科举制度……等专题来讲。这给我这个一心想学历史的人一个启发。就是对史料要有综合分析，要多读书；掌握丰富的

资料,从中形成自己的观点。泥古不化,只会死抄书是不可能有创意、有发展的。吴先生考试十分严格,我们这一班学年结束考试的成绩,最低的才12分,还有59分的。这说明吴先生对学生要求很严。为的是培养一种作风,一是一、二是二,绝不马虎。

教逻辑学的金岳霖先生注重启发学生思考,几乎每堂课都要叫一两位同学回答问题。他常说,他“认为逻辑很好玩”,而兴趣从来都是最好的老师。老师这样启发学生,我们为免被叫起来时回答不出问题的尴尬,课下就不免多复习两遍,多想想怎样是合乎逻辑、怎样不合,从而也培养了自己对逻辑学的兴趣。这是一种很好的教学方法。我感到受益匪浅。

二年级以后,本系的专业课逐步增加。本系老师中名家本来甚多,如陈寅恪、钱穆、雷海宗、郑天挺、向达、张荫麟……可惜我进联大时,陈、钱、张诸师均已离昆。雷先生是我们的系主任,人家说他声音如雷,学问如海,自成一宗。他上课从不带片纸只字,每次讲述许多历史纪年,绝对准确无误。雷先生生性耿直,不因意识形态的分歧,而不顾客观事实。1946年2月25日,联大东北社、法学会在新校舍图书馆前大草坪为抗议苏军在东北搬走机器和强奸妇女等罪恶行径举行演讲会,冯友兰、查良钊、燕树棠、雷海宗、高崇熙、傅恩龄诸教授讲话。雷先生讲得声泪俱下,列举种种事实,谴责苏军暴行。当时一些拥苏的“左”派同学,包括我自己在内,对雷先生的言行深为不满。现在冷静地想一想,雷先生的义愤是很自然的,作为爱国的、维护正义的中国人,怎么能对苏军暴行闭口无言呢?从这一点可见雷先生坚持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的原则精神是很可贵的。特别是一个历史学家,中国有“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的传统,焉能不顾事实,违心地沉默呢?就这点来讲,雷先生也是我们的师表。

以上是就一些老师和一些具体事例讲我自己的感受,实际上更重要的或更根本的是联大这个群体形成的一种氛围,一种风气。学校坚持学术自由,提倡通才教育,让学生探索自己真正的爱好和潜能所在,可以转系,可以有许多选修课。在国民党政府强调以党义(即三民主义)为唯一指导思想的时候,联大教授却开课讲社会主义。这充分体现了联大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精神。记得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赵丹说过:“管得太多,就没有艺术。”艺术如

此,学术又何独不然?联大最可贵之处就是强调自由。教学方面是这样,政治活动、政治思想方面也基本是这样。当然有国民党和政府的控制,但从学校来说,是尽量保护思想自由的。前期的情况我不知道,从1944年5月历史学会组织纪念“五四”25周年演讲会开始,联大校园内的政治空气日益浓厚,各种墙报、演讲会纷纷举办,中心思想是要求民主,反对独裁。这些当然是国民党政权所忌惮的。但校当局一直抱宽容态度,特别是“一二·一”运动,学生罢课、游行,与政府对立形势十分严峻,而教授们声援学生,校当局保护学生,更突出显示了联大尊重民主自由的精神。我自己就是在这种环境里受教育、受锻炼而逐步走向革命的。

最后我还想讲一个观点,即凡是有突出成就的人,智商必定是比较高的。但这个命题不能反过来,凡是智商高的人,必定能有大成就。事实上,许多智商相当高的人并无突出表现。原因很多,自己或环境不允许他好好学习深造是重要原因之一,王安石写的《伤仲永》一文给我很多启发。出人才的重要条件之一,是有名师。就联大来说,大师如云,这对学生是很大的激励,或曰示范作用。在联大这个环境里,有这么多大师,眼界自然就宽了,治学标准也自然就高了。当然,“弟子未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但就多数人来说,有名师指点,对自己的成长是极其重要的。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是清华数学系教授,十分重视对他的教育,加上清华园的文化氛围,尤其是在西南联大,得到吴大猷和王竹溪教授的具体指导,这对他的成就影响无疑是非常大的,甚至可以说是起决定作用的。这个认识,或者可以部分回答联大为什么出这么多人才的道理。

我是个很平庸的学生,在学术上毫无成就,在事业上也没有什么建树。但我能勤勤恳恳地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不做损人利己的事,也从不趋炎附势。应该算是一个老老实实的人。我想这是联大教育我的结果。联大许多学富五车的老师,安贫乐道,富贵不能淫,坚守自己的教学岗位;联大有许多同学,刻苦钻研,成为各方面的专家学者,终生辛勤奉献,鲜有贪污腐败者。这些都是我的榜样,也是联大教育的成果。

总之,我感谢联大增我智识,教我做人! ■

(责任编辑 杜明明)

两次长春之战与三位报人的命运

○ 张刃

1946—1948年的东北内战，历时三年。这期间，《大公报》先后有三位记者在东北采访。最早是吕德润，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10月即随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到了东北。此后，记者徐盈又随军调小组到东北，虽未常驻，但他写的报道真实地记录了东北局势。1946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东北局势成为全国关注焦点。当月，张高峰作为《大公报》特派员到沈阳，与吕德润共同负责东北报道。1946年秋，吕调上海后，东北的采访报道则由张高峰负责，直到1948年。

值得一提的是，这三位记者都有战地报道经验：抗日战争期间，徐盈在晋绥战场，张高峰在中原战场，吕德润在滇缅战场，都曾随军采访报道，对于战争是熟悉的。但是，他们又都是反对内战的，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报道并不具党派倾向，而是站在老百姓的角度，竭力“为民请命”；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报道中，还常常抨击国民党的种种腐败而倾向于共产党，这就是后来他们一再检讨的所谓“中间偏左”立场。

“可耻的长春之战”

谈《大公报》东北内战报道，不能不说1946年4月《大公报》与《新华日报》的那场“笔墨官司”。

1946年3月中旬起，苏军开始从东北撤军，作为曾经的伪满洲国首都、东北政治经济中心，长春成为国共争夺的焦点之一。4月15日，上海《大公报》以“长春苏军昨已撤去，共军进攻接踵而来”为题做了报道，并以副题“国土既归来，还流同胞血！”表明了它对内战的立场。4月16日，



《大公报》社评：《可耻的长春之战》

又发表了王芸生写的社评《可耻的长春之战》。社评说：

“在苏军纷纷撤退之际，在东北的内战形势却在加剧的进展，且已在许多地方纷纷打起来了。”“尤其可耻的，是长春之战！这两天，东北方面的军报雪片飞来……我们坐在关内深夜编报的报人，读着这络绎而来的电报，手在颤，心在跳，眼前闪烁俨若看见凶杀的血光，鼻腔酸楚，一似嗅到枪炮的硝烟。”

这篇社评的倾向是明显的：“苏军刚刚迈步走去，国军接防立脚未稳，中共的部队四面八方打来了，且已攻入市区。多难的长春，军民又在喋血……中国人想想吧！这可耻不可耻？”

尤其令中共不能容忍的是，社评里有这样一段话：“所谓军事冲突，实已到了最伤天害理的程度。进攻的战术，常是用徒手老百姓打先锋，以机枪迫击炮在后面督战。徒手的先锋队成堆成群的倒了，消耗了对方火力以后，才正式作战。请问这是什么战术？残忍到极点，也可耻到极点。”

4月18日，中共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社论

《可耻的大公报社论》进行反击,在指责国民党破坏停战协议,攻取东北多地后指出:“对于大公报社论作者,凡是国民党法西斯反动派打击人民、撕毁诺言、发动内战等事情,哪怕天大的事,都是不‘可耻’的,只有人民对于这种反动派还一还手,那就不得了,那就是‘可耻’的了。大公报社论作者如此反对人民,应该是够‘可耻’的了吧。”

针对“用徒手老百姓打先锋”的批评,《新华日报》社论说:“我们也请问大公报社论作者,这几句话,是负责任的话,还是只当放屁放一放的呢?你说进攻的战术,含沙射影,当然指的是东北民主联军进攻长春的战术而言,你从什么地方知道东北民主联军用这样的战术?拆穿了说,除了专门造谣反共反人民的特务机关那里以外,除了从国民党的‘素有经验的特工同志’办的报上抄来以外,世界上找不出这样的战术。……你在反人民这一点上,真正做到家了,真正‘残忍到极点,可耻到极点’!”

这场论战,曾经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被作为《大公报》对国民党政府“小骂大帮忙”的例证,而且几成“盖棺论定”。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大公报》研究不再是禁区,才有人提出讨论,以史料论证长春之战确实伤害了许多无辜的百姓。但是,论者引述的史实却大多有误,常常错把1946年4月的长春之战与1948年5月的长春被困混为一谈了。

实际情况是,王芸生所写社评的依据——“东北方面的军报雪片飞来”,就包括《大公报》驻东北记者吕德润的报道,特别是他1946年3月27日从沈阳发回的题为《春天里的秋天》通讯中写道,国共内战,“可怜的还是被人‘民主’的老百姓。怕闹来闹去,这群被口号呼喊的对象,连听的机会都没有了。一个例子:政府军和共产党在盘山一带打了一仗,共产党方面打第一线冲锋的是没有什么武器的人,当然后面还有正式的部队,那一仗胜负如何我迄今并未注意,我只知道双方有一万五千中国人死了!”

那么,吕德润的报道依据又是什么呢?他继续写道:“一位参加那一役的政府军官说,对那些没武器的中国人他不知道怎样放枪?当然,他的枪是放过的,假如今后这些没武器的人仍被逼着从共军方面扑上来,他仍将开枪。法库一役‘双

方死伤惨重’。双方主力的接触,战场上据说有二万多死尸。”吕德润引述的“政府军官说”是否第一手资料,今人不得而知,但从行文看,应该是他亲耳所闻,这从他后面对法库战役的记述显然是转引的对比中可以看出。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同情的是“可怜的老百姓”,痛惜的是战争使“双方死伤惨重”,而没有特别偏向某一方。

指出这一点的意义在于,它至少表明,记者的主观倾向是反对内战,而非特指某党某军。这在吕德润的报道中还有明显的主观表述:“当然类似的‘著名’战役还有,将来谁也不保险不再发生。假如这些战役是在一年前,这该是多么勇敢的冲锋或辉煌的战绩呀!我当了两年多随军记者都没有赶上这样场面,可是今天呢?可怜那些死了的东北老百姓呀!他们等了十四年的祖国同胞,今天还没有彼此看清面孔便迷糊的死了!他们的冤魂不远,他们是死不瞑目的。”吕德润所说“我当了两年多随军记者”,是指他随赴缅甸中国远征军参加对日作战的经历。这里,他显然是在把抗日与内战做对比,为“等了十四年”(指东北沦陷)的老百姓喊冤。

如果说吕德润的报道只是“孤证”,那么,请看《大公报》社评发表次日(17日)刊登的《大公报》另一位记者徐盈发自东北开原的报道。他随军调小组去长春,路遇国军部队,他写道:“战争是惨酷的……有位士兵说:‘匪军自四面八方黑压压的来了,我们都不忍心的来扫射他们,可是不能不扫射呀!人就像割草一样的倒下去。我们的机枪不但不必用掩体,反而因为死人堆得多了,必须随时来抬高。’副长官部估计,我与对方的伤亡比例最少是一比七。在东北被压榨了十四年的老百姓想不到胜利之后又在成群结队的当炮灰。谁说东北人不是命苦呀!”

记者报道有主观情感因素是难免的,但基本要求还是客观事实,但社评则不同,完全是作者主观意见的表达。因此,媒体报道与评论是有区别的。指出这一点的意义在于,讨论关于“长春之战”的是与非,不能不注意这个区别。

关于那场社评论战。有论者说,“面对新华日报这篇措词严厉的社论,大公报社论作者理屈词穷,自惭形秽,只得默不作声。”《新华日报》那篇社论的作者陆定一也说:“对这篇文字,大公报

照例应当反驳。但是大公报始终不敢反驳。这也算一件奇事吧!”

事实上,前述吕德润的通讯正是在《新华日报》社论发表后的两天,即1946年4月20日在上海《大公报》刊出的,而且是转载天津《大公报》13日的报道。这算不算《大公报》的一种回应呢?并且,当年的长春之战有没有更多的佐证呢?认为《大公报》“理屈词穷”、“不敢反驳”的论者是不是有些武断了呢?当事者多已作古,今人不能妄加揣测,只能寄希望于今后更深入的挖掘与研究了。

但是,因为与《新华日报》的这场论战,王芸生“后半生永不得安宁”(其子王芝琛语)。1962年,他在政治压力下写了《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一文并公开发表,其中,“上纲上线”地自认《可耻的长春之战》“完全站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立场上讲话,并且散播诬蔑东北民主联军的无稽谣言”。一时成为“定论”。但改革开放后,晚年的王芸生又承认那篇文章是他“最大的违心之作”,想必关于长春之战论争的“自贬”也包括在内。

“不得安宁”的不止王芸生。在王芸生的那篇“检讨”中,吕德润的通讯被再次提起,因而,他也为此屡遭“审查”。2009年6月吕德润去世后,新华社所发“生平”中,说他“从1950年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的二十多年里,历次政治运动中,均被错误列为受审查、被批判的对象”,指的就是他驻东北的那段历史,当然也应该包括长春之战的报道。

同样是在这篇“生平”中,新华社对吕德润任《大公报》驻东北特派记者经历的表述是,“曾受徐冰、伍修权、李立三等同志指示,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多篇有利于我党的消息报道。……他还利用记者的有利条件,为我党多方收集在东北的国民党军政方面的情报”;他的报道“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从另一个侧面揭穿了国民党方面散布的谎言”。那么,关于长春之战的报道呢?新华社没有提及,人们不得而知。事实上,吕德润的那篇报道通篇8000多字,既涉及国共之争,更着重报道中苏、中日、中美在东北问题上的纠葛,仅仅50多字关于中共军队作战的描述,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构成“罪证”。

更为吊诡的是,对吕德润的“审查”还牵扯到了也曾任《大公报》驻东北特派记者的张高峰头上。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另一场长春之战,即后来被许多人(包括海峡两岸的作家张正隆、龙应台)一再提及、反复挖掘、并且常常与1946年的那场战役混淆了的1948年的长春围困战。

“我们要活命”

1948年3、4月间,在相继夺取永吉、四平后,解放军将国民党军据守的长春孤立于沈阳七百华里以外。5月21日占领大房身、宽城子两机场后,长春对外空运联络中断,从此被包围。

当时,驻守长春的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吉林省主席、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指挥有李鸿的新七军、曾泽生的六十军,论作战实力并不弱,但因为补给线太长,铁路中断,空投受阻,所以只能困守苦撑,以期驻沈阳的总司令卫立煌调兵北上,打通沈长线,使长春起死回生。但林彪在沈阳外围部署了三个纵队,卫立煌不动,林彪不打;卫立煌出兵,林彪阻击,有效遏制了国民党军北上,以致沈(阳)长(春)线半年时间无战事,国民党军打通铁路的希望更加渺茫。与此同时,在长春外围,林彪部署了四个纵队,修筑了层层壕沟。只要郑洞国不往外打,林彪也不再往里攻,但对长春保持着长炮射程,可随时向市内发炮。林彪的战术意图很明显——围而不打,以围困代替围攻,让长春自生自灭,迫使国民党军不战而降。

关于这场战役,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学界讳莫如深,直到上世纪80年代,军旅作家张正隆写作并出版了关于东北内战的纪实文学《血红雪白》,才揭开被遮掩的历史面纱。此后,相关资料陆续披露,引起人们的关注。

事实上,早在长春被围困的四个月后,《大公报》记者张高峰就写了长篇通讯《我们要活命——长春50万人民的控诉》,做了翔实报道,发表于1948年9月30日的上海《大公报》。

报道首先引述一位从长春逃出来的朋友的话说:“天黑了,人心也黑了。长春被围困半年,五十万人民饿得全成半死神态。国军要减轻长春的负担,强迫疏散人口,走出城门不许返回。共军硬要给国军增加困难,不许人民通过封锁线。十几万难民在两军的真空地带,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前进后退两不得。长春野外已经饿死一万多人,嗷嗷待毙的十几万,人心真是黑了。九月八日,我实在再也消化不了那猪也不肯吃的陈酒糟,伪装一个铁路员工的儿子,勉强的拖着病体,从死尸堆中爬出长春,保留了小命一条。半年的饥饿,把我摧残得不像人样子,胜利了三年,你说还希望甚么?”

报道在记述了长春被围过程、国共双方军事部署后披露:

“五月间,共军在城郊发动铲苗运动,四十里方圆内的农作物全被铲光,没有一粒新粮能入市区。城郊又布满了高射火器,国军空投食粮与弹药要从一万公尺以上投下,共军曾捡了许多便宜。”“内无粮草,外无救兵,长春的日子,一天难一天。……市内几条小马路被挖得千疮百孔,多少年前压马路的煤渣与烧过的煤核,又捡出利用一次。市内没有粮食,军队也改吃七成大豆,三成高粱,喂马的料不过如此。一般百姓所吃的连牛马也不如,酒糟、树叶、瓜梗、野菜、枯草都成为稀有的珍品,饥饿比炮火来的普遍,人民正普遍的死亡。”

报道分析说,“长春饥饿的造成,不单是被围困,也是无粮空投或无力空投。吉林主席郑洞国,长春市长尚传道拍出多少呼吁投粮的电报,每星期断续的飞去十架八架,最多不过投下三十吨。五十万人口每天每人一斤食粮,每天需要五十万斤,合二百五十吨,空投的数量太少,不能维持最低的需要”。“每次飞机空投,粮包上没有伞,像炸弹一样落下来,多少人民被砸伤砸死,但是人民对空投仍有半喜半忧的心理,万一落在自己院内不被砸死,岂不多活几天!然而拿枪的人会知道谁家得了食粮,没有人民的便宜可占。砸毁的是贫民的平房,砸死砸伤的也是人民,吃着粮食的却不是人民”。

在这样的背景下,整个长春被饥饿所笼罩,景象凄惨:“市内大户旧存的一点高粱米,直升到法币三亿一斤,穷人吃不起,改吃糠皮与酒糟,后来酒糟糠皮又卖到法币两千万一斤,变成中等人家的食品,穷人们又改吃不花钱的野苋菜,全身中毒浮肿,体力不支,长春的街头再也看不到一辆三轮车,蹬不动了!马车主人饿得赶不动车,马也饿的拉不动车,主人就向马下了毒手……最

近粮食更恐慌,有人集体持枪向民间搜刮,当局没有办法再约束那些人的纪律,既然要守长春,只好让老百姓先饿死。

人民没有了活路,饿的迈不开步子,一跌倒就站不起来。街头上的饿殍,半死的弃婴与幼童触目皆是,呼爹叫娘,谁也救不了那么多的孩子,眼看着他们饿死。……饿死的孩子们,被更饥饿的野狗分尸。狗饿得眼红,你不敢上前把它们赶走,正在吃死人的时候,一群狗可以把活人咬死。等到了八月以后,人又把狗全打死分吃了。长春市内看不见一只猪、羊、鸡、鸭,没有富余的食粮再喂养牲畜家禽。平时猪都不吃的酒糟掺和豆面做成馒头,一个要法币两千万元。人民陆续的死亡,长春市民政警察两局负责组织了‘尸骨掩埋委员会’收埋各处死尸。饿死的并不完全是穷人,凡不是军队眷属,都在奄奄一息的等死”。

围困使长春的所有秩序都陷入了混乱,“活命”就是一切,一切为了“活命”,报道披露:“因为饥饿,省市政府的工作完全停顿,区保公所全部解散,少数的公务员每天扶着一根竹竿去上班,来往的公文只是一个问题——粮食。长春市政府的中级以上职员,集中在招待所食宿,那里成立了市府伙食团,每天吃的是三成大豆,七成酒曲,一进大门口,臭气熏天。酒曲都是早已发了霉的,做些饼子馒头,又脏又黑,用眼一看,立刻反胃,实在是不容易消化。下级职员连酒曲大豆也难得吃到……建设厅长于镇藩馋了,自己到街上买两斤土豆,平均每个要法币一百万,厅长的生活尚且如此,一般公教人员的生活也就可知。

长春市内的物价不是贵贱问题,而是物资有无的问题,能吃的已经吃光,能用的也用光。全市没有一家饭店,纵然有也不过是卖酒糟豆粉的混合馒头的小摊。过去四马路比栉的商店,几乎全部关门……物价如此之高,票面五万、十万的流通券无济于事,长春半年来是靠中央银行发行本票过日子,市面通常使用的是流通券,五百万一张的,一共发行了多少,据不正确的统计约在法币一万多亿以上。前吉林参议长毕泽宇说:‘将来长春人把骨头都卖了,也不能抵偿膨胀的通货价值。’”

既然城里无法生存,可不可以出逃呢?报道说,“六月底共军对长春全部封锁,不许人民出

来。市内粮食恐慌,无法解救,国军强迫人民向城外疏散,凡是出了城门的就不许再回来。共军利用这个机会,奖励‘执枪归来’,凡是有一支枪,除自己眷属外,可另发给四张通行共区的路条。有钱的人家,就百般设法买到一支枪,据说并不难,自己携眷先走出国军的封锁线,在两军的真空地带去等,有人接受了你的钱,他可负责把那支枪给你送去,你再献给卡哨上的共军,然后拿着路条逃往沈阳。

至于被强迫疏散的平民就惨了。长春城郊国军有三处卡哨:(一)西南的洪熙街,(二)胜利大街东南的二道河子,(三)北面的八里铺与头道沟。出了国军卡哨,周围三四十里的方圆,就是真空地带,每天人民成群结队走出卡哨,谍报队员上前检查,有手表、钢笔、金银财物,必被指定是‘有意通匪’,顺顺当当的留下的都是好百姓。走出卡哨的人民财物一扫而光,身份证必须在卡哨缴下,长春市民的身份证从此取消,不许再回市内。往前走吧!碰上了共军的卡哨,不许通过,‘饿得慌,为什么不回到长春去暴动?’老百姓是守法的,他们哪里敢,自己的食粮财物在市内早被搜劫一空,每人都饿得半死不活的神态,纵然想暴动,体力也不支了。成千成万的难民,前路不通,又想回到市内,国军的卡哨又瞪着眼,举起枪,哀求也无用,一喊一打,父母妻子全被冲散。据说三个卡哨以外的真空地带,有十几万难民,睡在被共军铲光了衣物的旷野上,风吹雨打,奄奄一息,人吃人的惨剧就在真空地带演出……死尸遍野,疫病流行,人民死得太惨了。长春还是人的世界吗?”

报道最后说:“天已经秋凉,长春人民没有吃的,也没有烧的。年青一点的都逃到真空地带,正在那里等死。听说留在市内的人民还有十几万,全是老弱妇孺,饿得不能出门。……转眼就到冬天,长春去冬已经拆庙砍树取暖,而长春的冬天常是零下三十几度,叫饥饿的人民怎样过冬?毫无疑问的,绝对要把几十万人冻死。人民太惨了,谁来救救人民!这是东北十四年来所等待的‘胜利’吗?”

这篇通讯是迄今可以看到的最早披露长春围城详情的报道。多年后,张高峰曾经说,我写这篇报道的目的,就是想为濒死的长春人民请



张高峰 1975在农村插队,方成摄

命,呼吁国共双方,能攻的就尽快打进来,不能守的就尽快撤出去,救老百姓活命要紧,人民太惨了!但显然,他这种“各打五十板”的立场不可能为双方接受。尽管当时没有谁责难他,但据张高峰后来讲,周恩来曾经通过他人转告他,那篇报道“是错误的,错在没有区分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张高峰也因此在1949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多次就这篇报道反复作出“深刻”检讨,不断自我批判,成为他挥之不去的“历史问题”。

文革中,这笔旧账再次被翻出,并且联系到《大公报》那篇《可耻的长春之战》社评,结果把吕德润的“账”也算到了他的头上。张高峰在辩解的同时,也不得不再次深刻检讨《我们要活命》的“反动性”。他“上纲上线”自我批判说:“我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把当时的内战看成是在朝的国民党与在野的共产党之间的‘党争’,不仅荒谬而且反动之极。……在我看来,内战的主要责任固然在国民党,但‘一个巴掌拍不响’,共产党也不是一点责任没有。因此,反对内战,首先要反对国民党,同时也要向共产党做必要的呼吁,认为这样才是一个记者的‘公正’态度。……国共争夺长春,倒霉的是老百姓,为了表示我的‘公正’和‘为民请命’,所以用了向国共双方要求《我们要活命》这样一个反动标题。……毛主席的教导清清楚楚地指出国民党是内战的罪魁祸首,共产党是被迫作战的,没有任何责任问题……我不分是非,不分正义与非正义,犯下了污蔑党的

蒋介石反贪枪毙孔祥熙亲信

○ 杨天石

1942年抗战处于艰难时期,蒋介石为整顿吏治,曾以严刑峻法和军法审判两手,从重、从严惩办贪官污吏。他不顾姻亲、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的说情和反对,毅然判处孔的两个亲信,一死刑,一五年徒刑,并不许缓刑,企图由此祛除贪污,修明政治。此后,蒋介石也曾多次、多方设法,甚至企图开展“肃清贪污运动”,借以解决普遍弥漫于国民党官场的严重贪污现象。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虽曾命令自己的儿子蒋纬国退回非法取得的“敌产”,却无力改变国民党官场的普遍现实。在他主持的六届四中全会上虽曾制订《当前组织纲领》。规定党员应登记财产,凡拒绝登记者不得成为国民党党员,但从未付之实行。贪腐现象日益发展、泛滥、强化,终于迫使人民对这一政权完全丧失信心和希望,蒋介石不得不败走台湾。

一、孔祥熙亲信林世良受贿,将商货冒充公货走私

抗战中期,四川等地物价飞涨,走私猖獗,官员贪污、腐败严重。这种情况,加重了国家财政危机。据1940年春统计,政府岁入仅及岁出的七分之一。同年6月24日,蒋介石召见军统负责人戴笠,命其草拟改革计划。11月,决定在财政部之下设立缉私署,负责查缉走私漏税事宜,以

罪行……”

可笑的是,张高峰那篇《我们要活命》的报道,也常常令吕德润头痛……两位当年的同事、朋友,都不得不一再辩解那是两次不同的战役,背景与结果亦不同。但不懂也不想尊重历史的“左派”们根本不理会,只以“揪出历史反革命”为“战绩”。拨乱反正后,吕德润和张高峰再见面时,不免无奈地打趣说,彼此为对方背了“黑锅”。

1946、1948年的两次长春之战,两篇报道,被

戴笠兼任署长,各省区同时设立缉私处。1941年6月,第三次全国财经会议期间,戴笠提出“物资为国家财源所系”,将缉私署的工作扩展到“物资”与“税收”两个方面。^{注1}

1941年1月,日军自泰国进攻缅甸,准备占领缅甸南方港口城市仰光,威胁滇缅公路的运输。滇缅公路修建于1938年,在滇越铁路被日军封锁以后,滇缅公路成为中国联系外部世界的重要通道,中国政府向国外采购物资,国外援助中国战略物资,都要通过这条公路内运。大后方的经济供应在很大程度上也要依赖这条公路。其间,自然也有部分政府官员、军人、不法商人利用这条公路进行走私活动,大发国难财。

3月,在仰光的大成企业公司兼利通商行经理华商章德武,用150万元买通中央信托局运输处经理林世良,将价值3000万元的汽车零件,如轮胎等物,分装35辆卡车,利用中央信托局运照,伪称公车和公货,逃避检查,企图走私内运重庆,牟取暴利。经查觉。3月4日,车、货均被设在昆明的运输统制局检查处查扣。林世良出面掩饰,声称车、货均为中央信托局办理之件,但中央信托局昆明分局局长、副局长均不知此事。

中央信托局是1935年成立的国家级金融机构,理事长由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兼任,下设购料、储蓄、信托、保险、会计等五处。1938年西迁

一篇社评牵扯到一起,使三位报人几十年“不得安宁”,称得上中国新闻史的一个案例,一段“佳话”,个中玄机,值得玩味。

需要提及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徐盈、吕德润、张高峰三人都留在了大陆,后陆续调离了《大公报》。改革开放以后,曾分别担任了全国、北京、天津的政协委员,吕德润还曾任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三人均已谢世。■

(责任编辑 萧徐)

重庆后,增设易货处,办理外贸及进口业务。1939年增办兵工储料业务,自办运输,新设运输科。主任为林世良。不久,业务扩大,运输科升为运输处,林世良任经理。这是个既重要而又肥水极大的岗位。林世良英语流利,仪表翩翩,善于逢迎,常到孔府效劳,深得孔夫人宋霭龄宠爱。孔的大女儿孔令仪、二女儿孔令俊也都很喜欢他。据说,还曾是孔令俊的意中人。因此,蒋介石侍从室的高级幕僚唐纵说他“与孔公馆关系太深”,这是事实。^{注2}

章德武的物资被扣后,林世良即以中信局运输处名义出函,证明是公车、公货,请予放行。其后,又赶回重庆,由孔令仪出面,央请中信局理事会主任秘书兼信托局经理许性初,补办押汇手续。许性初是上海复旦大学毕业生,意大利皇家大学博士,回国后先在香港开办书局,与孔令侃为莫逆之交;后任中央银行专门委员。他接受孔令仪请托后,以私人名义复信,诡称这批货物本为大成公司所有,因无力运入国内,向中信局押汇1000万元,由中信局运输处派公车35辆装运来渝,因此是公物,不能扣留,车与货均应交中信局处理。^{注3}

3月12日,重庆运输统制局监察处派员到中信局购料处调查。根据规定,凡托买、押汇在100万元以上,必须报请中信局理事长(财政部长孔祥熙兼)批准,但许性初拿不出有关文件。3月13日,林世良、许性初以中信局名义正式发函运输统制局监察处,声明依银行惯例,该批货物的抵押权属于中信局,请监察处通知昆明检查处即予放行。据说,林世良等并通过活动,以财政部兼部长孔祥熙的名义发出代电,饬令押运来渝,依法查明,交财政部处置。

二、蒋介石决定追究林世良,将贪污罪移归军法处理

林世良受贿、走私一案的发现者是军统人员,案件迅速被报到蒋介石处。5月25日,蒋介石决定“追究林世良”,同时决定将“财政贪污罪移归军法机关处治”^{注4}。5月27日,蒋介石将此案批交军法执行部总监何成浚“彻底讯究”。



1946年5月,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图为蒋介石走下飞机

8月12日,重庆《大公报》以《大贪污案》为题发表消息,声称林世良“假借中央信托局名义,包运商货,人车俱获”。14日前后,监察院监委员俞奋、王述曾先后到何成浚处及中央信托局总局调查,又亲赴处于重庆南岸的土桥审判组查阅全案卷宗。16日,《中央日报》发表了“监察院极为注意”的有关消息。^{注5}此案牵涉孔祥熙家族,牵涉军统与孔祥熙之间的矛盾,何成浚自述:“因牵动政治上种种关系,有少数人借此兴风作浪,冀倒甲拥乙,夺取一部分政权,以扩张其一派势力,故作过分宣传,致引起各方惊疑也。此案内容复杂,但本部尚未侦讯,自不可妄加判断。”^{注6}

8月19日,《大公报》发表社评,《从林世良案说起》,首述“官吏贪污之事,可说是古今中外,无时不有,问题只看法律是否有灵”,次述几千年中国史,此类现象,虽盛世也在所不免,关键在如何对待。《社评》由此论述“文明国家”与“陋野国家”的区别。文称:

一个国家政事繁赜,百僚有司,难保尽是循良之士,所以发生贪污案件,并不足为国家之羞,而有了贪官污吏,宽纵不惩,才是政府之耻。我们纵览历史,旷观当世,大概可以这样说,同是贪污之事,在治世大都明宪法办,不稍宽纵,在末世就盈目不视,充耳不闻,即使有人揭举,而在究办途中,也被庇护关说,使国法失灵。同是贪污案,在文明国家,就尽法明纪,使奸宄无所逃遁;在陋野国家,就毁法乱纪,百鬼昼行。同是污瑕不免,而是否加以涤除,

则可借以观测一个国家的兴衰文野。

《社评》批评当时存在的“唯恐暴露弱点”“更怕揭开黑幕”的“姑息心理”，要求政府“忍痛开刀”。文称：

当前最易犯的一种姑息心理，就是唯恐暴露弱点，更怕揭开黑幕。在这种姑息心理之下，无意之间就可以掩蔽无限罪恶，滋长大量黑暗。我们应该扫除这种消极心理，有了弱点不怕暴露，而要积极的自强不息，真有黑幕，不惜揭开，使之射入大量的阳光。

有病未必就死，但万万不可讳疾忌医。毒在内部，快打血清；烂在外体，忍痛开刀。

有病不可怕，最怕的是讳疾忌医因而误掉性命。毒蛇在手，壮士断腕，而况癣疥之疾，何惜稍施去腐生肌之术！本此而言，林案在国家不足为弱点，果然有罪，法不宽纵，情不姑息，正足表现法纪之修，官箴之肃。

《社评》列举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严厉惩办的各起贪污案件，说明“全国人士闻之，丝毫不感是暴露国家弱点，相反的，却认为是国家励精图治，而人心振奋。我们对于林世良案的观感也是如此，愿见其究明底细，而尽法办理”。^{注7}

蒋介石关注重庆国民政府中贪腐现象的发展，关注林世良案的侦讯进展。11月4日日记预定：调整与加强政府各院的监察机构，同时决定追究通城、郁林等地的囤积案与林世良案。何成浚是个办事勤慎，秉公执法的国民党大员，经过何及各方努力，终于查明：1、运输卡车35辆均非中信局公物，分属7名商人私有。2、押汇1千万元之事，纯系伪造。3、林世良假公济私，违法渎职，已非一次，伪称押运，系其常用手段。^{注8}

案情虽已查明，何成浚认为“此案因含有政治关系，外间猜疑者颇多，造谣者亦颇多”，决定打破军事法庭惯例，举行公开审判。观审者除邀请行政院、监察员派人外，又特令加入侍从室、司法行政部、运输统制局、军委会调查统计局、财政部、中央信托局等机关。^{注9}11月14日，何成浚决定于17日举行林世良案公开审判。当日观审者计有监察院监察委员何基鸿、监察院秘书长程中行、行政院代表管欧、财政部代表方东、黄凯耀、军委会调查统计局代表毛第元、运输统计局代表谭齐、中央信托局代表罗吟圃等人。《中央日报》、

《时事新报》记者要求参加，何成浚也特予准许。这样，林世良案遂“震动西南”，广为社会所知。

三、孔祥熙说情，蒋介石不为所动，从严判决

12月5日，孔祥熙约请何成浚、秦绍文（军法执行副监）及许世英、徐堪、何键、杨虎、陈希曾等多人参加午宴。据何成浚日记记载：“孔先生对林世良舞弊案，谈叙其情形甚详，并力为许性初解释。”据何判断，孔祥熙约往午餐之意在此。他在日记中说：“以案中内容言，林舞弊绝无问题，许虽有嫌疑，但未直接经手，而其允办押汇之款，亦未付分文，谓其受林蒙蔽，较近事实，自不能与林同科，拟于审判时注意此点。权所能及，决不以法外之罪施之于人也。”^{注10}关于孔祥熙的这次宴请，事后戴笠从军法执行总监部迅速得到消息，于12月9日给蒋介石打了报告，内称：

孔副院长公然谓林世良既不犯死刑，则任何人不能死之。许性初是我之主任秘书，许之错误，我应负责，请何总监马上开释，最低限度亦请予以宣告缓刑。请何总监不要受人威胁，委员长处，有我负责，且我已和委员长说好了等语。陈希曾曾告何总监云，数日前委员长曾至孔公馆，孔副院长报告委座，林世良案不如报纸传闻之甚，请委员长注意。委座当答“好的好的”、“我注意”等语。现何总监受此包围，致林世良案之审判，由呈办法官送呈多日，尚未核下，且竟召审判组长与承办法官，研究如何为许性初减轻罪刑，组长与法官均不同意，现悉拟判林世良处无期徒刑，许性初拟以帮助图利，处以有期徒刑二年另六个月。^{注11}

从戴笠的这份报告看，孔祥熙不仅为许性初说情，而且也企图为林世良减免死罪，把工作做到了蒋介石身上。军法执行总监部最初并未打算判处林世良极刑，许性初的判处也比较轻微。

戴笠给蒋介石打报告的同日，蒋介石召何成浚到官邸谈话，详细询问林世良案办理情形。何一一汇报后，蒋介石指示其秉公办理，不必考虑其他因素，声称“诸事可依法裁处，勿顾及其他。”^{注12}事后，军法执行总监部判决：林世良无期徒刑，许性初判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三年。蒋介石侍从

室部分人员认为此项判决“执法不公”。21日，唐纵上呈文给蒋，以成都市市长杨全宇因贪污被公开枪决为例，说明对林世良判决轻了。^{注13}当晚，蒋介石召见侍从室邱清泉、陶希圣、林蔚等人，批斥邱等所拟林世良与许性初舞弊的判决公文不当，要求加重刑罚，将林世良改判死刑，许性初改判徒刑5年，不许缓刑。当晚蒋介石日记云：“非此不足以昭信与立国，庸之只知包庇所部，而不知政治与法律之重要。”庸之，即孔祥熙。这则日记说明，孔祥熙的说情完全未起作用。当夜，蒋介石下令改判。22日晨，何成浚按照蒋介石的意旨，饬令审判组改判林死刑，许5年徒刑。此前，商人章德武已移送法院，被扣货物，则由运输统制局依法处理。

26日，蒋介石在《上星期反省录》中写道：“林世良与许性初案，依法惩治，不为权势所乱，此事虽小，实为以后祛除贪污，修明政治最大之关键，对于国家与人民及法令，皆有重大影响，此心自觉安平非常也。”这里的“权势”仍指孔祥熙。

上述案例说明，在林世良案的处理上，蒋介石虽有以个人意旨干涉司法判决之嫌，但并非阻

挠执法，相反，为了防止贪腐，倒是不顾孔祥熙的说情，对林世良等从严、从重处理的。■

注释：

注 1 《戴笠在第三次全国财经会议提案》，缉私处档案，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注 2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328页

注 3 参阅吕恢琪《重庆三千万元物资走私案见闻》，《孔祥熙其人其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49-150页。

注 4 《蒋介石日记》，1942年5月25日。

注 5 《中央日报》，1942年8月16日。

注 6 《何成浚战时日记》，第146页。

注 7 《大公报》，1942年8月19日

注 8 《戴雨农先生全集》(上)，146-147页。

注 9 《何成浚战时日记》，第183页。

注 10 《何成浚战时日记》，第191页。

注 11 台北“国史馆”藏档案，002-080101-00066-008。

注 12 《何成浚战时日记》，第193页。

注 13 《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328页。

(责任编辑 萧徐)

SIEMENS

西门子助听器

Hearing Aids

服务热线 :010-84608877

请认准西门子听力集团授权证书 西门子听力仪器（苏州）有限公司

数字型耳背式助听器 苏食药监械（准）字 2010 第 2460986 号 数字型耳内式助听器 苏食药监械（准）字 2010 第 2460987 号

注：请认准西门子标识 / 请详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在医务人员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苏械广审（文）第 2010040048 号

声望听力

www. sw-tl. com

韦君宜：革命与知识分子的标本

○ 孙 郁

韦君宜提供的视角

1967年,当大陆的“文革”轰轰烈烈开展的时候,从台湾到美国的青年学子杜维明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抉择》中写下这样一段话:

二十多年前,中国最杰出的青年学子大半都滚进战争的洪流,受到人类史上最入骨也最广泛的侮辱。他们变成流亡学生,变成青年军,变成政客运动下的牺牲品。他们不能忍受干枯的考证主义,于是摆脱了乾嘉学派,但是变成了激进主义的奴隶。他们煽动学潮,批评时政,反对贪官污吏,斥责奸商国贼,慨然以气魄“承当”天下。虽然,从政客的立场看,他们若非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破坏者,即是为空想、空希望而勇往直前的敢死队。他们的爱国热忱变为笑柄,变为失败的借口,变为巩固私人权力的工具。但是,他们有发言的自由,有影响国策的潜力,而且有明确的目标去奋斗,去把握。在“中华民族不会倒”的呼声中,他们找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归宿,并且为民族奋斗史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杜维明文章所指,多系从大陆退居台湾的知识界,部分也让人联想起大陆文人的经验。背后意思无非是,前辈知识分子做了悲壮的选择,也收获了痛苦。但是在知识与学理上,却没有留下什么。从知识论的角度看,五四后的激进文人,的确在学术上没有增加太多的有分量的著述,对

文化的破坏则超出人们的想象。青年杜维明在那时候要回到传统去解决知识与价值的问题,则是一种对唯道德化的空谈风气的纠正。他后来的学术思路也恰诞生于此。

文章发表的时候,大陆的知识界还没有任何反应,那样一个特殊的时期,人们的精神还在盲区的地段。只是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知识界才有了类似的表达,而时间已经过去了多年。华人学者的精神差异,直到今天才慢慢缩小。现在看杜维明当年话,大陆的学人不是没有相似的感慨的。

战乱与革命年代,知识青年走出象牙塔,以生命之躯走到救亡之路,乃一种责任与使命感的表现,至今都有感人之处。但是如果我们也算一笔账,这牺牲与代价,给我们的民族带来了什么呢?历史学家与文化研究学者可能有不同的结论,现在的争论也可以看到一二。就学术思想而言,前线的文人不能与象牙塔的知识分子相提并论,那也是自然的。反观起来我们也会想,当那些在战斗里消失了自我,或因内讧而扭曲了自我的人远离我们的时候,他们在文化史可以安放的地方何在?

仅以文学史为例,我们收获了左翼文学,可是在分量上能抵鲁迅者还没有过。文学的研究,非左翼的学者如钱钟书、俞平伯可能贡献更大。走在前线的作家,有孙犁这样可以夸耀的人物,但后来的胡风、周扬都被风潮将创造性淹没了。重要的是那些普通的文人,在战乱与革命里,知识未得长进,精神却不断受到摧残。即便留下了诸多著述,也多是先验理念的注释,未见独创的价值,也如流星一闪,遂消失于时光的空洞之中。

这无疑是一种痛苦。我读周扬、夏衍、冯雪峰、阿英晚年的文字,看出他们的疑惑。在“文革”结束后,深切意识到自己误入一条窄路,然而也多是语焉不详,闪烁其词的时候居多。20世纪80年代曾有一种全面总结的可能,不久就整

北京回忆久久文化传媒

特 约 刊 登

回忆久久为您撰写回忆录

咨询热线: 400-653-6199

体沉默了。那一代人留下的问题，今天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梳理。

战争与动乱时代文化的传统，是被意识形态化处理的存在，但从当事人的回忆里，我们则可以看到另外的存在。有一本书对此类现象作了深切的透视。我们不能不提到的是韦君宜的《思痛录》。如果要算文化的账，总结精神生活的质量，该书提供的资料，较之一般书本里的叙述要多。这个从革命队伍中走来的人，对一代知识青年的选择，作了一种忏悔式的描述。历史话题也随之变得更为复杂。

如果把《思痛录》当作历史的教材，那我们的教育则有了一种反省的可能。二十年前读过韦君宜的小说，几乎没有留下印象。在我眼里她不过是出版社的领导，只是与文学界关系密切而已。直到许多年后读到她的《思痛录》，才对这位前辈有了一点认识。我那时候感慨于她的磊落，是前辈里少有的袒露心怀的人。2013年，她的《思痛录》增订纪念版问世，增加了许多新的资料，作者的思想更为完整地呈现出来。历史的细节后乃生活的还原，字字带血，溅泪之处有自审的空间，读后有一种难解的苦楚。昔年读巴金的《随想录》，有过类似的感受，不过巴金的苦难多是同路人式的，没有在文化的核心地带，不妨说是外围者的忏悔之作。韦君宜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所写的文字多了历史复杂的维度。上世纪40年代后革命文学的生产与政治之关系，都与她的生命之迹纠缠着，她的视角提供的资源，青年一代还没来得及认真面对。

韦君宜早年在清华读书，在抗日的年代放弃大学的书斋生活，到延安去从事文化工作。新中国建立后在新闻出版机构任职，与作家协会有互动的关系。那时候的中国正在非常时期，文学要脱离政治是大难的。她记忆里的延安整风，批丁玲、胡风，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都有惊心动魄的场景，让人感到我们都在似人非人的人间。当革命只能让人去死而无法活的时候，文化之光是不能照耀世间的在她的记忆里，文学活动与日常生活，已脱离了人性的轨道。悲剧把一代人全部裹挟其中了。



1972年，韦君宜一家在干校难得一聚

《思痛录》是了解左冀知识分子的文献

《思痛录》从“一二·九”运动写到“文革”结束，是一段特殊的历史片断的连缀。韦君宜给我们提供的线索，是了解左翼知识分子命运的难得的文献。一是让我们知道了他们那代人何以选择了革命，知识分子阶级内心真实得以剖析；二是勾勒了革命的具体内容，正应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话，有流血，有死亡。在紧张的环境里，死于敌人之手心甘情愿，而死于自己人的杀戮，人将何以堪？李锐在上世纪30年代与妻子在延安的生活，也提供了佐证。那时候的青年人，无辜被监禁、处决，都非早期马克思主义信徒所能理解。在残酷的环境里，人无法摆脱苦运，随时可能失去自由。虚假与谎言四处蔓延。在神圣的情感驱使下，自己会背叛自己，陷他人于苦海。革命队伍不是纯然的存在，而成了死亡之所。

韦君宜面临的问题是，当你要实现救国之梦时，不得不加入集团组织，不得不执行命令。可是那集团与命令是常常违背常理的存在。人在选择自由的时候，丧失了自由。她细致地记载了自己如何参与揭发、批判别人的活动，记载了知识分子被边缘化的悲惨过程。许多天真的知识分子，后来在革命的时代变得不近人情，心灵扭曲，可是自己却全不知道。老鬼描写自己的母亲杨沫时，已作了诸多刻画，可以看出人的心态变

形的可怕。但韦君宜不同于杨沫，她从弯路中又回到了起点，是逐渐清醒的人，意识到了内中的问题。这是一种大苦，当意识到自己所选择的路是一种荒诞之所，那是怎样的悲哀！

50年代开始，文学整体的下滑。知识分子不能自由表达思想，把思维定位到未曾受教育者的层面。大众化是一种可能，但那时候的大众化乃领导观念的外化，是没有真的泥土气的。首先是旧的传统被阻截，儒道释均不可谈，其次是五四传统遭到厄运，像胡适、俞平伯那样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均受清算。再次是鲁迅传统被扭曲，30年代的文学统统有了问题。当革命离开智慧与独立思考的时候，只剩下了盲从者的骚动。韦君宜眼里的五六十年代的生活，文化生态已经面目全非了。

她提供的资料颇为生动。印象深的是描绘了革命时代的人际关系。很快发现环境与梦想的大异，人人自危，不断被怀疑、整肃，精神的担子加重。对反动文人的处理，文艺界右派的产生过程，大跃进的喧闹，都以荒诞开始，又以荒诞结束。革命时代的人际关系是彼此猜忌，随时被定为反动人物。亲朋友目，邻里暗斗，同事互仇。以纯粹名义的任何选择，都置人于不纯粹。韦君宜写了许多大人物的宦海沉浮，也写了诸多小人物的悲惨命运。但这些片断，都是自己受辱后反省时才有的良心召唤。由跟着别人整人，再到被人所整，才知道自己在一个陷阱里。《负疚》一文写普通编辑老龙的命运，只因为改了一个作家的作品，就被驱逐出单位：

原来是因为他写了一篇寓言《白鹤的故事》，说那个白鹤（作家）写出的作品卖不出去。造反派竟说这个白鹤就是影射毛主席，作品是影射毛选。毫无根据，他当然坚决否认。但是不行，造反派们竟当场宣布，他们有“物证”。什么“物证”呢？原来他们跑到新华书店去找了毛著柜台的营业员，“调查”他们的推断有无根据，营业员说：有的。毛著单行本都是白色封面，黑字标题，套红色底色。如果一套书摆齐了，露出红底和白封面，就是有点像有红顶子的白鹤嘛。于是这位营业员的“美丽”的想象，就成了“铁证如山”。老龙矢口否认，不肯签字，那也不管事。后来工军宣队进驻了，不许打派仗了，不许贴大字报泄露出机

密了，但是完全接受了造反派定的一切结论。后来我们大家都戴上“帽子”跟着一部分不吃香的革命群众一起，开往干校。这时候的我，已经和所有被打成反革命、汉奸、右派、胡风分子、国民党分子、地主、特务等等的，一视同仁。我这样平时作为党员干部的人，一下子取掉了头上的光环，才觉悟到自己原来和人家是一样的人。人家都是在这里辛辛苦苦干了多少年，而我们过去就居然可以把“帽子”随便戴在人头上！

韦君宜看到了别人的可笑，也看到了自己的可笑。当人与人之间以不信任和唯道德的尺度量来量去的时候，古人所云的相敬以礼的观念就是一句空话。革命是聚众的行为，聚集的过程，也是疏离的过程。人与人不再以爱相视，将对方魔鬼化，这是斯大林时代的遗产。不幸得很，韦君宜那代人也重复着这样的遗产里的逻辑。

阅读她的文字，感到忏悔之真。自己被污染了，而且还污染了别人。韦君宜回忆录里涉及的话题很多，重要的部分是文学艺术的生产，她对此的描述有很高的价值。民国文学在这个生产机制里消失了，古典文学的精神也消失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文学，多是虚假的文学当道。主题先行，长官意志充塞着文坛。那些有热情的作家，独立思考的文本则不宜刊发，唯有迎合才能出版。邵荃麟、冯雪峰、黄秋耘的屡屡受挫，革命的理念不被接纳，却成了异端者流。作者在《编辑的忏悔》里，谈到《千重浪》《东风浩荡》《金光大道》编辑的荒谬之事。一些不懂得文学的军人在领导文学工作，以可笑的政治理念要求作者写作。写作不再尊重艺术良知，而是迎合别人，那结果只能是垃圾成堆。韦君宜写道：

我记得当时的大作家浩然，他那个《金光大道》的架子实际上是由编辑帮他搭的。先卖公粮，后合作化……前边我不清楚，到写第二卷时，我从干校奉命调回社来，接任编辑。管这部书的编辑组长，是由外单位调来没当过文学编辑的一位造反派，他看了稿子就说：“书中写的那个时候，正是抗美援朝呀！不写抗美援朝怎么成？”但这一段故事，实在与抗美援朝无关，作者只好收回稿子，还是把抗美援朝添了进去。

反智、反爱、反艺术，就这样主宰了中国文坛。《思痛录》写“文革”期间的残酷斗争，以及文化理念，

看得出是无所不在的荒谬。领导文学出版社的军人,全不懂文学,却指挥知识分子编造假天空的文学。现在一些研究者谈及那时候的文学生产,对机制还有肯定的话,那无疑是对历史的无知。只有看到韦君宜的书,我们才会知道,那时候的文化,已荒唐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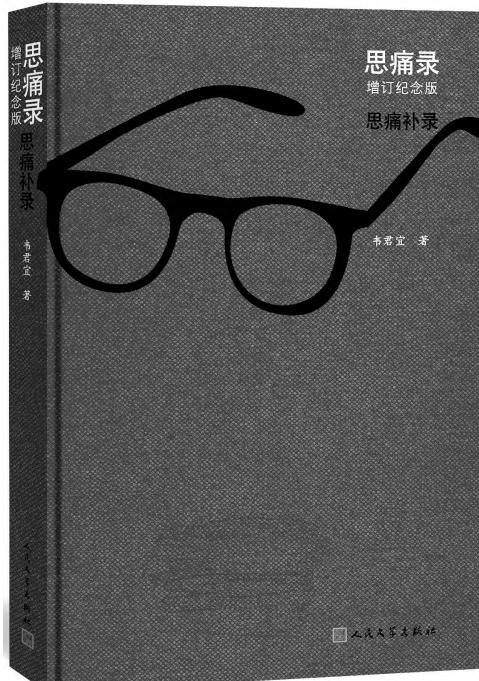
我们看韦君宜的经历,一直在文艺界、学界、政界之间。她无意中也描述了知识分子的深层问题。《思痛录》涉及了学界的状况,颇有思考的价值。比如对蒋南翔、王瑶的描绘,对于光远、钱伟长、齐燕铭的勾勒,

都有意味深长的地方。像王瑶这样的学者,本来也是左翼出身,“一二·九”运动中,与韦君宜都是积极分子。建国初也热衷于文学批评,参与各类社会活动。但随着运动的持续,王瑶已经无法跟上时代,成为被学生批判的对象。早期他们参加革命,是看不上旧制度,现在是新制度看不上他们。之所以被遗弃,乃因为其革命的程度还不够。王瑶与韦君宜参加过左翼活动,有自己的价值尺度,根据的是自己的良知与学识的判断,思想里未尝没有自我意识的影子。但到了“文革”时代,当沦为阶下囚的时候,批判自己的竟是些无知的盲从者。知识成为罪过,无知无畏才是英雄。这不是韦君宜、王瑶心目中的革命,他们当年在清华搞革命活动,所要看到的未来不是今天的样子。在智性消失的年代,革命的价值还有吗?

因了视野的限制,许多学人的遭遇她无法涉及,但就目光所及看,学界的人与事,尤甚于文坛。王瑶后来不能再写《中古文学史论》那样的著作。连他的《新文学史稿》,也成了问题。北大学生所写的文学史,完全不及老一代的厚度,以新生力量代替古老的学问,那结果是,我们已经没有学问。

历史的吊诡之处

当革命使表达与思考都无力的时候,仅有道德



《思痛录》书影

的救赎是不够的。知识分子除了要有使命感与道德的激情外,重要的是要有一种思想的自由与知识的不间断的积累。当后者缺失的时候,前者的价值也会随之丧失。我们总结历史,是不能不看到此点的。

韦君宜写自己的经历,带着失败的痛感。她知道自己走在一条灰暗的路上。那么多可爱的人被摧残了,智慧不再开花,只有恶魔当道。她和巴金一样,并不把责任都推给别人,也常常忏悔自己。也就是有人所说,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在回望自己的途中。不过,巴金的追问,还是人道主

义者的追问,延续的是五四的脉络。而韦君宜之追问,却是革命者自身的内省,她与夏衍、胡风、聂绀弩晚年的自我的反观,更有思想史的价值。这与俄国革命后的知识分子的自我冷观,有可以互证的地方。我们因之可以更为明晰地看到前人的选择的合理性中所含的悲剧性。

知识阶级到生活的深处去改造社会,永远都是值得赞佩的选择。问题在于在这个过程中可否保持独立的立场与自由的思想,可否在创业里有知识的积累与创建。如果没有这些,则会导致自我的失落,精神不再有自主的力量。所以,道德化的激情与自由的精神的保持,是一个不能失衡的存在体。知识阶层在激进的途中没有疗救自我伤痕的技能,也即思想的冷观,那无疑要陷进更深的泥潭。革命时代的遗产给后人深省的地方,可能就在这个地方。

历史有时是吊诡的存在。革命发生的时候,如果参与者没有思想的深厚的积累,或者说知识阶级还缺乏基本常识的时候,选择的结果可能与预设是相反的存在。五四之后中国的悲剧是,我们的学术界没有积累深厚的资源,对历史与现实的描述都处于简单化的层面。大学不仅没有提供思想的支持,民间的思想资源也颇为有限。在一个失调的文化环境里,道德化的冲动不可能解决社会问题与精神自身的问题,如果没有一个健

劳教难友巫宁坤

○ 杜 高

56年前的1957年8月4日,正当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把几十万个热诚地向共产党提了批评意见的知识分子一网打尽时,《人民日报》忽然发表了一篇社论:《为什么要实行劳动教养》。立即有人敏锐地感觉到,这是英明领袖想出来的惩治右派分子的一个聪明办法:面子上“宽大为怀”(不判徒刑),实际上“狠加打击”(关进监狱)。手续简便到不经任何司法程序,只需所在单位填一张劳教申请表,警察就可以把人带走。

我们就这样成了中国实行劳教制度的第一批劳教分子。

—

巫宁坤先生是1958年4月17日由他任教的国际关系学院(当时归中联部领导,对外属保密单位),开了一辆吉普车把他送到半步桥监狱看守所的。

我恰好在第二天,4月18日进来。我们就这样成了同命运的难友。

康生态的语境,一切言说与实践都会流于空泛。杜维明那些学人希望回到儒家秩序找精神的资源,可能是看到革命时代文化生态失衡的一种困境。这种选择自然也存在争议,可是他们看到了激进主义的问题也是深切的。新的思想与传统只是单一逻辑地衔接的时候,大概只能加大文化的失衡。在这个层面来看韦君宜那代人的选择,我们能够发现更为复杂的问题。

辛亥革命后,中国知识界分化成象牙塔与十字街头的不同的营垒,遗憾的是两者都没有看清彼此的价值。它们互相隔膜又不得通融,结果造成文化的更大的萧条。民主思想与精神的演进不像那一代人想象的那么简单,知识分子不能垄断真理或占有真理,只能在通往真理的路途里。真理不在自身,而在与陌生存在对话之中。五四

那时,谁也不会想到劳动教养就是进监狱。巫先生上车时还天真地以为“是送我去一个农场参加体力劳动”,谁知是停在一个装有铁丝网的高墙下的大铁门前。接着他就被推进了一间挤满了劳教分子和摆着一个大尿桶的臭气熏天的囚室里。他离家前夫人只为他收拾了一个小衣袋,顺便塞进了两本书,一本是英文原版的《哈姆雷特》,一本是冯至编的《杜甫诗选》。没想到这两本书后来竟成了他囚徒生涯的精神伴侣。那年他37岁。

对于右派知识分子来说,进了劳教收容所,就如同掉进了另一个世界,虽然这只是劳教的第一步。

从1958年2月春节过后,各单位就开始处理右派。成批成批的右派送进了劳教所。2月、3月进来的,都已分批转送到了茶淀清河农场的三分场和于家岭分场劳教。到了4月,送来的人越来越多,收容所已感到人满为患的压力,而这时“大跃进”已在全国兴起,公安工作的“大跃进”就是坏人抓得越多越好。收容所不够用了,连著名

之后的问题是取消了对话,只有斗争,取而代之的独断论,导致我们看不见他人,明澄之路忽断,太阳落下去了。这个教训今天不去面对,重蹈覆辙也并非没有可能。

现在是一个清理近代遗产的时候。但面临的困难是,在与近代遗产相遇时,上千年历史的基因显得无足轻重了。中国文化的短路史,使我们丧失了再造文明的能力。上世纪30年代的青年学子希望能够有所作为,可是忽然发现与自己的梦更远了。清理遗产不是简单的归类,而是一种“抉心自食”,知道我们都多少含有罪的影子。有痛感的人,方可知道寻药的重要,但是对于麻木的知识群,韦君宜的警示会激起多少人反观自己,还是一个问题。■

(责任编辑 徐庆全)

的“雍和宫”的一个偏殿，也暂时用作了劳教收容所。农场也装不下那么多劳教人员了，决心在遥远的兴凯湖畔开辟新的分场。我们这一批人就在半步桥看守所里等待了两个月。

40年后，老年巫宁坤在美国含泪写下了半步桥日子的回忆：“可是我万万没有料到，在通往苦难的道路上，半步桥会引我走多远。一日两餐，吃的是同样的东西：一个用发霉的玉米面做的窝窝头、一碗玉米糊、一片咸得发苦的腌萝卜。头两天，我实在无法下咽，就把我那一份送给左右的难友。‘不用过多久你就会吃不够的’，难友们预言。他们说对了。关在监房里，闻着我们自己的尿的臊味，天天‘交代罪行’，‘认罪守法’，我们也用当初人家批斗我们的方式相互展开批斗。除了每天轮流下楼倒尿桶，我们不时到大院里打扫卫生。我们终于捱到了不憋死在这臭屋里，可以到荒原的阳光下劳动，可以吃饱肚皮了。6月里的一个深夜，关在看守所的800名劳教分子，在荷枪士兵的押解下，乘上从北京开往密山的“专列”，三天三夜，再转乘大木船，才运到了目的地——兴凯湖畔沼泽遍布的八分场。”（《一滴泪》第四章）

这是怎样的一个地方？我们又将承受怎样的一种劳役？当我们刚刚搭起了一个三角形帐篷，可以躺下歇口气的时候，管教干部立即把我们集合起来，他大声地警告我们，不要有任何想逃跑的念头，这周围都是沼泽，又叫草垫子，看上去是平地，踩下去就淹死。逃跑是刑事犯罪，抓回来从重判刑。然后就宣布，对于你们这些人，只有通过强迫劳动才能改造成新人。从明天一早起，就要开始沿湖修筑一条导流堤，阻挡湖水，开垦荒地。

这才是劳动教养的真正开始。未来将会怎样呢？我们都在惶惑中。

当管教人员警示我们这是什么地方时，巫先生仿佛听见了哈姆雷特那一声“丹麦是一座监狱！”的



杜高和妻子李欲晓、女儿李迎 1999年秋

呐喊在荒原上空回荡。果然，30多年后，刘迺元先生记下了这一天晚上发生的可怕的事：“大家正在熟睡，突然响起一阵枪声，把大家惊醒，队长在门口出现，他说：‘都睡觉！没事。’次日早晨传出消息，一位难友因越过警卫线被打死了。他睡得迷迷糊糊，黑夜走出去越过了线，我想起我见过这个人。他40岁出头，戴一副深度近视镜，他出去找厕所走错了路。”（《历劫不悔》177页）

到这时，我们才真正意识到了处境的险峻和劳动教养惩罚的严酷。

二

巫宁坤先生是怎样从一位英国文学史的教授沦为一个劳教囚徒的呢？

1951年新年，他正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写博士论文。忽然收到北京燕京大学校长陆志伟的急电，请他回国接替一位因朝鲜战事而离开中国的美籍教授。接着他又收到了人民共和国政务院的聘函。他的心中激荡起了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的热情，决定放弃写了一半的博士论文，回国任教。为他送行的是芝大的同学李政道博士。他劝李政道也回去为新中国工作，李回答惧怕共产党洗脑。

巫先生抵达北京前门车站时，迎接他的是燕大西语系主任赵萝蕤教授。她是艾略特著名长诗《荒原》的中译者，她的丈夫陈梦家教授早年是“新月派”诗人，后来又以考古学的成就蜚声中

外。后来这一对夫妇的政治命运令人悲叹不已。陈先生被打成右派，文革中自杀。赵先生饱受磨难，晚年精神失常。

满腔热情回来的巫先生，寄居在赵先生家里。没教几天学，就赶上了院系调整。燕大撤销，他被调往天津南开大学。所幸他在南开遇见了李怡楷女士，结为夫妻，后来在患难中相依为命。没两年他又被调到北京一所“干校”（后称国际关系学院）任教。

1955年，他遇上了“肃反运动”。积极分子们开始审问他“为什么回国？”他觉得很奇怪。再问他“为什么选在1951年回来？”他开始领略这问话里含了一点别的意思，再到气势汹汹地逼问“回来有什么目的？”他这才发觉自己竟被怀疑是美帝派来的特务。天哪，这就是对他“满腔热情，不远万里，报效祖国”的回报！

然后是1957年党的整风。他沉默。领导一再动员他“说几句”。他说了。于是“落进了他的‘阳谋’罗网”。他被扣上右派帽子，遭受批斗。然后送进了看守所。

他先在兴凯湖畔的黑土地上承受“大跃进”苦役的磨砺，接着又遭遇了“大饥饿”的恐怖。他饿得浑身浮肿，然后骨瘦如柴，气息奄奄。饥饿使他失去人性。他妻子的哥哥从天津一大早辛苦地赶到清河农场探望他，给他送去食物，他却疯狂到把哥哥留给自己中午吃的几块大饼也抢夺了下来。老年忆及，他骂自己不是人。

1961年，正是劳改农场死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多亏了她的夫人的奔走、呼吁和请求，好不容易才把饿得濒临死亡的巫先生从劳教队里救了出去。他后来就以“保外就医”的劳教分子的身份，跟随他的夫人下乡劳动，接受群众监督，千辛万苦地熬过了狂风暴雨的十年文革。直到1979年右派改正，他才重见天日。

这时发生了一件有意味的事。他从报上看到“爱国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博士回来讲学的消息。阔别28年，他俩在北京饭店重见。但他立即意识到了两人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他留在美国，能够获得成就和荣誉，过着安定富裕的生活。我回到祖国，历尽劫难和凌辱，好不容易才苟活到‘改正’的今天。他在‘美帝国主义的堡垒’安居乐业，回到共产中国荣膺‘爱国

主义者’的桂冠，受到最高级党政领导的接见和宴请；我响应号召回到祖国，却被人公敌，受尽无产阶级专政下劳动改造和牛棚的煎熬，几乎成为饿殍葬身一杯黄土……我突发奇想：如果在旧金山那个七月的下午是我送他上船回中国，结果会怎样？也许我会坐在他的椅子上，他坐在我的椅子上？哦，不，我当场决定，我决不会坐在他的椅子上，同时，上帝保佑，即便他当年回来，也万万不会落入我的苦海。”（《一滴泪》第十七章）

30年生命的代价，从希望到破灭，从梦想到醒觉，绕了一个人生的圈子。上世纪80年代，他终于偕夫人和儿女返回美国。

他将这30年的坎坷人生归结为：“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令人读后感叹不已。

2011年夏，我忽然接到他从美国打来的一个电话。真是很高兴。他看到了有关我的档案的书，他说那些揭发检举材料外国人绝对读不懂。他说还记得我刚进教养所时的模样。他笑了：“我印象里你很英俊。”我只有苦笑。我问他：“你在美国生活得怎么样？”他回答：“还算平稳，不再恐惧。”

我为难友祝福。心想：他终于回去了。他不会再回来了。■

（责任编辑 萧徐）

本刊稿件选用标准

一，本刊重点关注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特别关注亲历者的叙述。

二，内容真实可靠，不可有任何虚构。文中重要引语，请注明出处。

三，篇幅不要过长，一般四五千字，长篇最好在八千字之内。

四，原则上一稿一投。如一稿多投请予说明。

五，投稿三个月以上，未接到采用通知，请作者另行处理。作者请自留底稿，本刊无力退稿。

本刊社址：北京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100045

本刊电话：010-68534879

传真：010-68532569

编辑部邮箱：yanhcq@sina.com

yanhcq@gmail.com

黄药眠的“新民主主义观”

○ 黄大地 张春丽

黄药眠的新民主主义观主要体现于他1946—1947年间撰写的一组政论文章,即后来结集出版的《民主运动讲话》一书中,此外他1939年于《救亡日报》发表的《目前文艺运动的主流》以及1949年在《文艺生活》上发表的《从五四到今天》中也都有所表述。

黄药眠早年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投身民主爱国运动,曾参加《创造社》从事文学活动,后投身革命并到苏联共产国际工作,回国后曾任团中央宣传部长,不久被捕入狱。抗战期间,长期从事抗日救亡的文化宣传工作。抗战结束前,在成都加入了民盟,不久又到香港主办民盟机关刊物《光明报》,为中华文协香港分会主席。建国前,应邀到北平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和第一届文代会,会后长期在北师大任教,1957年任民盟宣传部长,参加了力促政改引发反右的“六教授会议”。

在半个多世纪的坎坷奔波的生涯中,黄药眠从未停止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关切与思索。开始他是相信进化论和三民主义,后左转信奉马克思主义,但在苏联的经历见闻使他感到苏联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国家,党内斗争残酷激烈,民主失缺,许多当年的老布尔什维克都在内部的斗争中惨遭迫害清洗,人们的精神思想都很受压抑。所以从抗战时起,他就开始思索一条既不同于苏联,又不同于英美的,符合中国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面临破裂前,他信奉的是以三大政策为标志的新三民主义。对于新民主主义的构建,他除了赞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治主张外,还设计了一套与之配合的,注重民主程序和民主结构的民主制度,从



1956年2月,毛主席与出席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的知识界委员亲切交谈(左起:黄药眠、费孝通、华罗庚、胡愈之、童第周)。

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新民主主义观^{注1}。

黄药眠的新民主主义框架

黄药眠的新民主主义的整个框架有什么独特之处,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有什么明显不同?应该说在对新民主主义这一政治概念的理解上,他们之间是基本相同的,即对新民主主义产生发展的历史背景,及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政治任务的认识理解上,他们之间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但是对于它构成的形态,运作的方式,发展的路径,甚至产生的时间,黄药眠都与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有着很大的不同。概括地说,他们的新民主主义观在经济层面上是基本相同的,但是在政治层面上则存在着很大的分歧。

如黄药眠也认为中国的民主运动是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特征的,这个民主运动是资产阶级

性的,但由于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使得中国的资产阶级异常软弱,所以这个革命运动是以工农大众为主要动力的,而且是以工农大众为主导的。

此外黄药眠还认为,新民主主义的提出还在于,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发展已走到没落和反动的时期。垄断的金融寡头,在政治上或者是采取公开的法西斯的独裁专政,或者是表面上维持着民主制度的形式,而事实上,则通过他们的代理人影响议会控制政府,甚至和封建的落后势力勾结在一起。财富的集中造成了广泛的贫穷,只有政治的民主而无经济的民主,政治的民主变成一个空壳。所以在这个时期,民主主义的内容和性质是和以前不同了。革命的对象再也不是封建王朝,而是金融寡头,帝国主义和封建的残余势力,革命的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肃清封建势力,废除或修正资本主义的不合理的制度……所以他强调:今天的民主主义,和18、19世纪的旧民主主义在内容上和性质上有着很大的不同,今天的民主运动所包括的范围更加广泛,所提出的要求也就更加实际和深入,这不仅是政治的改革,而且也是社会的、经济的改革,为了有别于旧的民主主义,所以就把它叫做新民主主义。^{注2}

尽管黄药眠为其新民主主义增添了许多社会经济改革的内容,^{注3}但他并没有因此在政治上放弃“旧民主主义”的基本观念,民主主义的原则仍然是其整个理论的核心。所以他强调民主宪政的观念,强调人与人间平等自由的关系,强调宪政的人民和政府间的权利与义务的契约关系。所以他在《民主运动讲话》一书中开宗明义地称:“民主就是主权在民的意思,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的意思”,但他认为“民主并不是一个名词……以为只要口头承认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就算是实行了民主,这是错的”。认为“我们今天提倡的民主,并不只是在原则上承认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而且还要把这个原则具体化,变成为实际的政治制度”。他还批评了那种认为“人民是有政权,政府是有治权”的说法,认为“独裁派正是利用这个理论来掩饰他们独裁的行动”。所以他强调“事实上政权与治权是不可分的,人民如果真的有政权,那么这个政权就必须贯彻到政府机关里去,人民要真正能够控制着政府”。^{注4}

黄药眠列举的民主要素有这样几点:第一,政府的权力是由人民赋予的,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权利义务都必须有着明确的规定。第二,国家的行政首长要向人民所选出来的代表负政治责任。第三,政府的主要施政方针和政策,要受人民所选出来的人民代表批准和审查。这即是说,“一个国家如果公民的权利没有基本的保障,没有政府和人民间共同遵守的宪法,没有向人民负政治责任的行政机构,没有真正代表人民的议会,那么,这个国家就不能算是民主国家。”^{注5}

他认为制定一部民主的宪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规定着国家的体制,政权组织的形式,以及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他同时也强调,“宪法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人民如果想要享受基本的民主权利,那么他们就必须用斗争的方法去争取”。称:“……宪法乃是人民斗争的结果……而争取民主的斗争也就叫做宪政运动。”^{注6}

而且他还认为,光有一部宪法还不能认为民主运动已经取得成功,“当专制的独裁者看到民主的力量不足以拥护这个宪法时,他就会一脚将它踢开,所以有了一部宪法,并不能说民主制度已经实现。必须在宪法的后面,有着人民的力量做后盾。在专制制度推倒前,我们要有力量去推倒它,或者限制它,即使是在专制制度推倒后,我们还是要有力去压制它,肃清那些潜伏的残余势力,以此来监督和保证宪法之真正的实施”。强调:“宪法的制定是一个斗争,而保证宪法底实施,和促使民主运动更向前发展,也还是一种斗争。……所谓民主制度,必须以人民是否能实际控制国家政权,和人民是否能实际享受一般的民主自由与权利为断。”^{注7}

黄药眠的新民主主义不仅承认民主主义的一些基本的观念,而且它对于新民主主义的国体与政体也有其自己的看法。它一方面认为新民主主义的国体不同于英美的三权分立的民主政体,也不同于苏联那种工农联合执政的民主政体,另一方面,它也不同意毛泽东所说的,“它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体”,而是认为,“中国的民主是各阶级共有政权的民主”,是“三民主义共和国的民主”。至于政体,也即政权采取的形式,黄药眠认为:它“是基本上根据于三民主义,人民享有创制、复决、罢免、选举、直接民权的民主”,其特

点是，“首先联合各阶级的力量，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获得民族自由和独立，然后逐步淘汰那些妨碍广大人民生活和自由的腐败分子。”^{注8}而不赞成毛泽东所说的，新民主主义的政体即是“民主集中制”。

两种不同思路

黄的这种论述，与毛泽东的观点有着深刻的差异。因为按照黄的说法，对敌对友两种矛盾处理的方式是泾渭分明的，对帝国主义和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大地主大官僚大资产阶级是采取坚决斗争的方式，没收其利用职权非法获取的巨额财产，但在人民内部及其各党派之间，他则主张采取民主协商和比较规范的民主程序来解决相互间的矛盾问题。广大工农在这个联合政权中尽管有较大的发言权，尽管他们可以为自己多争取一些利益，但是许多事情还是要照顾到各方面的利益，还要进行必要的民主协商，还要按照民主的原则和程序来办事的。如改善工农的生存条件当然必要，但是也要适度，即在保证工商业家一定的合理的利润的条件下，来提高工人的工资；在农业方面，则是减租减息，减轻农民的负担，而不是一味地没收土地，当然对那些利用非正常手段获取大片土地的大地主阶级除外。表现在政治上，则是反对一党专政，主张各党派和平竞争，他强调：“我们今天要求所有各政党应该有合法平等的地位，在政治纲领相同时，各政党可以共同参加政府，和平友好地竞争，执行这民主的政纲，每个政党都是独立的，彼此都是平等的，谁也可以批评谁，谁也不必打倒谁。谁要在人民中间获得了信仰，谁就可以一天天壮大，谁要不能为人民服务，谁就要一天天落后。总之，每个政党都站在平等的地位不受任何威胁的自由竞争，让人民裁判它们政纲的优劣，服务精神的好坏。大家互相保持政治家的态度，一点也不用仇视”。^{注9}



1960年，黄药眠57岁

相比之下，如按照毛的说法，情况就会变成另外一个样。所谓“新民主主义的国体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这种集权的思路十分鲜明地体现在了毛所说的政体（即政权采取的形式）是“民主集中制”之上了，所谓民主集中制，实际上并不是一种国家的民主制度，而只能算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后无限扩展到了军队、政府、人大、机关、学校等所有领域，但在当时强调的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民主集中制”就是作为政党的组织原则，也是非常蹊

跷，难以界定的，因为它既可以偏重民主的方面，又可以偏重集中的方面，既可以先民主后集中，又可以先集中后民主，任何人的任何做法都可以从这种制度中为自己的行为找到合理的解释，而功效如何，则完全要看当时权力斗争的形势而定，而并非通过制度的科学稳定性来决定。如斯大林每次采取措施加强他的独裁权力，都必定援引“民主集中制”；而赫鲁晓夫取消斯大林的集中制时，引用的也是这条原则；那些取消赫鲁晓夫分权制的人，引用的还是这条原则。因而从党的组织原则来讲，它也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类似权谋之类的制度，而不是什么正经科学规范的政治制度。

而如果把这样的制度掺和到国家的行政机构和人大会议中去，则将更是贻害无穷，由于得不到监督，由于党、政、人一体化，这种民主集中制，势必会将国家的民主结构和民主程序搞乱，不仅会干扰破坏民主监督的职能（所谓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就是要通过行政手段来控制民主的进程和职能，压制民意），而且还会使行政立法两条线的民主制约机制变成为由一党主导的不受监督制约的党化政治，使得无论什么事情都会沾染上一个党化的身影在里面搅和。特别是在当前的市场经济下，这种“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制

度,无疑是导致官僚阶层集体腐败的元凶,所以如把它当作为民主的制度用到国家事务中来,必将不仅使它原来所具有的便宜机动的优势丧失殆尽,而且还会变本加厉地成为弊端对国家的事务造成破坏。

就是左派学者李文采也指出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缺陷,^{注10}认为:……毛泽东没有意识到未来新民主主义经济之中的属于全民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的代表权的归属问题。这个权利必须归享有国家及地方最高权力的全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系统,这是民主集中制的政治体制的命根子,是共和国的命根子。一旦没有了这一条,民主集中制的政治体制也就不复存在了。而我们的问题恰恰就出在了这里。毛泽东让政府代表人民行使全民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代表权,从而使他领导的社会滑进了官僚社会主义的泥坑。

相比之下,在黄药眠这里,他虽然不主张西方那种三权分立,但他至少要求两权分立。所以他在文中反复强调人民代表及代表大会对政府的控制监督作用,强调多党平等竞争,由人民投票来决定各党在人民代表会议中的份额和组阁的权利,以便使人民代表会议摆脱某一党派的控制,并以此来实现以人民为主体的两权分立。民选立法监督的人民代表会议是一条线,组阁的行政是另一条线。政府(无论由一党还是多党组成)并不是向某党派的领袖负责,而是要向不受任何党派控制的人民代表大会负责。这就是两权分立的政体格局。而且他在文中有意淡化党派领导的色彩,而是突出人民的主体地位,和人民独立立法创制、复决及对政府的监督控制职能,强调无论由哪一党派组成的政府,都只是人民的奴仆,它唯一的使命就是,忠实地执行人民的意志和意愿。政府除了要对民选的人代会负责,人民还要有实际控制监督政府的权力,如果它不能执行人民的意志,人民就有权改造这个政府。而且民选代表和其代表会议对政府的监督是独立的,不接受某一党派的控制,更不会接受什么民主集中制的指导的。^{注11}

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他主张采取均权制。认为,我们反对中央集权,而主张地方均权,我们反对现在这样的情况,把主要的税收通通归到中央去,而地方毫无支配之权。我们反对各地

方的行政长官都只向中央政府负责,而不向当地的人民负责。我们主张地方政府民选,各省应有省宪,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权限应划分清楚。

而对于民族问题,他主张少数民族对大汉族的民主,主张破除大汉族与他们之间的界限,奖励通婚和帮助他们发展生产事业,提高生活和文化的水准。而在边疆,人数较多的少数民族,我们应该允许他们根据他们的全民的意志,实行分立,或成立自治单位。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消灭民族间的仇恨,谋共同的发展。^{注12}

此外,就是在对“五四”运动的看法上,黄药眠也不同意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那种认为在“五四”以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但在“五四”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无产阶级的这种牵强附会的说法。

黄药眠认为:“……到了‘五四’,文艺运动不仅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而且是作为整个意识形态的革命的一翼而出现着。就当时的情形说,西洋资产阶级的思想是占着优势的,至于马克思的学说,只占有一部分的势力,而俄国的十月革命也只有在少数青年群中起着启发作用”。相比之下,他认为共产党的及无产阶级运动的影响只是在1925年“五卅运动”以后才逐渐突显出来,并以此赢得了与国民党合作的资格。而且他认为这种平衡一直维持到了抗战爆发,他还客观地认为,至少到抗战爆发之前,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仍还保存着很强的势力,而左翼的新兴文艺,因路线不对头,又不能很好地深入民众,因而只能在城市的文化人中间打转,无法打开局面。^{注13}

这种分别的重要意义在于,客观地承认资产阶级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主导地位,不仅对于正确看待中国资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贡献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也有助于实事求是地吸取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精华以构建和发展中国的新民主主义。而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资产阶级的主导作用,否认资产阶级在中国现代文化发展中重大的启蒙作用,武断地将无产阶级标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没有事实根据。

对于新民主主义发展的方式,黄药眠也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如在抗战初期,全国各阶层人民

团结一致对外的背景下,他主张,抗战文艺发展的方向应该是,在“五四”民主主义基础上的扩展,他把文艺运动向着广大蒙昧地区的拓展,看作是一场新的长征,看作是一场新的启蒙运动,不仅从政治、社会的角度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而且从文学运动本身看,他认为也是由量变到质变的开始。^{注14}从而暗示出,他对新民主主义的产生发展,并不只是单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并不单是从群众运动的角度入手,而是还能从民主主义扩展的角度,通过启蒙和扩大民主范围,使广大的工农民众获得民主的武器的角度来加以考虑,在文中,他表现出了对旧民主主义的尊重,和对它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启蒙作用的高度肯定,而且也显示出,其新民主主义发展的思路,是在旧民主主义的基础上,通过扩大民主的范围,以渐进的量变到质变的方式来完成的。

总之在他看来,采用新三民主义,放弃旧三民主义的初衷只是因为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下,旧三民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实际问题,但采用新民主主义并不应放弃旧民主主义中进步合理的部分,反倒是应加强发展这种民主的制度,这样才能使新民主主义获得广泛坚实的社会基础,从而取得真正的胜利。

总括地说,黄药眠的新民主主义观,为我们描绘了这样一种图景:

首先,这是一种多党民主竞争的新民主主义。突出强调人民的主体地位,它的着重点是在民主,而不是在党治,所以辨别它的标准,一是看人大是否拥有实际控制监督甚至改造政府权力,另一则是看人民是否真的享有一般民主自由与权利。

其次,人民的主体性是通过和平竞争的民主选举的人民代表大会来保证的,人代会不受某一党派控制,而是受民意控制,而民选的人大则又有权控制监督甚至改造政府权力。党派的领导权只能通过人大会议的多数来体现,从党派的角度讲,各党派都是平等独立的。因而这是一种两权分立的宪政体制。

第三,在人民内部则是要讲民主协商,并要按一定的民主程序来办事的。并用一套科学的民主制度来保证社会的公平正义。

第四,由于基层民主的建立,各级政府向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这就为中央与地方均权的联邦制铺平了道路。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黄药眠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最核心的区别是民主宪政与一党专政的民主集中制,并由此展现了不同的前景。参照当时的舆论,不难看出,黄药眠先生的理想在基本方向上体现了当时广大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对未来的憧憬。■

注释:

注 1 新民主主义这一政治概念,起源于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毛泽东于1940年将其发展成了新民主主义,但在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中间却流传着各种内容不尽相同的新民主主义。

注 2—注 7 黄药眠:《民主与民主运动》,原载《民主运动讲话》,群力出版社1947年6月版,第7-8页;第7-8页;第1页;第2页;第2、4页;第5、6页。

注 8、注 9、注 11、注 12 黄药眠:《我们需要怎样的民主》,原载《民主运动讲话》,群力出版社1947年6月版,第16页;第18页;第17、18页;第18、19页。

注 10 李文采:《就“重归新民主主义”与张木生先生商榷》。

注 13 黄药眠:《从五四到今天》,原载《文艺三十年》,中华全国文协香港分会1949年5月4日出版,第1页。

注 14 黄药眠:《目前文艺运动的主流》,原载《救亡日报》1939年8月16、17、18连载。

(责任编辑 萧 徐)

本刊启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及相关规定,结合我刊的实际情况,凡向本刊投稿,即视为作者将作品的数字化处理权、网络传播权、电子发行权、无线增值业务权授予本刊,同意本刊将以上权利转授予与本刊合作的第三方使用,稿件采用后即自动获得上述授权。本刊向作者支付的稿酬已包括上述使用方式的稿酬。如作者对上述处理有不同意见,请在来稿中声明,本刊将作适当处理。

炎黄春秋杂志社

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艰难转向

——评萧冬连《国步艰难》

○ 王海光

萧冬连最近出版了一部新书《国步艰难——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5月),是一部浓缩版的社会主义时期党史。作者用15万字的字数梳理了中共治国60多年的历史,偌大乾坤一袋装,这份治史的凝练功夫绝非一般学者可企及的。

萧冬连治史,素有宏观观照的学术情怀。在1993年,林蕴晖教授和他的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的同仁们,曾出版了《风雨兼程——新中国四十年发展战略的演变》一书,试图从现代化发展的视角去认识这段历史,当时在学界很有些影响。萧冬连就是作者之一。20年后,萧冬连独力完成了《国步艰难》这部书,无论是史实的丰富,还是识见的明晓,都是更上一层楼了。该书提纲挈领地概括了从1949年以来中共的执政历史,用笔严谨,开合自如,有细节,有概括,有血有肉,有文有质。在关节处,要言不烦,几句话就点明了旨意。可以看得出,作者对这段历史吃得很透。

我与萧冬连是在学术上声气相投的朋友,时常会通个电话讨论一些治学问题,非常赞赏作者所持的学术态度。这就是本书开篇所说的:力求每一判断都立于可靠坚实的材料之上,收敛过度解读的冲动,对历史的复杂性抱持一种敬畏;着重于发掘历史本身的逻辑,而不是做简单的道德和价值评判,拒绝用某种既定框架框定历史。持这种研究态度和价值立场的著作,自然不同凡响。

社会主义是一个大问题。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曲折道路,是中国当代史的历史主轴,十分复杂而又高度敏感。其发展道路是大起大落,一波三折,歧路亡羊,但始终在现代国家的门槛之外踟蹰徘徊,逡巡不前。《国步艰难》以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选择和转向为线索,梳理出了一条社

会主义在中国实践过程的演进逻辑,充满了呕心沥血的思考,同时又有对未来的展望。

中国社会主义路径五次选择的历史实验报告

历史学家与理论家、政治学家的著述方式不同,他不是从现有的理论框架出发的逻辑推演,而是根据原始的文献史料进行的历史梳理,首先强调的是历史史实的准确性,避免了空疏的议论。正因为如此,历史学家的写作,写字数多的书比较容易些,写字数少的书是很难的。因为写的字数越少,对史料和史实的提炼和概括的水平就越高,难度就越大。

社会主义是一个大题目,既是一种价值观念,又是一套制度体系,还是一个现代化的运动路径,亦真亦幻,亦实亦虚,研究起来殊为不易。《国步维艰》从中国社会主义路径选择的实践方面,提出了本书的叙述逻辑:即实现新民主主义—仿效苏联体制—追寻赶超之路—发动继续革命—转向改革开放。对这个叙述逻辑是否合适,尽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它划出了一道比较清晰的历史主线,可以看到许多问题的来由,评述不乏有点睛之笔。笔者印象最深的主要有四点。

一是对历史的概括和提炼,具有深刻的哲理性,让人耳目一新。比如书中对大跃进的评价说:任何时候都应对人类理性的局限保持一份警惕,谨慎对待按照理想设计出来的社会方案。理想是提升社会的明灯,现实则是一个试错改良的过程,把理想直接拿来作社会试验,必然带来灾难。理想越崇高、目标越远大、权威越强大,带来的灾难可能就越大。这类精彩的语言,俯首皆是。

二是对历史的叙述平和冷静,对历史人物的

评价客观公允,关照到了历史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如书中讲到邓小平的改革时,在肯定之中也客观地指出了相关问题。作者认为:邓小平几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主要着眼于提高行政效率,而不是民主化,更不接受西方式民主的模式。他可以允许自由,但底线是不能挑战共产党的合法性。邓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就是为自由设置底线。不可否认,邓有力地控制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但也留下政治体制改革难以推进的诸多问题。作者对毛、刘、周,乃至对林彪的评价,也力求做到爱不溢美,恶不贬损的客观性和公允性。

三是在叙述历史演进过程中,不是史实的平铺直叙,而是深入历史活动的肌理,有针对性的观点,有准确的问题意识。如讲中国改革的起步时,作者在叙述了“渐进”改革和“增量”改革的观点后,指出:改革初期并没有清晰的路线图,……在某种意义上说,“摸着石头过河”是唯一可能的选择,许多情况下是实践推动政策走。市场机制具有为自己开辟疆域的力量,观念和政策的突破往往是对事实的追认,所谓“与时俱进”也可称之为“顺势而为”。这个观点是非常到位的认识。

四是对关于社会主义和当代中国的历史演进的许多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深度思考,梳理出了一条从过去到未来的历史发展逻辑,具有哲学家的冷峻与深刻。作者提出了在人们心中萦绕不去的一些根本性大问题,如:20世纪社会主义何以兴起并成燎原之势?中国能否告别革命?中国为什么会搞计划经济?为什么会走运动治国的道路?作者认为原因有四,1. 目标模式上的“理性的自负”。把马克思提出的未来社会理想,当作现实的选择。毛泽东对共产主义的梦想超过列宁,甚至超过了斯大林。为了实现高尚目标,可以超越于法律之上采取任何强制手段。2. 革命化造成了激进主义的持续泛滥。革命能够带来平等观念,推动社会结构的重新整合,具有推动民族国家重建的意义。革命激进主义的负面作用,是使“不断革命”成了革命后的持续主题,毛泽东时代的一系列左倾政策都带有革命战争年代的经验胎记。3. 计划经济的致命弱点。计划经济模式动员资源的能力很强,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却不能有效地利用资源,效率低下。特别是它将所有社会成员都固定在特定区

域和单位之内。人们得到了某种安全保障,却以失去自由为代价。这种体制的运作,必然要依靠强制动员。4. 作者特别提出了毛时代的政治运动治国成为常态的原因:一是用运动为强制性制度变革扫除障碍,二是用运动反对体制性的官僚主义,三是在运动中进行权力再分配。这些认识都是非常有深度的。

对于中国现代化的转型问题,作者认为,当前中国已经走出了传统社会主义的藩篱,但社会转型尚未完结。诚如作者所言:如果说世界上有两个坏东西,一个是贪婪资本的,一个是腐败的权力。还有比这更坏的,就是权力与资本的合谋与分账,即所谓权贵资本主义。作者提醒人们:中国需要逐步走上民主宪政的道路,但通向现代民主宪政的道路仍然只能是渐进的中国式的。这些都是总结了一百多年人类社会主义试验、中国60多年革命和改革的经验之谈,不能等闲视之。

历史是一个将错就错的过程

邓小平总结过去几十年的经验教训,最核心的就是:我们过去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冬连从这个角度梳理中国当代历史的发展脉络,发展线索是很清晰的。我想再说一点自己的看法。在博源基金会关于荣剑的“中国能否告别革命”一书的讨论会上,我讲



中共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图为十三大会场。

过一个观点：历史是一个歪打正着的结果。从冬连的“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说起，我想再补充说一下，历史还是个将错就错的过程。

研究中国当代历史，是一项很有挑战性的工作，首先有一个认知方式的问题。这段历史具有双重面相：第一重面相是实在性的历史，就是真实的社会情况是怎么回事儿，真实的历史过程是怎么回事儿。还有另一重面相，就是构建性的历史，即凭着一种人为观念重新构建出来的历史。我们的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属于构建性历史的范畴，在这里面有社会真实存在的成分，也有观念构建出来的成分，是一个观念与实在的双重互动的发展过程。对中国当代历史的认识，特别是对1949年以后的认识，很难简单地给出一个定论，是非常复杂的。这段历史复杂性在于，它实际上是一个多项世界，外来的和传统的，外生的和内在的，观念的和实在的，各种因素都在发挥作用。我自己就长期存在一个困惑，就是理论的力量到底有多大？社会主义理念对我们实在的历史进程究竟发生了多少作用？领导人在历史的选择过程中，是从理论设定的目标出发，还是从实际碰到的具体问题出发？毛泽东有没有从社会主义价值理念出发的“顶层设计”？

从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的社会主义观念，就是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以俄国十月革命为蓝本，建设是以斯大林模式为蓝本。以俄国十月革命为蓝本的革命，就是苏维埃革命，照搬过来的路走不通，就搞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成功。建国后搞了以斯大林模式为蓝本的社会主义，也搞不通。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斯大林模式的变种，改良版的斯大林模式，也失败了。“文革”后的改革开放是扬弃了斯大林模式，取得了成功。但斯大林模式的一些制度性影响还在，现在改革中出现的许多问题也都与斯大林模式的政治制度弊端有关系。我们现在要搞的政治体制改革，改的也就是这些东西。从历史上看，我们可以看到中共是一个变通能力很强的政党。在其发展过程中起着最重要的主导作用的，往往不是理论，而是碰到的具体问题和具体压力，是从解决现实问题出发的政策选择。中共领导人大都对理论抱有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就是邓小平说的“要管用”。

从历史发生学的意义上可以看到，在中国当代史的历史发展中，执政者们并非是按照一个既定的方针行事，对理论的使用带有一种功利主义的趋向，经常是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动员口号和宣传工具。长期以来，在中国大陆对社会主义理论的独立研究和探讨从来是不被鼓励的，还会有异端之嫌，有的“反革命案”就是因为独立探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而获罪的。即便在领导人的思想体系中，理论也总是滞后的。不是从理论中找到应该怎么办，而是在事后总结中的一种自圆其说的解释。所谓理论创新，实际上不过是后来的政策说明，并非是由学理阐发出来的。包括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实际上也是在“文革”发动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并不是事先预设的。所谓这些理论，都是为现行政策制造的理论根据。其发生都是滞后于实践的。但其理论发生后，又会为以后的实践提供了政策指导。

在中共建设社会主义中，确实是营造了一个强大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体系，目标模式是仿效的苏联模式，但在实践中又有根据自己情况的变通性，这又可以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共产党有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理论上的实用主义态度，能够根据自己的国情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调整。但这个调整也带来了自己的问题。就是国家发展目标缺乏坚实的理论支撑，政策变动的随意性很大。这种在不断的政策调整中总结出的一套说法和做法，后来我们归纳为中国特色。但这个东西带有梦说的特征，只有解释的价值，没有理论的意义。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我们总是在不断地犯错与纠错。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在执政者的决策过程中，理论分量可能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一再而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实际是出于用意识形态统一人们思想的需要，所以把社会主义都说给了基层的干部群众。道理很简单，理论学说是需要质疑的，而意识形态是不容质疑的。

中国社会主义的四种旧版式及其宪政版的展望

从历史叙述上，我对五次转向的阶段划分，

社会主义相比,两者的异同点是什么?

我对“文化大革命”发生原因的认识,是从三个历史维度进行考察的:一是从一百年来中国激进革命的历史,看这一套意识形态的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与作者还有点商榷意见。我认为应是四次,前两次“新民主主义嬗变”和“复制苏联模式”,从社会政治转型的性质上可以合并为一次。中国这四个阶段的社会主义类别,可分别成为仿制版、改良版、文革版、改革版。

第一次政治转型的主题是按照苏联的斯大林体制构建一个新国家体制。这是包括了新民主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改造阶段的两段历史。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从战时军事体制向国家正常体制过渡,二是从新民主主义体制向苏联体制的过渡。这不仅因为新民主主义阶段本身就是一个不确定的阶段,建国目标是苏式的社会主义;而且因为从实践上看,新中国的建政过程,就是整合社会,统一思想,建立党国体制的过程。这些过程是通过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三反五反、抗美援朝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来完成的。正是因为建立了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体系,全面控制了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才能在短短的时间内迅速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由于国家已经形成了控制社会资源的强大力量,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其实不过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阶段,书中是作为第四次社会主义转向,列为“发动继续革命”一章,也就是毛式社会主义的阶段。这一次是历史的轴心之变。前面的传统社会主义发展到了“文化大革命”是发展到了极致,后面的改革开放时期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扬弃。这里实际上有一个问题需要解答:就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与斯大林的

革命观念、社会主义观念如何形成,如何成为了实实在在的影响历史的观念系统。二是从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17年历史,看国家制度体系的发展变化,党、政、军及其群团组织的组织制度,政治运转方式。三是从大跃进失败以后的5年历史,看党内发生的政见分歧、党内冲突和斗争,这是“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导火线。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后,新政权就大力宣传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实际上,中国完全照搬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也是搞不了的。因为中国的国情环境、自然禀赋、干部队伍素质、文化历史传统等等和前苏联截然不同,许多东西是移植不过来的。官僚体制的一套移植过来了,但现代化制度化的那套东西搞不来,还当成是教条主义,后来到“文革”更是把现代社会管理的这套规章制度当作修正主义路线进行批判。毛泽东试图把中共的革命战争经验与斯大林体制相结合,用军事共产主义、群众运动、思想革命化的动员方式来解决斯大林体制的激励机制不足的问题,发展目标搞的还是以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模式。这种改良型的斯大林模式,比起母本来讲是更加粗糙。计划经济缺乏计划理性,长官意志盛行,不仅有着缺乏激励机制的通病,而且是又乱又死。所以,苏联计划经济的这套东西在中国社会上扎根是很浅的,改革的起步比较容易。

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虽然组织的制度化程度是比较低的,但社会控制的能力更强。比如说中国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与苏联的居住证制度相比,对居民的管束就要严厉得多。而且从

中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来看,并不是一下就形成的,有一个很长的过程。开始形成于统购统销,正式出台于反右派运动后的1958年1月,定型于60年代的大饥馑时期。在这个形成过程中,不仅有苏联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中国领导人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城乡冲突的问题选择。这里有中俄两国的历史传统的影响,强迫农民为政府纳税;有信仰政治带来的决策失误,以为实现了合作化能够创造更高的生产率;有为强行工业化提供社会资源的需要,为了从农村取得更多的资源,必须强行实现集体化;有统制经济和政治运动的双重互动,既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更是计划经济失灵的产物。特别应该看到的是,政治运动在其中的重要作用,构成了一个现实的逻辑。搞了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化后,农村人口的外出推力持续加大,造成了城乡关系的持续紧张。反冒进运动限制农村人口进城,大跃进运动又放开农民进城的口子,大饥馑时期又紧缩城镇人口,在这个一紧一放的过程中,强化了户籍制度的社会控制功能,并作为了一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核心制度。

这些控制社会的制度长期形成了一些社会矛盾,酝酿着社会不满情绪。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借助于毛泽东号召的这场群众运动,这些社会矛盾和社会情绪就在众多群众响应毛泽东革命造反的旗帜下发作起来了。“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一发而不可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文化大革命”对十七年体制的摧毁是相当严重的。但是,“文革”对改革有一个很好的作用,它把所有的利益集团都给打平了。所以,中国改革一经启动对各方都是正能量的。无论是哪个阶层,哪个派系,哪个人群,都是能够得益的,对改革都是支持的。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新的利益集团又重新开始形成了。虽然经过了“六四”风波,但这十年改革已经形成了历史发展的趋势,这是退不回去的。当邓小平南方谈话后,高层政策马上就调整过来了,市场化的改革潮流一经启动,是不能逆转的。

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把社会主义的话语权掌握在了中国共产党自己手里了。一切从有利于发展经济为出发点,抛弃了过去一些传统社会主义的观念,如单一公有

制、计划经济等。对过去当作罪恶渊薮的私人资本不再是排斥,而是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以生活的常识颠覆了教条主义的玄理,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基础上重新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

但是,中国这些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带来了日益严重的社会公正的问题,也严重违背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基本要求。中国当前的问题是新的问题:在市场化中形成的没有节制的资本,在旧的政治体制下的不受制约的权力,两者结合起来了,形成了权贵资本主义。这是当前社会转型的最大障碍。权贵资本主义体制与过去的传统体制相比,有着更强大的提取社会财富的能力,靠破坏自然生态的数量型发展,甚至能把子孙粮都给吃光了,但却没有维护社会公平的道德能力,缺乏应有的社会责任的担当,制度的自我平衡能力更逊之。

现在可以看出来,经过这些年市场化的改革,过去的政治体制实际上只剩下一层皮了,就剩下了共产党的领导是实在的,其他都没有了。但是共产党领导的法理基础、统治基础和政治威望,与过去的党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了。传统政治体制实际上是一个很薄的蛋壳,已经容不下市场化改革的社会多元化发展的丰富内容了,实行宪政民主体制是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必由之路。

辛亥百年以来,我们在宪政民主国家制度的门槛外面,已经踟蹰徘徊很久了。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面对全球化的开放世界,人们对现代政治文明的要求是越来越迫切了。宪政民主已成为时代的共识,热门的话题。但是,诚如作者所言,这个实行宪政民主的过程,只能是渐进的发展过程。不能指望靠一次制度创新,就能够解决了一切社会问题。中国在进行现代化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曾一再被信仰政治所误,以为一旦实现了某种理想制度,就能实现中国的跨越式发展,就能实现国家民族的复兴。这种急于求成的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为民主的努力反而失去了民主,为自由的奋斗反而失去了自由。前人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上的经验教训,对今天的我们走向宪政民主道路是非常宝贵的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讲,萧冬连的这部书,可以说是恰逢其时。■

(责任编辑 萧 徐)

苏联衰亡史的缩影

——读《古拉格：一部历史》有感

○ 唐少杰

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凡是用手制造的东西人们都能用手将其化为齑粉。

不过重要的一点是：石头在本质上从来没有善恶之分。

——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被推倒的塑像》

记得25年前，中国公安部下属的群众出版社再版了“内部发行”（亦即当时市面书店不可能公开上架）的索尔仁尼琴著的《古拉格群岛》中译本（“古拉格”原意是苏联内务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先后下属的“劳改营管理总局”的首写字母），当我得知此消息后，我托“内部关系”好不容易从该出版社读者服务部购得此书。通读了这三大卷、约计2000页的巨著，我深感震撼，久久难以平静，真正感受到“苏联模式”的弊端已病人膏肓，仿佛预感到苏联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制度已不可救药。也正是由于读过了这部巨著，自那之后的几年里所发生的苏联解体以及苏联共产党的灭亡等重大历史事件，对我来说，已经不是什么意外之事。

苏联解体及苏共灭亡后，中国出版或发表关于这种解体和灭亡的原因的专著、文章，迄今为止，难以计数。非常有意思的是，作为曾经深受“苏联模式”影响而其遗风余迹现今依然不绝的中国，对于这种原因探讨和概说的热衷，至今方兴未艾，不亚于苏联故国家人的反问和追寻。据我所知，仅仅关于苏联及苏共亡国亡党的原因，不同的中国学人就提出了近二十种不同的界定和解说，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而，通读了美国学者安妮·阿普尔鲍姆所完成并发表的《古拉格：一部历史》（Gulag: A History）之后，不难看出，“古拉格”现象、历史以及它们的全部问题本身正是苏联及苏共亡国亡党的重要症结或关键所在。因此，《古拉格：一部历史》

就是苏联衰亡史的缩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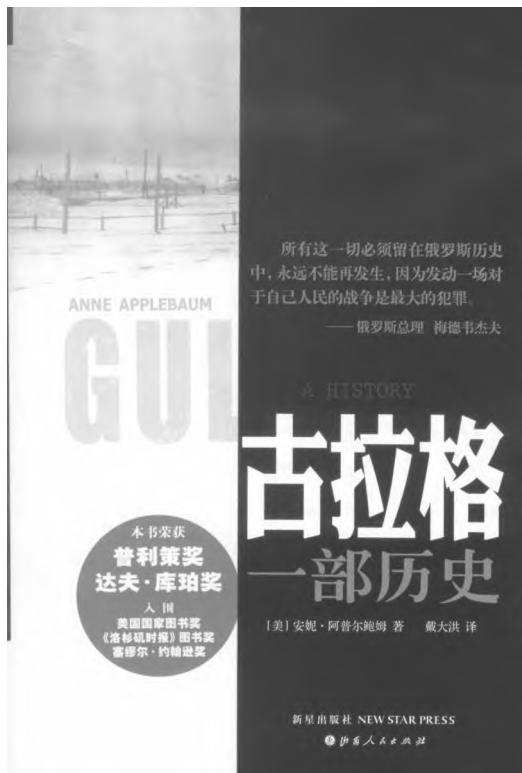
40多年前，索尔仁尼琴写就的《古拉格群岛》成为记述20世纪极权主义社会以暴力统治和以恐怖维持的集中营及劳改营生活的一部历史里程碑式的著作，而在21世纪之初，阿普尔鲍姆写就的《古拉格：一部历史》一书则开创了具有世界意义的展现和反思“古拉格”现象和其历史的新视域。具体而言，《古拉格群岛》是索尔仁尼琴写下的一部历史文学纪实性的著作，1973年，此书出版时，作者自认为只是“受委托处理晚近的一些故事和书信的代理人”，作者还没有致力于全面揭露“古拉格”的历史及其各个方面。作者的笔触既略有遗憾又带有希望：“我不敢放肆去撰写古拉格群岛的历史：我没有机会阅读文献，但什么时候谁又会有机会呢？”30多年后，索尔仁尼琴的愿望终于在一位美国学者那里得以实现。从《古拉格群岛》到《古拉格：一部历史》，从“古拉格现象”的揭露到“古拉格历史”的全面评述，后者堪称一部力作，称得上创立了或者大大丰富了“古拉格学”，至少是开拓出世界范围的“古拉格”社会历史学（或“历史社会学”）研究的新领域。

《古拉格：一部历史》自2004年出版之后，好评如潮，获得美国著名的“普利策奖”、“达夫·库珀奖”并且进入多项图书大奖的提名，被译成不同文本。在我看来，该书有以下几大“亮点”：

首先，细致全面，鞭辟入里

基于丰富而翔实的史料文献，特别是大量的原始档案和第一手的采访资料，该书用三分之二左右的篇幅来记述“古拉格”自1917年至1986年的兴衰历史过程。它不仅具体地追溯了“古拉

格”的起源、最初形态、重大转折和典型个案，而且充分地展现出“古拉格”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取向、内在结构、外在形态和特定宿命，还比较准确地整理或统计出“古拉格”诸多方面的概况、特征显现、质的演变和量的进化。“根据迄今为止最精确的统计，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五三年间，四百七十六个劳改营组成了古拉格的王国。……实际上，这些劳改营中的每一个都是由十几个甚至几百个更小的劳改营组成的。”（《古拉格：一部历史》，第200页；以下引用只注明页数）的确，这成千上万座大大小小的“古拉格群岛”构成了苏联社会历史从政治到经济、从精神到心理、从领袖到平民、从中心到边缘的不同生活领域的那种令人惊奇的相似的共同内容或共同“底色”，这种内容或“底色”也是索尔仁尼琴之所以把他自己的那部代表性巨著题名为“古拉格群岛”而意指苏联社会历史本质的所在。根据《古拉格：一部历史》的估算：“在一九二九至一九五三年间，一千八百万苏联公民在劳改营和移民定居点里待过。”（第635页）“把各种数字加在一起，苏联被强制劳动者的总数达到两千八百七十万人。”（第637页）其中，死去的人数为“二百七十四万九千一百六十三人。”（第639页）“在一九三四至一九五三年间，因政治原因被处决的人数为七十八万六千零九十八人。”（第639页）这也就是说，在斯大林去世之前，直接经历过或陷入到“古拉格”生活的总人数不会低于当时苏联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十。在我看来，“古拉格”的一则训诫简直就是来自几乎为所有的极权主义所信奉的一条魔咒：“杀死一个人等于杀死一条生命，而杀死一百万人那就是一个统计数字了！”该书作者还进一步指出，无论是关押的总人数还是死去的总人数，他们所影响的或所涉及的家人、亲属、朋友或同事等等总人数远远超出前者若干倍数以上。因



而，全苏联社会与“古拉格”生活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直接关联的总人数不会低于数千万！“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铁丝网里面的生活与铁丝网外面的生活之间的区别与其说是本质上的，不如说是程度上的不同。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古拉格经常被说成苏联社会制度的典型体现。即使是在劳改营的俚语中，谈到铁丝网外面的世界时也不是说‘自由社会’，而是说‘大监狱’，它更大，没有劳改营的‘小监狱’那么要命，但是并不更人道——肯定不会更人道。”（第xv页）更加荒谬的是，“从新的苏维埃国家刚刚成立那时起，人们就将因为他们属于某一类人而非因为他们做了什么被判刑。”（第6页）很多情况下，人们之所以被关押在“古拉格”之中，不是因为做了什么或者没有做什么，而只是因为他们的出身、家庭、身份和亲人属于“另类”。由“古拉格”所逮捕、羁押、惩罚和管理的囚犯，不只是旧国家政权的“反动分子”、持不同政见者、宗教神职人士、苏共党内被清洗的干部、外国敌特分子，还有那些偷窃一条面包或三瓶葡萄酒或数次上班迟到或没有完成工作指标等等的“小人物”。“古拉格”的法制，就是无法无天。就连那些“古拉格”的领导者、迫害者本人也难以逃脱被“古拉格”的政治绞肉机所吞噬的厄运。

读完了《古拉格：一部历史》，掩卷思索，联想起列宁一句名言：沙皇俄国是俄罗斯各族人民的监狱。

其次，横向透析，纵向贯通

《古拉格：一部历史》不只是囿于“古拉格”问题本身，而是既根据于又超越出这一问题来从更大更广的时空坐标系呈现出这一问题的世界性意义和世纪性影响。该书非常出彩的一个地方

就是多次、多层面地把 20 世纪两大极权主义的象征——纳粹德国的集中营和苏联的“古拉格”加以比较。尽管后者比起前者来更加悠久也更加逼近,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古拉格”现象及其历史的反思或审判远远不及对于纳粹德国集中营的揭露或研究。这里,除了纳粹德国的集中营比起苏联的“古拉格”更加广泛和更加直接祸害全欧洲等原因外,在我看来,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包括一切爱好和平、主持正义和追求自由的人们,是否有勇气、有能力像当年鞭挞或埋葬纳粹德国的集中营制度那样来审视或清算苏联的“古拉格”制度?“实际上,在阅读关于两个集中营的幸存者的记述报道时,受害人的不同遭遇比两个集中营之间的区别给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每个故事都有其独特的内容,每个集中营让不同性格的人产生不同的恐怖感。在德国,你可能死于残忍;在俄国,你可能死于绝望。在奥斯维辛,你可能死于毒气室里;在科雷马,你可能冻死在雪地上。……归根结底,你的人生经历是你自己所独有的。”(第 xxvii 页)甚至,连著名的苏联索洛韦茨基劳改营所写的“通过劳动——获得自由!”的牌子都与纳粹奥斯维辛集中营大门上方的那条“劳动使你自由”的标语惊人地相似。(第 189 页)我本人于 2010 年深秋参观德国慕尼黑郊外的达豪集中营时,也为目睹达豪集中营的大门上用铁模铸成的同样标语“劳动使你自由”(Arbeit Macht Frei)而震撼。毫无疑问,无论是纳粹集中营的“劳动”还是“古拉格”的“劳动”,都是无一例外地几近于死亡的劳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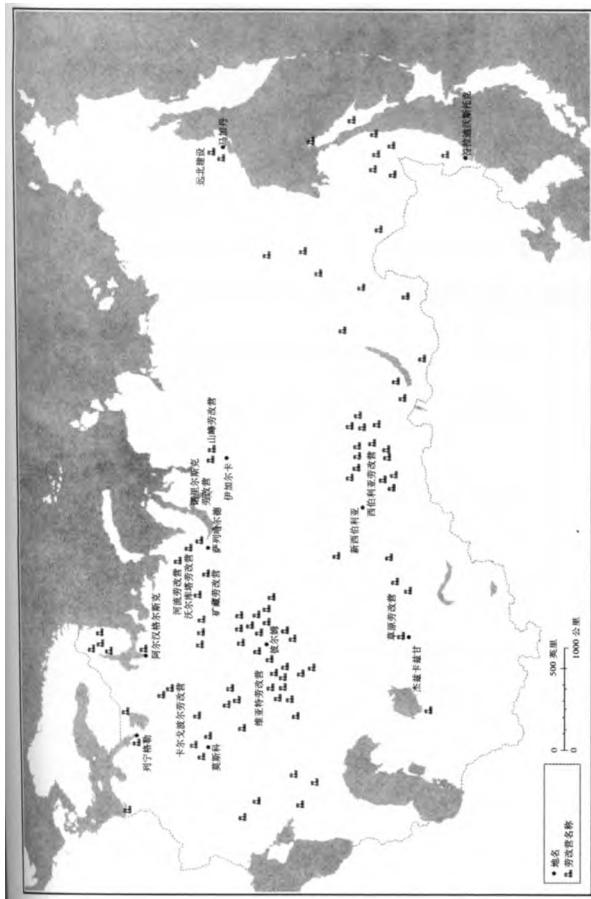
“古拉格”作为 20 世纪运作和横行了近 60 年之久的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极权主义统治及其恐怖的代表,到了 21 世纪的今天,它绝没有销声匿迹。“古拉格”现象及其历史不仅仅曾经深深地植根于苏联社会的各个方面,其本身就是苏联文化躯体所流淌、所循环的“血液”或“气脉”,而且已经演化出其不同类型的变种,成为 20 世纪不同人民共同拥有的经历。所以,“古拉格”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影响非常值得发掘和研究。该书作者提出了令读者们难以回避、难以平静的直切责问:“因为,如果我们永远忘记欧洲大陆另一半的历史,我们所了解的关于人类自身的某些东西也将失真变形。二十世纪的每一次大规模悲剧性

事件都独具特色:古拉格,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亚美尼亚大屠杀,南京大屠杀,文化大革命,红色高棉革命,波黑战争,其他还有许许多多。这些事件都有各自不同的历史、哲学和文化根源,每一次均产生于决不会重复的特定的局部环境。一遍又一遍地反复表现——而且还将继续表现——的只是我们贬低、毁灭自己的同类并且将其非人化的能力:我们把邻国变成‘敌人’;我们把对手贬为虱子、臭虫或毒草;我们一再把受到我们侵害的人说成劣等、次要或邪恶的人,只配监禁、驱逐或处死。”(第 631 页)

再则,高屋建瓴,游刃有余

《古拉格:一部历史》不只是从整体动态的或过程的角度来评述“古拉格”的兴亡演变,该书还用三分之一的篇幅即整个“第二部分”,从相对静态的或结构的角度,来展现出“古拉格”的逮捕方式、监狱机制、押解和运送程序、囚禁地的日常生活、强制劳动过程、奖惩规则、监管体系、囚犯类型、妇女和儿童、濒死囚犯的状况、囚犯的生存计谋、逃亡和反抗等等劳改营及其生活运作的总体状态,这些都既相当完整地再现了“古拉格”文化及其不断再生的整体截面,又深切有力地剖析了“古拉格”制度及其运行的诸多方面。

例如,一方面,随着苏联上世纪 30 年代全社会性的“大肃反”的实施,“古拉格”大力加速运转,高效地配合并且疯狂地加剧着这种遍及苏联社会各个层面的血腥清洗。“无论如何,在古拉格的历史上,一九三七年的确标志着一个真正的分水岭。因为,就是在这一年,苏联的劳改营暂时将自身从因疏于管理致人死亡的监狱转变为蓄意使囚犯劳累致死的名副其实的死亡营,也可以说它其实是在进行谋杀,死亡的人数比过去多得多。”(第 101 页)“古拉格”还不只是一个死亡营,它逐渐地成为苏联社会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苏联国家建设的一项主要活动内容。“古拉格”经营的事项从飞机、枪炮等武器的设计、配件生产到运河的开掘和铁路的铺建,从农牧渔业的运营到森林的开伐,从儿童玩具的制造到矿物的开采,从在苏联最恶劣环境地带的安营扎寨直到在整个苏联拥有 12 个时区的各个时区的分



全盛时期的古拉格,1939—1953

布设点,“古拉格”的角色和功能几乎无法超越、无法替代。从20世纪30年代末期,“劳改营进化了。如今,它们不再是一个个管理方式独特的劳动场所,而是一个羽毛丰满的‘劳改营工业联合体’,具有内部管理规则和习惯性行为方式,还有专用的配送体系和特殊的等级制度。”(第123页)仅以“古拉格”“旺盛”时期的1952年为证,以“古拉格”经济为自己营利实体的苏联内务部就“控制了苏联投资资本的百分之九,超过任何其他部门”。(第517页)毋庸置疑,至少是在斯大林时期,苏联经济带有着特定而又浓重的“古拉格”因素,甚至借助“古拉格”经济的支柱性功能来持续发展下去。

另一方面,“古拉格”不只是劳改的苦役场所和服刑的地狱王国,在“古拉格”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所弥漫、所延续的精神毒气和心理病变,对于所有置身“古拉格”之中人们的心灵的吞噬和人格的戕害,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古拉格”中所盛行并且以之所维系的难以言说的残暴、凶

狠、野蛮、严酷、狡诈、阴险、黑暗、无耻、欺骗、虚伪、谎言、告密、腐败、迫害、杀戮……都无不充分表明了这是一个高度自我分裂、彻底自我否定、全盘自我异化直至最终自我衰败的世界。又如,“也许,在古拉格的官僚机构内部,文化教育部门可以作为最后的替罪羊:如果计划没有完成,不应归咎于组织不善或营养不良,不应归咎于愚蠢残忍的劳改政策或缺少毡靴——而应归咎于宣传的力度不够。”(第260-261页)正如一位曾经是古拉格的囚犯所揭示的“一个使古拉格举世无双的悖论:‘在我们的劳改营,不但要求你做一个苦力,而且要求你在干活儿的同时还要歌唱和微笑。他们不只是要压迫我们;他们还要我们为此向他们表示感谢。’”(第261页)从“古拉格”风气在苏联大地的传播到“古拉格”给予“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所施加的风化,不难想象,“古拉格”文化成为致使苏联濒危临死的“癌病灶”!

最后,势如破竹,振聋发聩

一部“古拉格”的历史,就是反人性、反人道乃至反人民的历史。这部历史曾经大张旗鼓、不遗余力地惩戒所谓“人民的敌人”,而这种敌人的界定恰如“古拉格”的罪魁之一贝利亚所强调的:“人民的敌人不仅是那些从事破坏活动的人,而且还有那些对党的路线的正确性表示怀疑的人。”“因此,‘敌人’可以是由于某种原因反对斯大林统治的任何人,即使他没有公开表示要这样做。”(第110页)由此联想到中国古代历史上所说的“心中贼”、“腹诽”、“腹罪”等等,都可堂而皇之地列入“人民的敌人”!面对“古拉格”的暴行,著名女诗人阿赫玛托娃愤然喊道为什么平常百姓被无辜逮捕,娜杰日达·曼德尔斯塔姆答道:“你怎么还问为什么?你知道,这是一个不为什么就可以抓人的时代!”(第131页)实质上,强暴运行了半个多世纪之久的“古拉格”这种肆虐无度地施害于苏联国家和苏联社会形形色色、难以计数的各类人士的劳改制度及其机器,其内在的一个逻辑就是苏联“克格勃”(国家安全委员会)最后一任主席巴卡京所总结的“契卡主义”(参见巴卡京:《摆脱克格勃——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回忆录》,新华出版社,1998年8月版),这种主义的真谛就在于一句

话：“没有敌人也要制造出敌人！”职是之故，“古拉格”的本性就在于不断地制造千姿百态的“敌人”，包括“假想敌”；“古拉格”的使命就在于不断地灭绝千千万万的“敌人”，包括那些根本就不是敌人的人。

在与我的同事和学生多次讨论苏联及苏共亡国亡党问题的场合，针对关于这类问题所提出的那些不同原因和解释，我的提问往往只有一个：究竟是谁在历史上杀死、残害共产党人最多？面对我的这一提问，大家心知肚明，表情不一。譬如，“斯大林杀害的一九三三年以前的德国共产党政治局成员比希特勒杀害的还要多；在纳粹攫取政权之后逃到苏联的六十八名德国共产党领导人中，四十一名遭到处决或者死于劳改营。波兰共产党甚至可能被更加彻底地消灭了。”（第133页）概言之，苏联及苏共亡国亡党的原因既不是赫鲁晓夫的“和平演变”所引起的，也不是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所造成的，更不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所决定的，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这种原因已经在斯大林时期不断形成并且埋伏下来。

包括“古拉格”历史在内的苏联历史根本经不起人们的正视，经不起历史的反思，甚至还经不起人们的回顾。因为，十分明显，叩问“古拉格”制度及其机器何以能够造成尸骨堆山、血流成河、亡魂无限的无数冤、假、错案，何以迟迟不能平反昭雪这些冤、假、错案，“在赫鲁晓夫时代留任的斯大林时代的政治局委员阿纳斯塔斯·米高扬曾经解释过为什么给人平反不能进行得太快。如果立即宣布他们都是无辜的，‘那显然表明，正在治理这个国家的不是一个合法政府，而是一群歹徒。’”（第562-563页）1956年2月，赫鲁晓夫所作的那篇“秘密报告”之所以在稍后引发轰天巨响，这不只是在于它标志着斯大林神话或偶像的彻底坍塌，而在于从“古拉格”走出的数以百万计的“人民的敌人”用他们自己归来的言行和“罪名”的破产确凿地证实了这一“秘密报告”。确切地说，这是由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曾经让人感到震惊，不过，那是一个宏观事件，直接影响的是党的统治集团。相比之下，早已被认为不在人世的那些人的重新出现则以某种更加直接的方式使更大范围的人们了解了秘密报告的含

义。斯大林时代是一个秘密实施酷刑、暗中采取暴力的时代。突然间，对于曾经发生的事情，劳改营的归来者们直接提供了活的证据。”（第564页）给予这种证实及证据的又一个有力的“补充”，那就是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传达之后，苏联作家协会主席法捷耶夫举枪自杀，他给苏共中央的遗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射出的这颗子弹适用于斯大林的政策、日丹诺夫的美学和李森科的遗传学。”（第565页）30年后，到了1986年底，戈尔巴乔夫批准大赦苏联全部政治犯，这才标志着“古拉格”制度及其机器寿终正寝。

我个人建议，在阅读《古拉格：一部历史》之际，最好是结合阅读新近出版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所著的《雾霭——俄罗斯百年忧思录》中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1月版）。后一部书的作者担任过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被称之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设计师”，他在该书中用专门一章（参见该书第十七章：“两个政权并存的专政”）概述了苏联的专政历史是“党的机关政权”与“特工机关政权”共在并存的历史，亦即这两个政权的关系是相互依赖、相互牵制、相互消解和相互蜕化的关系。进而，这两个政权关系的历史就是“党的机关政权”滋生、寄生“特工机关政权”与“特工机关政权”维持、制约“党的机关政权”双向互动的过程。最终，不是“党的机关政权”折寿“特工机关政权”，就是“特工机关政权”断送“党的机关政权”。

最后，还是让我们倾听《古拉格：一部历史》的作者在该书结尾处的呼吁吧：“我们对不同社会如何把邻居和同胞从人变成物知道得越清楚，我们就对导致每一次大规模迫害和大规模屠杀的特定环境了解得越充分，对我们自身的人性阴暗面洞察得越透彻。写作本书并不像陈词滥调常说的那样，‘为的是使这种事情不再发生。’写作本书是因为，几乎可以肯定，这种事情还会再次发生。……我们需要知道这是为什么——因此，关于古拉格历史的每一个故事、每一部回忆录、每一份文件都是这个谜题的一部分，都是对它的一种解释。没有它们，终有一天我们将在醒来之后发现，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

（第631页）■

（责任编辑 徐庆全）

小议“一句话”等六则

○ 邵燕祥

历史的相似

中午吃饭的同时,把王立群教授讲评《史记》之秦始皇也听了个大概。

前现代的历史,不管东方西方,都有相似之处。例如独裁专制的政权,在代际更替时,或是各地风云突变,群雄并起,或是前殿后宫,斧钺相见,总之为了所谓“大宝”,就是由皇位代表的统治权。

兄弟叔侄,文武同僚,外戚宦官,彼此各不相让。各个摆出的理由,好像都挺充分的。不一一列举。

我想起了50多年前,曾看文革小报,这类小报当时担当了大任,就是彻底揭发“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每个成员的“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言行。它所披露的内容,常常比正式报刊有所提前,而且经常透露过去属于机密的内部文件。

挨批挨斗之余,在还保持一定自由的时段,不免走到街上散散步,散散心,从街旁小摊或行走叫卖者手中,买它几份小报带回家去,可以佐餐,可以消夜。

阅读态度,我是从姑妄听之逐渐进到“宁肯信其有”的。因为许多内容包括正式文件的原文,首长讲话的记录,不久以后都证实确乎不假,只是排印马虎,不免错讹,却也往往是一眼看的出来,容易辨别的。

记得在披露庐山会议批斗彭德怀的言论当中,有一位身居高位的领导人——不是一般的高位,而是高于彭老总的;这里姑隐其名,不是为了避讳,而是因为没有核实,几十年来我也不知道这句话是否真的出于此公之口——但即使不是出于他的口,也一定出自与他同一档次的领导人,因为这样精警的“锦句”,我以为是编小报的人无论如何也诌不出来的。

那句话是:“与其你篡党,不如我篡党!”我想,彭老总当场听到这句话,一定也会为之惊悚,真是掷地作金石声,叫人茅塞顿开。不但判定了彭老总的篡党之罪,同时又令其深感自己固然无心篡党,即使要篡党也属胆大妄为,因为你本来不够资格,到这时你才觉得虽身为国防部长你的官还小啊!——连带着想起,指认无名小卒如我者流要反掉党和制度,要颠覆政府,要江山变色,直是不着调的胡说,这位领导人若在场,也一定不以为然的。

这句十字箴言,底气十足,固然来自对自己“位高、权重、资格老”的自信,更是以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争权逐鹿传统的深厚积淀为理论基础和立论根据的!

只是同样甚至更加谙熟历代历史的伟大领袖,听到这句话,自然会格外注意的。 (2011.12.31)

读报偶摘

2011年10月间,读到一则新华社专电,题为《法国情报局长被叫倒好》,文风啰唆一点,但好在大约直接从外电译出,未多加工,有助于看到其中的脉络。为免断章取义之嫌,全文照抄如下:

法国国内情报总局局长贝尔纳·斯卡尔西尼因把间谍手法用于一名法国记者,(10月)17日受到初步指控。消息传开,法国多个反对党18日要求这名总统的密友下台“谢罪”。

斯卡尔西尼因涉嫌违反通信保密、非法搜集数据和违反记者消息源保密法三项罪名,17日受到初步指控。在法国司法体系中,初步指控是立案前的第一阶段,初步指控内容经调查人员后可变作正式指控,而后由检察机关提请法院立案。

去年,法国《世界报》一名记者爆出法国化妆品巨头欧莱雅女继承人利利亚纳·贝当古曾在2007年尼古拉·萨科齐竞选总统期间给萨科齐

竞选团队官员拎去成捆现金的报道。

而后,国内情报总局介入调查,斯卡尔西尼为了得知这名记者的消息源,直接获取了这名记者的移动电话通话记录。

消息传开,法国反对党按捺不住,问话斯卡尔西尼的直接上级、内政部长克洛德·盖昂。

“我十分惊讶,事态如此严重,内政部长居然到现在还不要求斯卡尔西尼辞职,”法国宪会党2012年总统竞选候选人弗朗索瓦·奥朗德18日说,“这种错误应当立即惩罚。”

绿党领导人埃娃·若利说:“这绝对难以置信,法国的情报主管居然对一名记者采用国家级间谍手段,这太过分了。”

但内政部长盖昂力保斯卡尔西尼。他说,初步指控不会影响斯卡尔西尼全面履行职责。

一些媒体判断,斯卡尔西尼是内政部长盖昂的红人,而盖昂又是萨科齐的密友。一旦斯卡尔西尼的事件发酵,可能影响萨科齐明年谋求连任的努力。

作为一个普通读者,既不了解法国的国情政情,更不了解情报工作的通例。仅据上述报道,我的印象是:一、在那里,获取普通公民(即便是讨厌的记者)的移动电话通话记录,也属于“国家级间谍手段”。二、即使贵为国家情报局局长,对普通公民使用“间谍手段”,也是违法的。三、这位局长采取这一违法手段用于他对一位记者的调查,因而涉嫌三项罪名,即违反通信保密,非法搜集数据,以及违犯记者消息源保密法。

我联想到去年英国曝光的默多克报业集团“窃听”案,又联想起多年前导致尼克松下台的“水门事件”丑闻。表明在那些崇尚“个人主义”的社会里,是很把公民个人的权利,包括通信的保密,以至向记者报料应受保护之类的事情当回事的。于是像法国发生的这样一件事,也就有了新闻价值。如果在那里,情报机关运用“间谍手段”对付一般老百姓(包括侵犯通信自由,非法搜集个人信息,以及追查新闻来源等),成为家常便饭,大家见怪不怪,也就属于符合常规的“狗咬人”,(新闻教学中有一个老笑话,说“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按指逸出常规的,即异常的现象,非常的、突发的事件,才构成新闻。)算不得新闻了。

既然这样的事情,在他们那里是罕见的,而

且又卷入围绕大选的党派之争,一定会有后续报道,例如“初步指控”阶段的工作完成后,检察机关是否已向法院提起公诉……可是,竟也像我们习惯了的,有些新闻提个头,就没有跟踪报道了。这件事间接涉及总统萨科齐,不过根据常识,总统先生不会公开地或秘密地指令新闻媒体煞车(他无权进行干预,如果他插手,那就是更大的丑闻,更严重的违法行为了)。那么,一种可能,按我们的思路,是说按正常的法律程序运作中,无须让读者跟着操心了,或是等有个最后结果再向读者报道;另一种可能,则是人家陆续有所报道,但我们的通讯社或报纸认为没有必要再向中国纸媒读者唠叨此事,也就让它淡出视野了。

不过,从这件事情也可以看出,有了在野党,有了记者的新闻自由,也确实让政府部门工作起来不那么顺畅,动不动就加以监督指摘,杂音喧哗,连关系到国家安全的情报部门的工作都要横插一杠子,真是影响效率不浅。难怪曾有人说过,权力这么分散,妨碍政府办事,还是一元化的高度统一集中的好。

总之,对他们那一套说好说坏的都有,倒还真是个问题。 (2012.01.10)

五十步与百步

前两天闲谈说起,上世纪50年代中期,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应邀访华,曾被请到一个国家级的会议上讲演。说是国家级,因为说到的两位听众都是全国首届人大代表。其中一位出身工农的代表,劳动模范吧,文化水平较低,根本听不明白台上说的是什么,但基于晋京开会的经验,知道只要是开会,台上有人讲话,台下的人就该鼓掌。没想到,这次是个例外。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人家有人家发言的自由,但作为经过选择的听众,则应站稳中国的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府的立场,从严掌握,不能轻易鼓掌。不知有没有内部布置,或许布置时疏漏了,没向我们说的这位同志打招呼。幸亏另一位代表,是一位负责同志,知识分子,恰好坐在他旁边,见他已经举起胳膊,即将大鼓其掌的时候,及时地出手拦住,避免了一次对“不该鼓掌”的话语鼓掌表态的失误。

这件实事,我是听后面说的这位同志讲的。怎么讲起此事,记不清了。但这位同志并没有讥笑工农代表的恶意,也没有夸耀自己眼疾手快的意思。应该是在说起人民代表的文化水平、政治素质有待提高时顺便举例的。我在许多年前写过一篇文章,还提到这件旧事。好像是说,什么代表啦、委员啦,不能光知道举手和鼓掌吧。

重提这个话头以后,我忽然想,这件事涉及的两位代表,由于出身、经历、教育程度不同,区别是明显的。前面那位工农代表,听不懂艾德礼在说什么,不仅是政治上对有关话题的陌生,而且可能头一次听这种有人翻译的讲话,等等。后一位同志没有这些障碍,完全听得懂台上人在说什么(从他的具体情况看,演讲人的英语他也至少是大体能够听懂的)。但他所优于那位工农同志的,其实也不过就只是知道,在某些情况下不宜鼓掌罢了。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在这次艾德礼讲话的场合,演讲人可能的确讲了一些彼时彼地不符合中国——中国共产党政治理念的内容。今天我们在里,无法进一步加以讨论,因为他到底谈了些什么,我们没有查当年的档案记载。也只能谈到这里为止。

然而,我们设想,在没有像艾德礼这样的“非(共产)党”外宾参与和讲话的场合,我们那位工农代表属于无条件的“鼓掌派”,可以无往而不利,只要鼓掌好了,不会错的。而我们这位知识分子老革命干部代表,不是也一样,只能放心随俗地鼓掌,做百分之百的“鼓掌派”,此外还有别的选择吗?

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两位前代表(他们都已故去,愿他们安息),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别。

至于谁是五十步,谁是百步,一下也说不清,看你从哪边开始数了。

我在这里,也像当年那位知识分子干部并无讥嘲工农代表一样,我也并无讥嘲这位知识分子老同志之意。相反,我很为此而感到悲哀,悲哀的对象包括我自己。 (2012.01.10)

大人之言

批评现在贫富差距加大的现象时,有人就

说,邓小平早在哪年哪月就说过,要防止两极分化。这个话,如果意在指出,某些当政者虽然口口声声讲邓小平理论,但对这理论中有针对性的关键论点,却在决策时忘得一干二净,那是不失一定意义的。

然而,像这样的话,其实在邓小平之前,民间也早就有人讲过,我指的是体制内的专家和一些关心改革的普通干部乃至一般群众。邓小平因其当时起主导作用,他的话的确影响更大,因此至今被人引用。不过这也仍可见大人物说话“一句顶一万句”的影子。

可悲的是,当时民间舆论提出过的同一问题,因属民间,人微言轻,根本听不进定向的耳朵。只有“邓大人”的话,一度引起过注意,有心人还记住了,若干年后拿出来说事。

尤其可悲的是,即使大人之言,实际上也当作耳旁风了,更何况一般人的民间舆论呢。

这就是决策者只听来自上面的话,而完全无视更广大范围的民间的,基层的呼声和反应,耳目闭塞,言路不通,就难免避免决策的失误。即如在这个案例上,这还不把根本只顾利益集团的私利而无视社会公平正义的主观动机估计在内。

而这种眼睛向上兼而耳朵向上的态度,其实也很容易造成的结局是,一方面助长了身处高位者的自以为是,武断自用;另一方面却导向了大人物身后“人(一)亡,政(便)息”。 (2012.02.27)

可有谁“立地成佛”?

小时候,外祖母信佛,但没听过她对家里人宣扬佛法。我最早记住的两句话,属于佛门教诲的,一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还有一句就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头一句好理解,后一句却不像字面上这么简单,因为我孤陋寡闻,不知哪一尊佛,过去曾经手持屠刀——光是手持屠刀还不算,还得动真格的,亲自操刀屠杀,这才能成为收起杀心、金盆洗手便可成佛的示范吧?但这放下的屠刀,究竟是指杀猪宰羊的刀呢,还是指杀戮黎民百姓的刀?

在这句话流传世间以前,有没有放下屠刀,立地而成的佛,先不去考据了;那么,有了这个警句箴言的唤醒以后,可有谁真的“放下屠刀,立地

成佛”了？

我假装入定，真心苦思，在我所知的近现代历史上，只见过把屠刀背到身后，满脸堆笑如佛面，甚至口口声声念阿弥陀佛的，其“放下”是假，“成”的自然也就不是真佛了。

冥冥之中，若有天启，从我的记忆深处，传来一声纶音：蒋经国，算不算一个？

蒋经国，我知其名久矣，但不管是江南先生为之丧生的那一本《蒋经国传》，还是大陆什么人写的，我都没有读过。他只是一位知名的陌生人罢了。许多大佬阔人，于我都是这么一种情况。我不是求知型的读者，而是审美型的读者，而传记我不仅要审其文笔之美，还要审其传主之美，因这一条，再加上时间有限，不少历史人物的传记，就被我排除到视野之外了。很抱歉！

不过，我对蒋经国先生的履历，还是略知一二。早年被乃父派到苏联留学，是在蒋介石已对苏联产生戒惧之心以后，显然不是送子取经或送子革命，而是狠下心让爱子当人质的吧，果然，年青的蒋经国在那里吃了不少的苦，从身体到精神。抗日战争中，回国到赣南，政声不错，虽然也传出了绯闻，我则以为不足诟病，倒正表明他既是一个务实之材，又不失为一个性情中人。

问题怕是出在1949年后，他也在那“最后一个冬天”，从大西南的旧日陪都飞往台湾去了。在宗法社会尚未脱胎干净的中国，“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乃是古老的传统。蒋介石在孤岛上开始倚重长子经国，这位并非纨绔子弟的公子，以其传统的“家国情怀”，行传统的生聚教训之事。我看过去一部台湾的纪录片，蒋经国穿着军便服，真的是筚路蓝缕，深入基层。这是电影里着力表现的他亲民爱民、艰苦卓绝的一面。电影里没有表现的另一面，就是他长期主持台湾的情治部门，从上世纪50年代起，在戒严的题目下，“辣手著文章”，其屠刀不但挥向了确系中国共产党从大陆派遣的情报人员，并多株连，同时也挥向了更普通国民，无辜百姓，这就是台湾之所谓“白色恐怖”。这个白色恐怖，固然是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的决策，而作为有力的执行者，蒋经国成为标志性的人物载入史册，自也不能辞其咎。

我所以不避啰唆，也不避我并不熟悉台岛情

况却强作解人之讥，就是要说，我以为蒋经国其人，也许可以算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典型，而且是在我们视野里唯一的一个。

我相信，大多数读者比我更清楚，蒋经国先生在他的晚年，特别是1987、1988年间，以其“总统”的身份，继在全岛宣布解除戒严之后，紧锣密鼓地开放党禁报禁，为台湾的民主化推动了第一步。

有人说，这是蒋经国知道不久于人世，为他的子孙着想，预为善后，意谓归根结底是一片私心，我以为不能说没有这样的成分，但不能低估蒋经国作为一位成熟的政治家审时度势的能力，他对历史潮流、国际条件和国内民意，乃有充分的了解和理解，才能下这样的决心，于公于私，殊为两利。而于公这一面，实在有千万的人沾丐其惠，影响所及，不仅在一岛，更不仅在一时，而是功在千秋的大事。

在这个意义上，说蒋经国以他自省与前瞻的明智和壮士断腕般的魄力，实现了多少年来人们只有悬想不见落实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应该不是虚谀。

世间的事，是须经过时间淘选的。从那时起，已经过了30年，台湾社会实践的发展变迁，证明了蒋经国在当时当地的选择是正确的，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2012.07.04)

小议“一句话”

据说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大概因为每一个历史事件的形成，每一个历史进程，都是由诸多条件恰逢其会地凑在一起，稍有差池，就是另一盘棋了。而在假设中，时间地点等条件必定已经变化，结果只能是一种虚构的玩笑，落得个“假设只算他假设”，“玩笑只当他玩笑”，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闲来无事，我忽然想做一个假设——假设1966年没有废除高考，只是延期到八九月红卫兵大串联之后举行，而且试题中有一道：“试用最简洁的话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我想，从第一批红卫兵到第n批红卫兵，都会跟标准答案取得一致。那些还没有资格加入红卫兵的，如果思想“紧跟”得上，也可能勉强及

格。而坚守原来的“本本”的孩子,就可能被认为答非所问,闹个零蛋。

那么,标准答案是什么?从那时过来的人,都知道,很简单,就是“造反有理”。因为这是刚刚传达到普天之下的,早年的“最高指示”,此前的选集里面没有,刚刚才从思想武库中解放出来飞遍天下的。曰: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是几乎不能再短的一句话,跟梁山泊杏黄旗上标榜的“替天行道”一样,只有四个字而已。

不要看轻这四个字的一句话,古时候就有这样的概括式修辞,叫做“一言以蔽之”,到了20世纪60年代,更出现了领袖言论“一句顶一万句”之说,金口玉言,何须多说!?

那年代时兴“讲用”,所谓讲用,就是对“毛著”的学习中(按:毛著即指“毛主席著作”,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出版了《毛泽东著作选读》上下二册,篇幅较郭沫若捧为“雄文四卷,为民立极”的《毛泽东选集》简化多了,这是学习领袖思想的捷径)提倡“活学活用,急用先学”,谁学得好,就请他到台上一五一十地讲,比如说遇到一个困难,百般难解,后来忽得天启,想起毛主席在“老三篇”里说过: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于是心血暗涌,立马感到浑身是劲,耳聰目明,点子也出来了,干劲也上来了,终于稳操胜券,皆大欢喜。讲用得最好的,则选为各级“学毛著积极分子”(全称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披红戴花拥到各地上台宣讲,享受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一般的荣誉和待遇,包括工作餐中管够的大碗红烧肉。

我今天这样说,可能当时与有荣焉的先进分子认为是把庄严的事情庸俗化,带有讥讽之意,其实我只是传达了当时先进分子们不屑于了解的广大落后分子们的注意所及和实际感受。就像今天有人津津有味地大怀文革之旧时,那些过去和现在的落后分子们的反应却是:“有病”或“怎么又来了”,如果不是更加“反动”的话。

回到四十多年前的语境,阐发这“造反有理”四字箴言,可以写成洋洋大观的成系统的“理论”,即在一开始的时候,清华红卫兵就写出了一论再论(似乎还有三论)“造反精神万岁”的鸿文。斗转星移,春秋代序,许多年过去了,当时起草这些檄文,论证领袖思想精粹的写手,也已从青春

进入中年,甚或已近老年。不知他们后来各个走了什么样的人生道路,有没有人继续沿着理论思维或文字功夫的窄路走下去,而或有了新的心得。在说到这些的时候,我的心情是沉重的,并不是轻松的,更不是轻浮刻薄的。

我只是想说,可以认为“造反有理”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但从思想谱系来说,这是从陈胜吴广到李自成洪秀全一脉,却不能概括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体系。

我不知道现在的高考中有没有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试题,如果有,是不是也都设了标准答案,而若依照1966年的思路大倡“造反有理”及相应的文革话语,能够得多少分。

据多年来的权威解释,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大多数人是先知有毛泽东思想后才知有马列主义的,既然除了少部分毛著积极分子以外,连毛泽东思想都还没学到手,那又怎么能知列宁主义为何物,马克思主义为何物?

只能相信毛泽东所说,马克思主义就是“造反有理”了。

而在我们这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历史条件下做出关于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来,抛弃了毛泽东发动文革所恃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就割断了“造反有理”论这一将文革和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的纽带。各级党校仍在开设马克思主义的课程,而且像位居要津的中国社科院,还把马列所扩充和升格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但好像没有看到什么新的研究成果。

也许学术研究领域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就是加大投入未必收获相应的产出。在当前国内一片对国运民命、前途走向的正式与非正式讨论当中,很少见到真正操马克思主义武器的学有根底的自称马克思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出来发言——我说发言,是指像样的发言,不是重复假大空的废话,也不是不做论证的武断之言,而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联系中国实际和世界实际的言论。却时见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在那里胡说八道,推销“造反有理”时期的种种说法和做法,为文革招魂,甚至为法西斯开路。

平凡的刽子手

○ 寿石

关于恶的解释,历来可谓千变万化。大多数平凡的人都对“恶”抱着一种脸谱化的印象,认为不管是政治上的恶人,还是生活当中的恶人,或者坏人,离自己都很远。故此对这种“恶”的实际概念便越来越模糊了。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认为,政治上的作恶者,一般说来是拥有坚定理念与信仰的“恶”,他并命名为“极端的恶”(Radical evil)。在当今的和平时期,人们与直接接触这种“极端之恶”的机会渐行渐远。取而代之的却是一种潜藏的社会之中的,不容易让人发觉的“恶”。所谓的不易察觉,并非指这种“恶”的拥有者只占少数,而是因为每个人的心中都隐藏着的“平庸的恶”(Banality evil)。

汉娜·阿伦特的定义

1962年,随着绞刑架的阵阵晃动,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在耶路撒冷被以色列审判庭处决。这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执行纳粹对于犹太人“最终方案”的刽子手,被审判庭宣布对至少300万无辜的死难者负责。然而,在整个犹太民族为之欢呼雀跃之时,有一位同席参加对艾希曼审判的女性犹太学者却抱有不同的看法。

这位犹太学者是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出生于德国的美籍犹太人。阿伦特早年曾师从于海德格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移居美国。她对艾希曼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以及他个人“恶”的本质进行了重新的定义,她认为,相较于“极端的恶”,艾希曼的作为更加“平庸”,即“平庸的恶”(Arendt, H(1963) “Eichmann in Jerusalem: Dilemma of Modern Ethics”)。阿伦特指出,艾希曼在“二战”期间所犯下的罪行,并非出于他个人偏好的意志,而是对于集权社会权力的服从。艾希曼作为一个“个体”而言,他仅仅是一位彬彬有礼的德国绅士;一位爱家庭的公务员;严谨而不失优雅的传统德国人。然而在集权社会中,他却是一位服从命令的官僚。就像艾希曼在接受审判时为自己的辩护一样——“一切都是服从命令”。

因此,阿伦特认为艾希曼仅仅是一个在集权体制下的服从者,而不是一个施予者。换言之,任何一个人处于艾希曼的位置都会做出与他相同的行为。就艾希曼本人而言,也是偶然间成为犹太人“最终方案”的执行者。他只是一个在极权社会下放弃了自主思考的个人,与大多数二战时期的德国人一样,他们对纳粹政府后期的执政没有抱有非议或反抗。这种“平庸的恶”表现在对于周遭恶行的漠视与放任了;对权威的盲目服

这些人,有的可能是参加过“造反有理”的往日豪杰,有的则是青年后生,并无亲历,却莫名其妙地心向往之,总之,有点像念念不忘前朝之盛的孤臣孽子、“遗老”“遗少”了,但又不同,近百年前辛亥革命后的所谓遗老遗少,往往是浸润于传统文化甚深的儒雅之士,而今日晃动在人们眼前的,如毛泽东所说的“申公豹”式人物,则多半既盲于传统文化,更盲于当代先进文化,既盲于博大精深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也盲于他们要当作安身立命之基的毛泽东思想。他们正是上

述“一句话”思维的奉行者,他们昧于知人,也昧于知己,昧于学理,也昧于政治:他们没想到或忘记了,按照这么“一句话”——“造反有理”引出的文革,红旗红歌红海洋,在蛊惑起千百万非理性的群氓式的运动后,一放难收,连毛泽东这样的铁腕人物都感到收拾残局之不尽如人意,那是会使倡导者玩火自焚,或陷入灭顶之灾的。我固不愿不幸而言中,但诸君莫谓言之不预也!

(2011年7月15日) ■

(责任编辑 徐庆全)

从。个体在集体中放弃了个人的善恶判断,从而造成了恶行。因此,阿伦特认为,艾希曼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符合其本国的法律以及所处社会常识的“正确”之事。当然,艾希曼或其他德国的之所以放弃思考,也正是因为他们处于一个极权社会的原因。在纳粹政府多年专制的“政治宣传”(Propaganda)以及高压政策的限制下,德国人已经缺失了“自主思考”的环境与权利。他们变得依赖党中央的决定,同时早年的“清洗”也让党内人人自危。出于对自己的保护,没有人敢质疑党中央的权威。也正是这种漠视的行为,造就了艾希曼“平庸的恶”。

其实,二战后德国人对历史的反思的轨迹,也基本上是阿伦特的思考和定义相吻合的。著名的例子是在德国风行的小说《朗读者》。故事很简单:15岁的少年米夏偶遇36岁的女列车售票员汉娜,演绎出一段恋情。汉娜最喜欢躺在米夏怀里听米夏为他读书,她总是沉浸在那朗朗的读书声中。忽然有一天,汉娜不告而别,米夏在短暂的迷惑和悲伤之后,开始了新的生活。二战虽然结束了,但德国对于纳粹战犯的审判还在继续。成为法律学校的实习生的米夏,在一次旁听对纳粹战犯的审判过程中,竟然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虽然已经事隔8年,但米夏还是一眼便认出那就是消失8年的汉娜。而这一次,她坐上了纳粹战犯审判法庭的被告席。

汉娜在二战中的作为逐渐清晰:她是集中营雇佣的一名女看守。当她受命拣选女囚犯,把她们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去受死时,她没有怀疑过、更没有挑战过这个命令的合理性;当关押数百犹太人的教堂起火,她考虑得更多的是“如何维持秩序、防止囚犯逃跑”,而不是开门救命。在她的观念里,那些受害者是犯人,死了固然可惜,放出来却更要不得!

《朗读者》将视野放在被裹挟进历史的普通人的故事,通过他们来让每个人都直面这样的拷问:是什么使一个普通女人,面对屠杀如此冷漠?是什么让她服从命令高于尊重人的生命?是什么使得一个在生活里能援助他人爱护他人、一个喜爱文学聆听朗诵的人变成法西斯手中好用的杀人工具?而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如果再来一个希特勒,你会不会是那个汉娜?

将《朗读者》搬上银幕的导演戴德利说:“并不是每个人天生都时刽子手,更多的人都不知不觉就参与到了罪恶之中,像汉娜一样,他们其实也是受害者,只是没有人关注他们而已。实际上他们往往付出了更为惨痛的代价。”

“平庸的恶”收获的却不是“平庸的痛”,而是生命的代价。

“电”醒全世界的米尔格纳姆教授

事实上,艾希曼只是作为“平庸的恶”其中之一的典型。这种“平庸的恶”存在于大大小小的社会环境之中。在早些时候的1961年,耶鲁大学的教授斯坦利·米尔格纳姆(Stanley Milgram)进行了其著名的“米尔格纳姆实验”(Milgram experiment)或又称为权力服从研究(Authority to Obedience Study)。米尔格纳姆教授在耶鲁大学招募了40名平凡的20岁至50岁不等,包含各类教育背景的志愿者来协助他的实验并扮演“老师”角色。这些“老师”被告知他们正在协助一个体罚对于学习效率作用的实验。这些志愿者“老师”们相信,在实验过程中,处于另一个教室的“学生”会回答事先准备好的问题。如果学生答错,“老师”则需要对学生施加一个从45伏特起跳的电击。每次学生答错,电击的强度也会随之提升。然而,“老师”们并不知道实际上扮演“学生”的志愿者都是米尔格纳姆教授的助手。他们在答错题目的时候并不是真的遭受电击,此次试验的目的也并非体罚对于学习效率的作用。而是在面对权威者下达违背良心的命令之时,人性所能发挥的拒绝力量究竟有多少(Milgram, S.(1963)."Behavioral Study of Obedience")。

扮演“老师”的志愿者并不知道“学生”们不会真的遭受电击。而40名“老师”志愿者中有65%(超过27名)施加了450伏特的最大电击数。而没有一名“老师”在电压达到300伏特以下坚持停止实验。人体能承受的安全电压不超过36至50伏特,300伏特以上的电压事实上会对人体造成巨大的危害可想而知。米尔格纳姆作为一个“权威者”而言,其影响力远远不如一个极权政府。但是“老师”们还是选择了服从这名不是很“威”的权威者。尽管一些“老师”在目睹

了“学生”们的惨叫和呻吟之后开始质疑这个实验的目的,并且一些教育背景较好的“老师”们怀疑起这个实验是否违反了基本的人权。然而,在他们得到了米尔格纳姆教授授意的“无需承担责任”的口头保障之后便继续进行实验。在电压超过300伏特时,曾有多名“老师”不断询问“学生”是否愿意终止实验。并且试图让米尔格纳姆教授的助手们申请停止实验。但是了解内情的助手们自然反对了“老师”的种种抗议。虽然“老师”们充满了怀疑和抗拒,但是40名“老师”实验者们没有一个真正的退出了实验。在实验结束以后,米尔格纳姆教授对于这个结果也感到非常震惊。原本教授对于实验的预测为:“仅仅10%至1%的人会真的狠下心来将电压增加到450伏特。”可是结果却与预测大为不同。因此,米尔格纳姆教授才会感慨道:“在完成这个实验之后,我认为汉娜·阿伦特关于“平凡的恶”的理论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接近真相。”

体制下的全民“艾希曼”现象

最初米尔格纳姆教授做这个实验的目的也跟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审判有关。米尔格纳姆设计这个实验也是为了测试艾希曼以及其他参与惨无人道的犹太人屠杀的纳粹支持者,是真的泯灭良心或者仅仅是服从党中央的命令呢?不幸的是,实验证明了一个平凡的成人如何服从权威以及愿意做出何种程度的行为(Milgram, Stanley.(1974),Obedience to Authority; An Experimental View Harpercollins)。

阿伦特的理论与米尔格纳姆的实验交相辉映,共同解释了人性对于权威的抗性之弱,而这种弱小便形成了“平庸的恶”。人性在面对极权或权威之时,其“冷漠”与“盲目”令人胆寒。但这种“恶”更加的可怕之处在于它普遍存在于每个人的心里。这种社会问题在极权体制中更加突出明显。因为极权体制势必伴随着大量极权的权威出现。权威的绝对会否定反对的意见与声音,从而稳固权威本身的地位。久而久之,生活在极权体制下的人们便被剥夺了自己的意志和反对的意志。阿伦特也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论述道,极权体制中的人们最大的不幸在于他们

失去了行动的自由以及拥有意见的权利。

因为上述原因,极权主义体制下的平凡人们会跟随极权主义体制本身的道德的多伦而沦丧自己的人性,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的道德危机。米尔格纳姆实验发现了每个人都有成为“艾希曼”的潜质。在极权体制下的人们都在循序渐进的成为“艾希曼”(《极权主义的起源》汉娜·阿伦特著林骧华译)。无论国家官僚与平凡市民,在面对极权时权威几乎毫无抵抗能力。他们早已放弃了自己意见,以“服从”为自己开脱。依赖权威者本身,即使有不合理的因素,也被归结于“帮助”、“维护”、“为了”大义。所谓大义正是极权主义者灌输的理念。而一旦这种权威消失,如1945年纳粹政府消亡。如艾希曼一类的平庸的加害者就会进入一种代理状态。即将自己视为他人意志的延伸,或把自己看作执行他人的意志。无论是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或是参与米尔格纳姆实验的志愿者,他们都否认酷刑来源于自己的意志。

由此观之,在极权主义下的加害者们更像发动机中一个个的齿轮,在前后左右都拥有相同齿轮的转动下,自己也不得不随之转动。

从根本而言,“平庸的恶”的始作俑者正是体制和社会结构本身。单一的极权主义会让这种盲目的服从增多,反之在多元权威下这种盲目便消失了。社会结构决定了个体在其中的思考环境,或者是否有思考环境。人们在反思“恶”的平庸性的同时,应该注意到环境是如何孕育这种“平庸的恶”。这种恶的可怕之处在于必须加以预防。“极端的恶”如同洪水猛兽,可以通过直接手段加以解决或制裁。而当“平庸的恶”大肆泛滥之时,势必是社会结构与环境已经病入膏肓、不可救药。“平庸的恶”如同癌症一般,一旦罹患便难以根治。人们不能依赖人类最后的道德底线和事后的补偿来解决这样的事情。因此,人类在反思历史时,对于某个时期的恶行,决不能忽略社会体制本身对平凡人的影响。如同《朗读者》中所说,“每个人的心中其实都有一个魔鬼”。■

(责任编辑 萧 徐)

父亲陈企霞百年祭

○ 陈恭怀

今年10月20日,是父亲陈企霞百年诞辰纪念日,他离开我们也已经整整25个年头了。

25年来,我对他的思念非但没有减弱,反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加深。作为儿子,我经常留意报纸杂志上有关他的文字。逐渐逐渐,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几乎所有的官方文字,包括各类中国现当代的文学史、党史、国史,甚至连英国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都把当年轰动整个文艺界的“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案给一笔抹杀得干干净净,不留一丝痕迹了。

但是,真实存在过的歷史是不应该被人忘记的!

父亲陈企霞,作为当年“丁陈反党集团”的直接受害者,单凭他不屈的抗争精神,也是不应该被人忘记的。

记得1979年春夏之交,我在遥远的浙南山区,收到妹妹陈武强寄来的父亲平反结论的手抄件。捧着这份迟到二十年的公正裁决,我只看了一遍,就不禁号啕大哭起来了。

一切都是命运!命运!命运不禁几乎蹉跎了父亲一生的大好年华,还耽误了我们一家人的整整一百四十岁!

可是父亲却不这样认为,他给我回信说:

这样一个结局的到来,我认为,说快是够快的(我那些年考虑到我自己可能看不到,不是写过“谁能知身后”那样的诗句吗?),说慢也真慢得可怕,照你的说法:全家虚度了一百四十岁。但虚度两个字是十分不确切的。我尤其不喜欢你谈到命运那几句话,没有命运,绝对没有。“命运”是自己掌握的,如果你不能掌握,那只是在人和社会关系中,人自己多少还很“盲目”罢了。不要哭,不要笑,而要理解。让你我大家都再努力吧!

1955年,在共和国历史上应该是一个很值得重视和思考的年代。刚刚建立没几年的新中国,却发生了两件震撼人心、影响深远的大事,而且都是在文艺界:一个在党外,一个在党内;一个

公开的,一个是内部的;一个是明的,一个是暗的。那就是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和所谓的“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案。两案牵涉之广,株连之众,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少有的。据我的初步了解,决不会少于千人。

“丁陈”一案,开始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范围,有名有姓的也只有丁玲、陈企霞、李又然三个人。紧接其后的所谓“反右”运动,却连冯雪峰、艾青、舒群、罗烽、白朗也裹挟进去,再后来,中宣部的李之琏、黎辛、张海、崔毅也都“难逃法网”。而他们的同事、亲属,甚至企霞的学生,如唐因、黎白、白石、徐孔、徐光耀、李兴华、鲁芝……也都席卷株连。

历史证明,这两个案子都是无中生有的大冤案,它的实际发动者和操盘手,就是当时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这是整肃知识分子风暴前的不祥之兆,预示着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的严冬即将到来。从此,真话日渐消弭,谎言、奉承之风日盛,国人的道德风尚开始败坏。

“胡”案,众所周知,最高领导人亲自撰写的“按语”,为它铁板钉钉,成为当时绝对不可逆转的“铁案”。

“丁陈”案,开始似乎是羞羞答答,在“党内”搞了近两年定不下案,甚至到1957年夏还有了某种转机。但整风反右一来,它马上由暗及明,由党内而党外而全国。而最后为此案定下调子的,仍旧是那个最高领导人(见《炎黄春秋》2013年第3期刊纲:《毛泽东与〈文艺报·再批判〉》一文)。其言辞之厉,定性之高,都是无与伦比的。

依我之见,父亲作为“丁陈”一案中的“陈”,实在是天大的冤枉。《文艺报》挨批,自应有主编“丁”顶着,周扬和“丁”历史上有一种难以厘清的纠结,矛盾由来已久,迟早总会爆发,本来不干“陈”什么事。只是由于“陈”在编辑部实际主事,为《文艺报》的创办呕了那么多心血,付出了那么多精力。大棒子一来,污泥浊水迎头泼来,他当

然受不了,当然要据理直争。他以一种堂·吉诃德的精神,奋起反抗。他是主动迎上去,“自投罗网”的,是在代人受过。

批斗“丁陈”的斗争,如果从1954年批判《文艺报》的《〈红楼梦〉研究》事件开始,到1957年8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头条新闻《文艺界反右斗争的重大进展,攻破丁玲陈企霞集团》,先后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大大小小会议几十次,参与人数起码也上了万。期间作协领导违背国法和党章的基本原则,利用非法手段,通过非正常渠道,还“逮捕”并囚禁了企霞九个多月。为了从最易突破的缺口置企霞于死地,刘白羽专门带了一批人马,南下调查当年企霞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被捕坐牢的情况。他们对有关人员威逼利诱,企图获取虚假伪证,只可惜没有找到任何有利于他们的证据。

我们从企霞上世纪30年代晨更工学团的同事,和企霞一起被捕并坐牢的老战友柴川若的回忆中,看到企霞是如何坚贞不屈、英勇而灵活地与敌斗争的:在同牢难友中,他遭受的毒打最多,遍体鳞伤,夜不能寐。但他始终没有在敌人面前透露任何线索,而是利用放风和上厕所的时间鼓励难友与敌人巧妙周旋。那时,他只是刚刚入党一年多的新党员,但已经坚定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在《血的旗帜》这篇作品中,他塑造的为理想用自己的鲜血染红革命大旗的形象,就是他自己真实写照。

坚定的信念,不屈的意志,顽强的抗争,这就是父亲留给我们的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国民党的监狱里,那是面对敌人,可以怒目金刚,横眉冷对。可是,解放后的政治运动,面对自己同志的无端指责,无中生有的非难,却是百口莫辩。如果大家平心静气,争论讲理,自由民主,有什么问题讲不清楚呢?可是,领导头头们自认为真理在手,不容置辩。只有他们的话语权,没有你的申辩机会。只允许你认罪,不允许你讲理。

这种整肃自己同志的模式,是从延安整风以后逐渐形成的。开始是学习,用固定的思想模式作为认定真理的标准,每个人首先用这个标准往自己身上

套,挖思想,作检查。检查不力者被人抓住把柄,群起而攻之,身败名裂;侥幸过关者,一个个灰头土脸,垂头丧气。同时整人者和被整者也明白了一条真理:只有狠下心来整人,自己才有可能解脱,才有可能变被动为主动。这是延安时期在整肃王实味时,就出现的类似以后的“批斗”形式。此后,一直延续到“文革”时期,此招运用更是得心应手,把十来亿人玩弄于股掌之中,终于导致了全国和整个民族的巨大灾难。

父亲严于律己,严格要求,但从不张扬,一切从大局出发。第一次文代大会期间,他忙里忙外,把工作搞得很有头绪。工作受到有关部门的好评,事后周扬想调父亲去他那里当秘书长,父亲不去。那年周扬要出国参加会议,说手头没有东西能拿出手。企霞说,这好办,我在《北方文化》当了多年的编辑,稿子都是现成的。于是编了本《解放区作品选》,周扬署上了自己的名字顺利地参加了大会。而它的实际编者企霞却无人知晓……丁玲要办文学研究所,请企霞帮她筹划,企霞写了大纲、规划和详尽的请示报告。一切准备就绪,丁玲要他去文研所工作时,他谢绝了。

第一届茅盾文学奖评审时期,企霞是实际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和召集人。他刚刚从历史的重负中解放出来,再次燃起了工作的激情,只因其几部作品有不同看法,为了对作品和作者负责,他熬夜把这些数百万字的作品又读了一遍,



1980年代,陈企霞(左二)和小女陈幼京(左四,已去世)和唐达成夫妇在一起。

我和林希翎的交往

○ 卢 弘

林希翎在巴黎辞世已经三年多了。在她逝前不久,即2009年9月中旬,我自北京给她打电话,说国内的朋友都想念她,希望她再回来,与大家欢聚相见,她却打断我说,我回不来了,走不了啦!几天后就走了。

她逝后世界各地都举行了对她的追思会,在她“成名之地”北京,直到她故去个把月后,才由百多位生前友好,其中有的还是从外地特地赶到的,对她作了声泪俱下的悼念追思。她逝前曾关照,如国内也对她进行悼念,要通知我参加,因此我也作了简短发言。我说在今天的追思会上,我可能是仅有的一个不是“右派”、但从不以曾是“左派”为荣的人,相反正是在当年“反右”时,开始知道了她的大名,同时对她深深地敬佩、敬重和敬仰,从此默默地关注着她,悬念着她,不断探寻她的动向与去向,为她的遭遇叹惜,为她一直活着惊叹,更为她的终于出狱、出境和出国而庆幸。到她1994年以“法籍华人”身份首次回国,才有幸认识了她,曾与她多次深谈,不断交往交流,成了她在国内的友人之一,她曾几次并且长住我家,我曾陪同她参加一些社会活动,还帮她呈递过致上层的信函等等。只是我为她写的关

累出了一场大病。

这次茅盾文学奖评出后,评审人员的名单出来,那些没有参加任何工作的“大作家”、“名人”占据了显赫的位置,而企霞只排在一个很不显眼的普通的工作人员之列。家人为他抱不平,他只淡淡一笑,丝毫不以为然。

对他来说,类似这样的事太多了。

他曾给好几个领导当过秘书,秘书最接近首长,也最容易得到提拔。但他以革命事业为重,只知道埋头工作,不会讨好卖乖,自己有什么意见建议,不管领导是否合意,都大胆提出。领导

于她的往事,在国内却无处发表,逼得我自编自印自行以“内部参考”方式发表并发行了。

第一次见到她,我就建议并鼓励她,抓紧写下她的经历,这是中国现代史上很重要的一页,对于我国及其后人,都是一笔精神财富,为此我曾鼓动一位正在法国又在国内学过历史的年轻人,又把她推荐给英籍华人女作家张戎,请他们帮助她去完成自己的回忆录或传记,可惜我的这些努力,都未获得成功,其中主要原因,却都在她自己。

2001年,我赴法旅游,找到她,她送我一部法国人写她的法文传记,我带回国一再找人翻译出版,却都因为她从人到书都是“烫手山芋”,无人敢接受而未办成。如今竟有了一本中国同胞自己写的记述她一生的书:《大右派林希翎——她的政治命运和情感世界》,作者黄子琴不仅是她当年在“人大”的同班同学,更一直与她交往,同她及其母亲、孩子都有深交,又互相住过对方的家,尤其是在林晚年时,作者特地去她在巴黎的家,长住了3个月,听她亲口诉述自己的经历,看了她的文稿、信函和笔记、日记等各种史料、资料,从而对她有了系统全面与确切的了解认知,正是受了她本人及其母亲、儿子的嘱托,才

的意见,他如果有不同看法,也常常毫不避讳地当面提出,甚至和领导发生争论。那时的文艺界,企霞的“抗上”是有了名的,这也是他不被某些领导看好的原因。

我心目中的父亲,只是为了争得自己一点点小小的话语权、申辩权,便被打成了“臭名昭著”的“大右派”。历史就是这样奇谲、怪诞,给人们开了这么个让人笑不起来的惨烈的“大玩笑”!

百年了。我们永远怀念你,精神永存的好爸爸! ■

(责任编辑 萧 徐)

有了这部传记大书。我一拿到就如见知交似的十分欣喜,连忙打开并从头拜读,边读边感到心头一块“石头”总算落地了,这一位“历史名人”,终于留下了自己的“印迹”!

从书前作者简介中得知,黄子琴女士与我同龄,都是1931年出生的,不过她笔下的林希翎,从她早年到其晚年,都贯穿并充满了她特有的战斗精神与青春活力,只觉得一个活生生且从不安静的女斗士,又站到了我们面前。作者和林希翎一样,原是学法律的,却凭着自己几十年来对她的熟知深交,按照亲历亲见亲闻和所感所思,尤其是林本人为其提供的第一手资料,经过多年的求索梳理与考查考证,以朴实无华的文字,如实记述了一个真切的林希翎,不仅以此为她“树碑立传”了,更使她从此获得了“再生”甚至“永生”。

就在林希翎逝后,她在北京的一批友人,想为她与林昭、张志新三位当代“圣女”,共建一座纪念碑,已由雕塑家为她们创作了塑像,原拟设在北大或人大校园内,却得不到批准,又打算在郊区公墓买一块地,将她们三人合葬与此并立碑为记,也被官方制止,退而改在“798”艺术区展示一下,以告慰逝者并告知人们,同样不被允许。最后只得在雕塑家住处房前几平方米的小院内,将其塑像陈列公示。

一个人成了历史人物,后人就可以也应该对他或她进行从头分析甚至剖析,我看对林希翎也应如此。黄女士在书中曾写到,林最初到巴黎时,曾与法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中心约定,几年之内写出她的自传性回忆录,法国人看中的也是她独特经历的历史价值。但是多少年过去了,她一个字也没写出,后来只有一位法国人玛丽为



1977年,林希翎(中)与友人留影

她写的法文传记,她自己不仅不满意,还与作者闹翻了。法国的中国研究中心因她失约,解除了她的职务,停发了她的工资,使她从生活到生命,都遇到了困难并受到了威胁。她到底因为什么会是这样,这就不得不来考察她的一生,我发现她几十年来所经受的坎坷、磨难和不幸,既是政治的、社会的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特色”造成的,又是她自己的性格使然,即性格决定命运。其中不仅有她本人的心理因素,也有她特有的应属生理的因素,而这实际是一种病态,我们应该将她作为一个“病人”,来观察研究和分析,这才能对她作出较为正确和准确的评定与结论。

据了解在医学的精神病科中,有一种病叫“躁狂症”,其初期症状与常人基本无异,只比正常人表现得急躁和易冲动,常常控制不住自己,不能制怒说发火就发火,却又并不自知。林希翎也是这样,她的思想、语言和行动,都过于“信马由缰”不受节制了,结果却是该干的没干,反而耽误了应干的正事。

若以此回顾林希翎一生,她的一切遭遇,不都是她过于率性所为才造成的吗?她说自己如同童话《皇帝的新衣》中的三岁小男孩,大声说出皇上大人正光着屁股,一下揭破了这个世纪谎言,但也将自己卷入是非之中,她的口无遮拦,触犯了损害了许多人的利益,使他们群起而上对其反击反攻,1957年她为了帮助党整风,坦言定胡风为“反革命集团”,没有法律根据也不合法律程序;中共在国内正实行的并非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而是专制性的封建社会主义;特别是她要把第一个揭破斯大林神话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公之于众,这都犯了“天条”,从此遭受厄运。

后来在改正“右派”和平反“反革命罪”时，竟要负责落实政策者首先向她赔礼道歉，当然也都事与愿违，得到了相反的结果。此后她去台湾、赴美国也都是见谁说谁，稍有不满立即批评，这就到处树敌得罪了人。有人劝她不妨对国民党骂骂共产党，到国外就说说“民运人士”好话，她就会到处受欢迎了，她却迅即回话，那我不成个“政治娼妓”了吗？坚持自己的直话直说我行我素，也就到处不受欢迎，她却不以为错。当年“人大”老校长吴玉章，曾语重心长地告诫她，人不可说假话，得看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和对什么人，该说的才说，不然效果必然适得其反。看来林希翎并未以此为戒，这才造成了自己的一生悲剧命运。

对她的率性所言我有亲身感受，2003年她在京时，我陪她去看牙医，偶然说出她是从法国回来的，医院错将她当成洋人大款，最后竟要她付几万元诊疗费，她不给也罢却怒斥我道，你是不是拿了回扣，才同人家合伙来敲诈我？此言不仅将我“好心当成驴肝肺”，更使我一时哭笑不得，幸而我深知她的性格，只得忍辱向院方解释了，求其对她开恩减价，对方了解实情后，才看在我的面上说，她能出多少就多少吧，只收了几千元，其实是赔了本，等于为她作了义务服务，事后她对谁也没说一个“谢”字，看来她对别人也如此，从黄子琴书中看到，她不断与人先友好后反目，从政见不同到观点有别，以致仅仅是看法有异，也是说翻脸就翻脸，甚至包括自己挚爱至亲的父母双亲和丈夫、儿子等等，竟作出与其生父断绝关系的过激行动；她有一位友人和我一样，也指出她的行为属于病态，招致她的痛恨，幸而我当她面从未说过她有此病，又因能作忍让和谅解她，才与她保持了终生之谊。黄子琴女士显然也是因此，才取得了她完全信任，受其重托写了这部大作。

从黄子琴笔下知道，林希翎的情感世界也不安定，年轻时曾是一法国影星的“粉丝”，后来到法国遇到个也叫此名的洋人，竟与那人过从过密，以致把那人的家当作自家，反而闹得并不愉快。她在“人大”时已与胡耀邦的秘书相恋，未能成婚却双双都成“右派”，15年牢狱后出来当年，又被同厂技术员爱上，她为了反击监狱长要她“断子绝孙”，毅然与其结婚并且连生二子，这下

后继有人了，却因夫妇二人思想及生活差距太大，她又根本不会也不惯于居家过日子，婆家又因有了这么个儿媳妇，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丈夫儿子更深受其害，最后只得在去香港后协议离婚了事。她在到香港去台湾时，又与一个“无名氏”作家过从过密，一度也谈婚论嫁了，只是后来也不欢而散。她有位校友、难友也钟情于她，托我为之牵线搭桥，她曾让儿子住过他家，自己回国后也相互接触过，但后来也不了了之。她明明是与胡耀邦的秘书相恋过，但她晚年非说自己与胡本人有什么“忘年恋”，党内正有人攻击胡与她有“暧昧关系”，她竟主动为人提供口实。

世人常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林希翎当然不是完人，但她怎么说也是个好人，是个正直、善良、豪爽、热情、顽强、坚定之人，可惜她生不逢时，正如她的忘年好友胡耀邦所言：“像林希翎那样，过早地卷入政治斗争是不利的。当有人拦路时，她只顾与指路的人吵架斗争，忘却了继续前进的目标。”（引自《大右派林希翎》前言）看来他也为她深深惋惜，她卷入政治太早太深也太久了，几乎将自己的一生都消耗在“吵架斗争”中了，结果恰恰忘了以致丢失应有的目标。

不论她是否完人或只是个好人，都留待后人和历史去研究评定吧，我只想说她和林昭、张志新等一样，都已在中国现代历史特别是政治思想史上，留下了她们浓墨重彩又闪光的几页，正是她们这几位学友、战友和难友，为了追求和维护真理，奋不顾身并坚持到底，以致遭受了极大地苦痛摧残，林昭、张志新等都被惨杀了，林希翎却侥幸又不幸地活了下来，实际上承受了更长久的精神折磨，却又始终矢志不移，她们都不愧为现代的圣女，同时又是中国政治祭坛上的牺牲者，都如鲁迅所说，“我以我血荐轩辕”了。林希翎虽未流血，却比林昭、张志新等流了更多的泪，并且直到她生命终结，虽然竭尽全力搏斗一生，却没过上一天自己追求向往的好日子，只充当了一场又一场人间悲剧的女主角，并且从上世纪50年代到新世纪当代，是几十年下不了台的“主演”，因此也成了“名角”，这就为历史留下了永远的叹惜，更有不尽的思索和探究，如何才能不再上演这种惨痛的时代悲剧！■

（责任编辑 萧徐）

古装传统戏:《讲话》前后的延安主流艺术

○ 王克明

现在通常认为,在延安整风和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前,延安文艺界的主流艺术是“大洋古”,它们充满或曰统治了延安舞台;《讲话》之后,文艺界主流的表演形式改成了小秧歌剧。查阅史料可知,真实情况不是这样的。

一、只有传统古装戏曲长期统治延安舞台

“大洋古”是说大戏、洋戏、古戏。大戏是指抗战期间国统区剧作名家的“与抗战无关”的多幕话剧作品,洋戏是指外国名家的艺术经典话剧作品。1940年、1941年和1942年《讲话》之前的几个月,延安共上演了6部大戏、7部洋戏,占那期间全部71部话剧演出的18%。这说明,《讲话》之前,延安不是大戏、洋戏统治舞台。那么古戏呢?

古戏是指中国传统古装戏曲。从史料可知,1940年开始,延安的大戏、洋戏的演出,远不如古装传统戏曲演出的剧目和场次数量。无论是在整风和《讲话》之前,还是在那之后,古戏都是延安舞台上最活跃的剧种,是延安最受欢迎的主流艺术。应该说明,小秧歌剧一度成为群众性的主流业余宣传表演形式,但没有成为文艺界的主流专业艺术表演形式。从延安整体的情况看,现在的统计不支持大戏、洋戏充满延安舞台的说法,但若说古戏统治延安舞台,并不为过。那时,这种传统艺术不在毛泽东的批评范围内,一直得到他和延安各界上上下下的欣赏与支持。可是至今,“大洋古”中,只有几部大戏和洋戏被用于批评。至于古戏,七十年来语焉不详。

延安时期中共系统的文艺社团演出传统古



延安平剧研究院在窑洞前排古装戏

装戏,是从1940年开始的。那之前,因为各单位都没有戏装行头,没办法演,鲁艺甚至曾尝试穿现代服装演传统戏。包括毛泽东在内,中共干部们只能看民间戏班子演的古装戏。为了在延安发展古装传统京剧,1939年,毛泽东、王明、博古、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捐出他们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月薪近两千大洋,为鲁艺采购了成套衣盔杂把戏装行头,用三辆马车从西安拉回延安,才改变了无法演传统戏的情况。1940年元旦,延安首次演出古装传统京剧《法门寺》,毛泽东连看四场。同时,他建议演出的话剧《日出》,他自己只看了一场。由此略知他偏爱古装传统戏。

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建议、推动、鼓励、资助下,延安文艺进入了最繁荣阶段,大戏、洋戏登上延安舞台,同时开始了大规模的古装传统京戏演出,之后有四年几乎没演过京剧现代戏。直到整风运动结束后的1943年11月,延安平剧研究院发动“新剧本创作运动”,四天突击创作了17个剧本,内容除了没有反映抗战的,包括了河南

难民、边区防奸、移民、生产、丰衣足食和保卫边区等现实题材。剧院从中选排了两个京剧现代戏。之后,康生批评平剧院演现代戏妨碍了演员的技术提高,剧院就再没人敢搞现代戏了。那以后到1948年,延安上演过其他单位搞的4个京剧现代戏,而古装戏的演出剧目是其几十倍。

据现有史料,1940年到1948年,中共系统社团单位共演出古装传统京剧200种、新编古装京剧35种、古装地方戏15种,共计250种。同期那些年,其他艺术表演与古装戏曲演出相比较:多幕、独幕话剧共128种,为古装戏的51%;戏曲现代戏27种,为11%;音乐歌舞活报剧等共64种,为26%。把它们加在一起,也不如古装戏曲多。1940年以前,延安的主流艺术曾是话剧,不过那时还没演大戏和洋戏。1940年以后,古装戏曲成为主流艺术,不但剧目多,而且场次多,一直最受欢迎,长期统治舞台。

二、《讲话》之前古装戏曲演出最多

阿甲前辈曾回忆道:“当时在延安除话剧、歌剧、音乐、舞蹈外,京剧是常见的戏剧形式。如送赴前线,欢迎归来,动员生产、结业典礼、招待来宾、纪念节日,少不了要演京戏。我们也要报酬,每一次演出以小米若干担计算,还要供给一顿吃得不错的饭食。我们也在新市场卖票演出,以满足市民的文化娱乐。”

因为北京当时叫北平,京剧那时便叫平剧。不完全统计,从1940年初到整风和《讲话》之前,

演出过传统京戏的社团单位有:鲁艺戏剧系、鲁艺旧剧研究班、鲁艺平剧团、军委平剧团、战斗平剧社、延安业余平剧团、陕甘宁边区保安剧团、抗大总校文工团、后勤政治部、医科大学。演新编古装京剧的单位有:鲁艺戏剧社、抗大、战斗平剧社。延安地方并不大,那时候有这么多的团体演出京剧,说明京剧非常受各阶层民众欢迎,并得到了当时文化界的普遍肯定和鼓励。

根据文字记载,《讲话》前两年多时间里,以鲁艺领衔演出的折子或全本古装传统京剧,至少有剧目56种:一捧雪、一箭仇、二堂舍子、十三妹、三堂会审、女起解、风波亭、六月雪、乌龙院、乌盆记、击鼓骂曹、甘露寺、古城会、龙凤呈祥、平贵别窑、打渔杀家、四进士、四郎探母、白水滩、白马坡、扫松下书、杀驿、宇宙锋、花木兰、连环套、连升店、坐楼杀惜、汾河湾、武家坡、奇双会、斩经堂、岳母刺字、闹江州、法门寺、宝莲灯、审头刺汤、空城计、草船借箭、查头关、战蒲关、虹霓关、独木关、将相和、举鼎观画、浔阳楼、贺后骂殿、捉放曹、铁弓缘、胭脂虎、黄金台、黄鹤楼、梅龙镇、得意缘、断臂说书、鸿鸾禧、群英会。同期上演过6个新编古装京剧:亡宋鉴、吴三桂、陆文龙、荡家恨、梁红玉、嵩山星火。

与开始整风同时,1942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集中几个京剧组织,组建更加专业、阵容强大的延安平剧研究院,安排康生暂任院长,直属中央,为在延安进一步发展京剧创造有利条件。建院不久演出已很多。8月15日起,为加强延安在整风期间的文娱活动,除平日演出外,每逢星期

六晚,平剧院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演出一次古装传统京剧,首次演出的是:一匹布、长坂坡、辕门射戟。1942年9月柯仲平《献给我们的平剧院》文中说:“在延安,给干部和一部分群众演剧,演得最多的是我们的平剧院。”他说



延安平剧研究院在延安演出传统剧目《辕门射戟》剧照

话剧演出“要花比较多的钱”，而延安“经济太困难”，所以“平剧院特别辛苦、特别忙”。

三、《讲话》之后古装戏曲得中央支持更成主流

1942年10月10日延安平剧研究院补开成立大会，改受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领导（1944年又改受中央党校领导），连续五天演出古装传统戏，招待延安各界人士，剧目有：女起解、甘露寺、武家坡、珠帘寨、断臂说书、翠屏山。同时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办普及推广京剧文化的展览会，展品有：京剧脸谱，戏装，演出剧照，场面、练功和化妆的照片，戏装和化妆程序的说明，有关京剧的书籍、刊物，各种有关戏曲的统计图表，中国戏剧舞台演进模型等等。整风期间，中共中央支持这些演出和这个展览。

由于中共中央重视京（平）剧，延安出现一个现象，即一些单位纷纷成立平剧研究会，排演传统京戏，如中央党校、马列研究院、延安大学、女子大学、行政学院、军事学院、西北党校、陕北公学、医科大学、学生疗养院、中央医院、和平医院、解放日报社、后勤政治部、中央警备团、三五九旅、边区保卫团、边区法院、边区银行、南区大众俱乐部、八路军印刷厂、安塞皮革厂等。为此，延安平剧研究院专门设立平剧指导科，定期派出人员，对各单位的平剧研究会进行业务指导，受到了欢迎。那阶段，延安业余演出传统京剧近五十个剧目。

《讲话》之后的延安后期，演出古装传统京剧的单位有：延安平剧研究院、抗大总校文工团、战力剧社、“战卫部”、西北党校、延安大学。各单位平剧小组多有演出，但记载零星。演出新编古装京剧的有：延安平剧研究院、中央党校、西北党校、延安大学。

从文字记载看，《讲话》之后，1942年下半年到1947年，以延安平剧研究院领衔，中共系统排演了大量古装京剧。不完全统计，与《讲话》前上演不重复的传统剧目有119个：一匹布、十八扯、丁甲山、九龙山、九江口、三法宝、三娘教子、大名府、大登殿、上天台、小过年、小放牛、马前泼水、天水关、长坂坡、反南阳、反西凉、反徐州、文昭

关、巴骆和、打严嵩、打花鼓、打棍出箱、打城隍、打面缸、打刀、史可法守扬州、白门楼、失街亭、让徐州、老黄请医、托兆碰碑、当锏卖马、回荆州、伐子都、华容道、杀四门、刘唐下书、问樵闹府、米注山、阳平关、收姜维、走麦城、走雪山、赤壁鏖兵、花蝴蝶、芦花荡、李逵夺鱼、两将军、坐寨盗马、辛安驿、状元谱、完璧归赵、纺棉花、青石山、柜中缘、斩马谡、罗成叫关、贩马记、钓金龟、牧虎关、鱼藏剑、鱼腹山、定计化缘、定军山、荥阳关、查关、拾玉镯、战樊城、战太平、战长沙、战冀州、战濮阳、战宛城、背凳、界牌关、疯僧扫秦、洪羊洞、逃国、珠帘寨、荷珠配、真假李逵、柴桑关、恶虎村、党人碑、哭灵牌、铁公鸡、借东风、拿高登、拳打镇关西、粉妆楼、扈家庄、通天犀、桑园会、黄逼宫、乾坤带、硃痕记、探寒窑、铡美案、盗宗卷、清风山、清风亭、清风寨、清官册、喜荣归、董家山、落马湖、雁翅关、搜孤救孤、御碑亭、路遥知马力、嘉兴府、辕门斩子、辕门射戟、翠屏山、瞎子逛灯、薛仁贵、穆天王、穆柯寨。还有17个新编古装京剧：十一郎、三打祝家庄、中山狼、瓦岗山、孔雀胆、卢俊义、红巾起义、进长安、武松、虎符、岳飞、河伯娶妇、孟姜女、屈原、战北原、高渐离、逼上梁山。

由于古装戏在延安兴盛，后期，民众剧团、保卫团、边区保安处剧团、绥德文工团、大众剧院、关中分区八一剧团等地方戏演出社团和单位，以及延安大学、行政学院，还在延安演出过秦腔、郿鄠、晋剧等一些古装的地方戏，其中不与京剧重复的有15个剧目：人心归向、三滴血、大报仇、小姑贤、正气图、石达开、苏武牧羊、状元桥、张琏卖布、河神娶妻、洪承畴、梅花岭、游龟山、镇台念书、鞭打督邮。

1948年，陕甘宁晋绥军区平剧院设在收复后的延安。由于吸收了一些从北京跑出来不久的“富连成”科班高徒，剧院演出力量更强，艺术水平也更高。这个剧院能演出的与前几年延安上演不重复的剧目有25个：八蜡庙、九龙杯、刀劈三关、三岔口、五人义、凤还巢、水帘洞、打龙袍、打焦赞、打孟良、失印救火、时迁偷鸡、夜明珠、审李七、春秋配、钟馗嫁妹、首阳山、烧战船、盗双钩、雁翎甲、遇皇后、普球山、樊江关、醉打山门、霸王别姬。晋绥军区平剧院还演出了12个新编古装京剧：丹梁桥、古庙钟声、平地风波、北京四



延安平剧研究院在延安演出传统剧目《三堂会审》剧照

十天、刘六刘七、红娘子、两锭银子、武大之死、殊途同归、猎虎记、赖虎记、窦尔墩。

古装戏演出剧目,《讲话》前年平均27.5个,《讲话》后年均31.3个,后期是前期的114%。

四、秧歌剧未曾取代古装戏曲的主流艺术地位

《讲话》过后,话剧舞台艺术变得萧条,一种场地围观的非舞台宣传表演形式——小秧歌剧,兴盛一时。这种变化被称为“革命文艺运动”。1943年到1948年,各种专业文艺团体在延安一共表演了118个小秧歌剧。同期,专业文艺团体在延安演出的古装戏是176种,其中传统京戏142种、新编古装京剧25种、古装地方戏9种。文艺团体演出古装戏的数量是表演秧歌剧的1.5倍。

秧歌剧的广场活动多在冬季农闲、春节期间进行,古装戏的演出却长年持续。那几年,仅延安平剧研究院就上演了多于135个古装戏剧目,演出共约1200场,观众约200万人次。因此,延安时期,秧歌剧不曾取代古装戏曲的主流艺术地位。

整风和《讲话》在延安文艺界刮起了政治风暴,但没冲击传统的戏曲艺术。即使在新秧歌运动大张旗鼓的时候,古装的京剧传统戏依然不断上演。1943年冬延安平剧研究院赴安塞、子长、延川、延长四县乡下为农民演出传统戏和秧歌剧67场,传统戏有:巴骆和、古城会、打渔杀家、四进士、清风寨、鸿鸾禧、嘉兴府。毛泽东有一套41册集录传统戏的书《戏考》,送给了平剧院,并

把传统戏唱片借给他们听赏学唱。在当年条件下,平剧院之所以能在《讲话》过后演出大量传统戏,从毛泽东支持的书和唱片里获益匪浅。延安的重要晚会,多演出古戏,中共领导总来观看。如以《群英会》招待张治中先生,毛泽东指定以《古城会》招待重庆记者等。中共“七大”会议期间,延安平剧研究院为大会演出剧目最多,如:大登殿、古城会、四郎探母、失街亭、斩马谡、法门寺、空城计、群英

会。日本投降后鲁艺与延安大批人被调往东北,中组部部长安子文告知平剧院:“毛泽东同志不走,你们不能走,毛泽东同志去哪里,你们就去哪里。”1947年毛泽东转战陕北驻米脂杨家沟期间,专门调陕甘宁晋绥军区平剧院,从山西兴县过黄河,行军三夜去为中央演出传统戏,剧目包括:长坂坡、杀四门、芦花荡、连环套、审头刺汤、春秋配、战马超、恶虎村、鸿鸾禧、盗御马、盗双钩、樊江关、霸王别姬。到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中央调原延安平剧研究院赴西柏坡演出古装戏,已知有:凤还巢、孔雀东南飞、白水滩、春秋配、群英会。

早在五四运动时期,激进者曾主张把京剧“全数扫尽,尽情推翻”。但1942年10月10日延安平剧研究院《致全国文艺界书》说:“过去有些人在理论观念上,曾经把平剧根本否定过……然而,在人民大众的心目中,在老百姓的实际生活里,在抗战部队革命干部的观感上,都没有把平剧否定掉。相反的,直到今天,广大群众对平剧的要求非常强烈,革命干部对平剧的兴趣,尤为浓厚。”其实这是传统京剧能在延安保持主流艺术地位的文化原因。

五、把传统古装戏改造为宣传工具的努力未获成功

毛泽东那时候不冷落古装传统戏曲,而是在推动整风的同时,推动发展古装戏。其原因,有他自己对色彩斑斓的古装戏的娱乐审美需求。

延安平剧研究院对外演出传统戏时,要求去除糟粕,但单给中央领导演的可以都保留,因为“他们不会中毒”。如曾在杨家岭小礼堂按旧本原样儿演过皇帝戏娶妇女的《梅龙镇》和杨家将故事《托兆碰碑》。对后者的鬼戏,毛泽东说:“上个把子鬼,没有关系嘛。”他的目的是娱乐。

此外,重要的是,比较起他想消除的来自苏联那些“比狗屎还不如的教条”的影响,和西方传入的话剧形式所承载的启蒙精神,传统戏里表现的专制、依附、忠君等传统政治文化价值,和忠孝节义等传统道德文化观念,更容易使用于他对现实的解释。1941年他谈到平剧院演的《独木关》时说,把薛仁贵的赫赫战功都记在何忠宪头上很不公平。八路军就是屡建战功的薛仁贵,是真的“白袍小将”,国民党军队就是通敌窃功、陷害忠良的张士贵、何忠宪,是假的“白袍小将”,真假两个“白袍小将”就是真假两种抗战。

毛泽东曾想把传统戏也当做“组织群众和教育群众的一个武器”来使用。所谓“武器”,即宣传工具。早在1938年,毛泽东在观看旧戏班子演的秦腔古装传统戏《升官图》、《二进宫》、《五典坡》后曾指出:“男女老少把剧场拥挤得满满的,群众非常欢迎这种形式。群众喜欢的形式,我们应该搞。就是内容太旧了。如果加进抗日内容,那就成了革命的戏了。”但是,传统戏不可能为了宣传动员而加进抗日内容,那该成了关公战秦琼了。

为把古装传统戏改造为宣传工具,毛泽东强调“旧剧革命”。1944年1月他观看《逼上梁山》后在《给杨绍萱齐燕铭的信》里说:“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其实,戏曲史的真实,不是像他说的这样。数百年来,旧戏舞台上,角色各种各样,受冤屈百姓,遭报应贪官,民间故事和人物数不胜数。而且,舞台上是艺术,历史中是过程,无关乎“颠倒”和“恢复”的话题。要求传统戏曲政治正确,是阶级斗争观念极端化的表现。毛泽东在延安多次观看阿甲主演的传统京剧《四进士》,提出强化剧中田伦、顾谈等人贪赃枉法、残害人民和田氏阴谋毒辣的表演。这种对旧剧的阶级斗争主题改造,目的是动员观众的仇恨心理,使传

统戏曲艺术发挥宣传鼓动作用。新编古装戏也有这种目的,1944年《逼上梁山》出版前言介绍该剧语言说:“能恰当地把感情与思想传达给观众,引起观众对现实的愤恨。”

对传统戏曲服务于政治的问题,在延安出现过不同意见。1943年4月阿甲曾撰文,强调“研究平剧,研究它的完整性,是我们必要的态度”,认为“平剧服务政治……在技术上却是有条件的”,主张“利用旧形式把它的艺术性提高到和政治现实充分结合的境界”。他的这些认识和主张被指为不服务于政治、对旧剧改革怠工等,遭到了批评。从那时起,《讲话》确立的政治第一原则开始向传统戏曲贯彻。1943年4月19日延安平剧研究院会议决定,对演出过的旧剧本进行审查和修改。而被审查的那些旧剧本,可能已经传承数百年了。那时人们开始用政治标准看待传统戏,如认为《四郎探母》违反抗战利益,《铁公鸡》和《连环套》拥护封建统治、仇视人民。

但是古装戏毕竟是传统故事、传统主题、传统艺术,对它的革命改造,和使它成为与小秧歌剧一样的宣传工具的努力,注定不会成功。直到“文革”前,毛泽东趋向建设类似政教合一的社会,支持江青以“政治第一”的标准,搞非正常宗教性文艺,使戏曲彻底“武器”化、宣传品化。他们选择京剧现代戏作为主要武器和洗脑工具,使得曾在《讲话》之后萧条数年的话剧,在“文革”期间又消失多年。而根本无法进行革命改造的古装戏,“文革”时终于遭遇了灭顶之灾。

古装戏曲在《讲话》前后始终是延安的主流艺术,且在《讲话》后得以更大发展,但把它们变为宣传工具的努力未获成功——这些史实不符合持续宣传的“革命文艺运动”的革命性,更无法以古装戏曲代表“延安文艺”,因此数十年来,延安时期的古装戏曲情况一直被回避和屏蔽。2012年间,恭谨抄写《讲话》纪念其发表七十周年时,毛泽东钦定成立的延安平剧研究院,也逢建院七十周年纪念日,却未见提及。屏蔽延安主流艺术的历史事实,遮掩古装传统戏主流地位的历史真相,有利于巩固“大洋古”的负面性,有利于强调对文化艺术工作者进行思想改造的正面性,有利于装扮“革命文艺运动”的神圣性。■

(责任编辑 萧 徐)

亚纳耶夫的“最后一搏”

○ 朱 正

《捍卫苏联的最后一搏》一书,副标题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反对戈尔巴乔夫”,讲的是1991年8月19日到21日苏联发生的那一次失败了的政变。作者亚纳耶夫,戈尔巴乔夫当苏联总统的时候,他是副总统,二把手;在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时候,他下令宣布:戈尔巴乔夫“因健康原因”,“不能履行苏联总统职权”,现在由他亚纳耶夫“行使苏联总统职权”(第7页),成了一把手。政变失败后被捕,1994年2月,俄罗斯国家杜马对参加政变的人实行大赦获释。这是一本为自己作辩解的书。

亚纳耶夫的政治态度

这本书的书名有一点自相矛盾。书中说:戈尔巴乔夫“内心不希望把苏联弄垮。无论人们怎么议论他,这个倒霉总统还是想保留自己的‘王冠’,用尽最后的力气把权力抓住。”(第71页)事情当然是这样,他当苏联总统的前提是苏联必须存在,一旦苏联不存在了,他这个苏联总统也当不成了。他当然要用尽最后的力气维持苏联的存在。现在你反对的是一个最不愿意苏联垮台的人,怎么能把这事说成是“捍卫苏联”的举动呢?事实是,这次政变给戈尔巴乔夫的政敌叶利钦帮了大忙,使他在政治斗争中大大得分,几个月之后,他和白俄罗斯以及乌克兰的领导人一起,宣告了苏联历史的终结,当然也同时宣告了戈尔巴乔夫苏联总统任务的终结。由此看来,把这次政变称为“葬送苏联的最后一着”,也许更符合实际情况一些吧。

亚纳耶夫的政治态度,书中表明,他不但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也反对赫鲁晓夫的改革,反对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揭露和批评。书中说,赫鲁晓夫“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上宣读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中,其‘主要内容’

基本上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品行进行攻击。根据赫鲁晓夫的看法,这些品行是苏联国家的主要灾难。由极端的个人动机所决定的赫鲁晓夫反科学、非常庸俗的论述与公开的臆造掺杂起来……对斯大林和我国苏维埃历史极尽诽谤之能事。”(第106页)亚纳耶夫当然知道:“也不可能绕开所谓的斯大林镇压的问题。”不绕开,怎样去面对呢?他的逻辑是这样:虽然“在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实施的‘大清洗’和其他‘活动’中,毫无疑问有无辜受害的人。”但是,“在一个直到现在都处在前所未见的敌对势力包围的国家里,还有全球性的军事对抗就在门口,严格说来,所有这些现象毫不奇怪,而且是完全合乎规律的。”(第115页)亚纳耶夫还告诉他的读者们:那些参加过对德作战的老战士们,并不关心斯大林镇压了多少人,“他们依然怀着崇敬的心情对待苏联唯一的大元帅。”(第132页)

掩盖卡廷惨案

关于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关系,亚纳耶夫这本书只说到了波兰一国。斯大林对于波兰人民的贡献,书中列举了三条:“第一,它体现在把波兰领土从希特勒分子手中解放出来,为此苏联将士付出了60万人死亡的代价,实际上是把波兰人从被纳粹分子彻底消灭的计划中拯救出来了。第二,保留——准确地说是复兴波兰作为单独的国家,1945年以斯大林为团长的苏联代表团在波茨坦坚持了这一点。第三,扩大了以‘波兰’为名的重新建立的国家的领土,把什切青和东普鲁士的其他城市和土地并入其国家。”(第130页)这三件事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和结束以后的事情。第一件事,说的是1944-1945年苏军进攻德军占领下的波兰,进而进攻德国本土,进攻柏林的战争。大约是在波兰战场上阵亡了60

万兵员吧。可是,苏军在1944-1945年攻入波兰之前,1939年也有过一次攻入波兰的军事行动,你怎么就不说了呢?

1939年9月1日,德军突然攻入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现在人们已经知道,在一星期以前,德苏两国已经在莫斯科签订了瓜分波兰的秘密协定,划分了各自占领的地盘。如果没有这个秘密协定,希特勒未必会在9月1日发动进攻。这样说来,“二战”是希特勒和斯大林联手发动的。

德军以闪电战攻入波兰,进展神速,就一再催促苏军早日出动,苏军却总是迟迟其行。并不是因为准备军事行动有什么困难,而是一时找不到一个可以欺骗世界舆论的口实。阿诺德·托因比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以下简称《二战史》)第3卷“轴心国的初期胜利”对此有简略的记载:

俄国人想借口德国威胁在波兰的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作为他们干涉的动机,这种主意德国政府自然是不喜欢的。……莫洛托夫承认,“苏联政府提出的理由,含有刺激德国人感情的口气”,但是他要求,“鉴于苏联政府的困难处境”,德国人不要对这一点小事介意,苏联政府“不幸实在看不出有可能找到其他任何理由,因为苏联以前从来没有为它居住在波兰的少数民族同胞的困境操过心,目前的干涉,对外界总得找个借口,以言之成理。”(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47-48页)

找到了“理由”,师出有名,就可以开始军事行动了。《二战史》接着说:

9月17日清晨,俄国以大批装备精良的部队开始侵入波兰,几乎不曾遇到什么抵抗,在一个星期之内挺进了大约一百五十英里——差不多到了寇松线。驻在东部各省的波军在9月的第三周中溃不成军,俄国人的进攻完全出乎波军的意外。俄国人散发的传单上印有德军进攻范围的地图,以涣散波军的士气,入侵者还造谣说,他们是来打德国人,而不是来打波兰人。(前引书,第52页)

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库利克1939年9月21日向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报告前线状况说:“1. 红军转入进攻时,波兰军队士气一落千丈。除边防部队、民团和总司令部领导的撤退部

队所进行的零星抵抗外,红军几乎没遭遇任何抵抗。2. 俘获大量普通士兵和军官。……4. 大部分居民情绪高昂地迎接红军。但在大城市中,特别是斯坦尼斯拉沃夫,知识分子和商人对红军的态度比较冷淡。5. 在与罗马尼亚接壤的扎列希基市乡获了一家银行,其中有没运走的部分贵重物品和纸币。在那里还缴获了一辆准备开往罗马尼亚的装满钱的汽车。……7. 由于我们推进速度快,所以除几座小桥外,铁路网桥梁都没被破坏。……”(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9卷,第137-138页,本书以下简称《苏联档案》)

苏军的进军如此顺利,第一个原因是波兰正在以全部力量抵抗从西线入侵的德军,还有一个原因是波兰方面没有把苏军看作敌军。波兰利沃夫城防部队司令西科尔斯基准将1939年10月20日在俘虏营写给苏军乌克兰方面军司令员铁木辛哥的申辩信中说:“您肯定相信,我们彻底履行了我们作为士兵的天职,与德国侵略者进行了斗争,同时,我们也以相应的形式执行了波兰最



苏联解体后,乌克兰基辅一军事学校的士兵将列宁纪念馆中的戈尔巴乔夫肖像摘下。(1992年1月23日新华社发)



莫斯科新辟的伊兹马伊诺瓦自由市场,戈尔巴乔夫及其他原苏联领导人的滑稽木制头像在市场上到处有售。(新华社记者高秋福 摄)

高统帅部的命令,没有把红军看成是作战的对方。”(《苏联档案》第19卷,第186页)波军没有把苏军看成作战的对方,苏军却是把波军看成是作战的对方的。俘虏了数以万计的高、中、低级军官,包括将军,几个月之后,他们就在卡廷森林被秘密处决了。

这件事一直不为人们所知。1941年6月22日德国进攻苏联。7月6日德军攻占斯摩棱斯克。1943年4月13日德国人宣布:在斯摩棱斯克附近卡廷森林中发现大片波兰军官的坟墓,共找到4443具尸体。从此卡廷屠杀案就为世人所知。苏联方面却一直抵赖,说这些人是德国人在占领斯摩棱斯克期间杀害的,甚至后来还在那里立碑,说这是“1941年盖世太保杀害的波兰军官之墓”。直到1989年苏联才承认了凶手是苏联内务部。后来叶利钦、普京都以俄罗斯总统的身份为此事向波兰道歉。

可是亚纳耶夫决心把抵赖坚持到底。他在书中说,一部名叫《卡廷》的电视片是“臆造”,“与纳粹的说法完全一致”(第130页)。不过他稍微作了一点让步:如果说苏联处死了波兰人,那也是该死的罪犯。他的说法是:“我们要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身处苏联领土的波兰人里,也有一些人对苏联公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可能,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把他们处了死刑。”(第131页)这个说法能够成立吗?他们是俘虏,被集

中关押在俘虏营里,有武装看守把他们和苏联公民隔离开来,他们有什么可能“对苏联公民犯下滔天罪行”呢?而且不是少数几个人,而是成千成万人!

这本书中还说,关于这卡廷案件,“戈尔巴乔夫分子‘历史学家’伪造的那些‘文件’从政府的特别档案中‘失踪’了”。(第131页)我不知道“失踪”了的伪造文件是些什么。但是我知道沈志华主编的《苏联档案》第19卷有一个“苏联进军波兰与卡廷事件”专辑(第99—398页),整整300个页码,共

收档案89件。现在中国的普通读者都很容易看到了,担任过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副总统的亚纳耶夫,如果愿意调阅,应该是随时可以办到的,不知道他是不是看到过。

档案材料确凿证明:此事与德国盖世太保完全无关。甚至不能把责任归之于苏联内务部,内务部是执行联共(布)中央的决定,即斯大林本人的决定,他们不过是刑场上行刑的刽子手罢了。亚纳耶夫花了那么多笔墨为卡廷事件辩解,自欺则可,欺人的目的却没有能够达到,真是枉费心机了。这种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成见、偏见来曲说历史,颠倒是非,这书的价值也就不必评论了。

史料价值比较可疑

亚纳耶夫作为8月19日事件的重要角色,他写的回忆录,对于人们研究苏联存在时期的这最后一个重大事件总是有点史料意义吧。如果拿其他亲历者的回忆录来对照,他这书的史料价值就有一点可疑了。这里只讲一件事。当他们已经把戈尔巴乔夫软禁在克里米亚的时候,派了总统办公室主任波尔金(一译博尔金)、苏共中央书记奥·舍宁、国防部副部长瓦·瓦列尼科夫等人飞到克里米亚,找戈尔巴乔夫谈话,要求他认可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作为。当然遭到了戈尔巴乔夫的拒绝。亚纳耶夫的书中写道:

当听到代表团到福罗斯觐见他的消息并通报很快将实行紧急状态时,他开始怒火中烧,开始骂娘和吼叫。实际上没有任何类似的行为。戈尔巴乔夫马上提出两个问题:谁派你们来的,逮捕叶利钦了吗?如果逮捕了叶利钦并向戈尔巴乔夫通报这个消息,一切会是另外的样子。(第23页)

照这个说法,戈尔巴乔夫到了这个时候还在念念不忘收拾自己的政敌!可惜这又是曲说。戈尔巴乔夫的“文胆”、总统助理阿·切尔尼雅耶夫(他曾协助戈氏完成他的名著《改革与新思维》),这时正随戈尔巴乔夫一同被软禁。后来他在《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一书中记下了那一次“觐见”第二天的一件事情:

当我第二天早晨进到别墅的小楼时,我很长时间找不到人问戈尔巴乔夫在哪里。最后是他的外孙女娜斯佳跑到我跟前,把我领到了楼上。戈尔巴乔夫躺在床上,正在便条本上写着什么。我在他旁边坐下,开始大骂那帮无耻之徒。他用忧郁的眼光看着我说:“是的,结局可能会很糟。但是你听我说,在这种场合我相信叶利钦。他不会对它们屈服,不会对它们让步。不过那时候就会要流血。昨天我曾问他们叶利钦在什么地方,一个人回答说‘已经逮捕’,另一人纠正说‘将要逮捕’。”(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578-579页)

原来戈尔巴乔夫是在关心叶利钦的安危!和这一伙人斗争,他知道现在只能寄希望于叶利钦了。而叶利钦也真像他希望的那样,为粉碎这一场政变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从这一例也可以看出亚纳耶夫的判断与实际情况距离有多远。

亚纳耶夫的书中还讲到一件与他本人有关的事情:

他们请求我临时承担起国家元首的职责,起初我坚决予以拒绝……当时瓦列里·伊万诺维奇·波尔金从福罗斯回来,他用慢吞吞的哲人般口吻宣布:“好吧,根纳季·伊万诺维奇(亚纳耶夫),我们不得不在你不参加的情况下行动。明天我们将会遭到逮捕,这近乎百分之百。”

随后,再没有人说服我。我拿起钢笔签署了关于建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所有文件。(第74-75页)

这一次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同事们敦劝亚纳

耶夫出来领导的聚会,在瓦·博尔金的回忆录《戈尔巴乔夫沉浮录》里有详细记载。记下了许多人的谈话,可是其中既没有什么人敦劝亚纳耶夫的话,也没有他自己说的促使亚纳耶夫最后下决心的那句至关重要的话。他那篇“现场记录”有好几千字(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15页),请恕我不转录了。难道博尔金写书的时候忘记自己说过这句起了重要作用的话吗?亚纳耶夫已经不在人世,也无从去问他了。

亚纳耶夫态度鲜明的拥护斯大林,反对赫鲁晓夫,反对戈尔巴乔夫,反对改革。像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的卡廷事件,还要强为之辩。这些都足以说明他这本书的倾向了。可是在中国,有人愿意翻译介绍这本书,有出版社愿意出版这本书,据译者说,还“得到一些读者的好评”(译者序第6页)。这就给人们提供了一个信息:亚纳耶夫的见解在中国还颇有市场。这倒是一个不能不重视的问题。■

(责任编辑 萧徐)

社科人文 文学小说 党建管理 经济管理 书画摄影

正规出书 约稿通知

书稿内容:(一)社科人文类书稿:回忆录、自传或人物传记、年鉴、社科著作等;(二)管理类书稿:党建管理、行政管理、经济、金融或企业管理等研究专著;(三)文学类书稿:散文、诗歌、杂文、时评、游记、通讯等;(四)小说类书稿:历史、当代、言情、武侠、反腐等长篇、中短篇小说;(五)美术类:画册、书法作品集、摄影作品等。

书稿要求:书稿(作品)内容健康,艺术性强,底蕴丰厚,文笔流畅。字数为6-8万字以上,个人专著、多人合集均可,公开发表或未公开发表均可。

出版发行办法:以丛书形式或独立书号形式出版,以畅销书或合作出版方式运作;达到畅销书要求的,签订标准出版合同,按版税或买断方式支付稿酬;根据作品和作者意愿,面向国内或海外公开发行。其中国内公开发行的,由专业权威出版社出版,国家标准书号,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备案查询。

全国免费投稿热线:400-680-8368

投稿地址:北京朝阳区八里庄东里3号654信箱

综合编辑部收;邮编:100025

电话:010-57733087、57192223、57733086、57192229

传真:010-89506878;在线投稿:bookbj@126.com

联系人:高晶、牛萍萍、文馨、顾娜(编辑)

新书欣赏、订购,请登录:<http://www.bookhk.net>

北京东方朝阳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书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费

图书介绍

思痛录	韦君宜	35.00	7.00	
陈独秀全传	唐宝林	128.00	11.00	
斯大林的战争	杰弗里·罗伯茨	69.00	10.00	
国史札记(人物篇)	林蕴晖	40.00	7.00	
国史札记(事件篇)	林蕴晖	40.00	7.00	
国史札记(史论篇)	林蕴晖	38.00	7.00	
昨天的中国	袁伟时	42.00	7.00	
我的朝鲜战争 一个志愿军战俘的自述	张泽石	23.50	6.00	
1949 我不在清华园	张泽石	23.00	6.00	
回忆与研究(上下)	李维汉	75.00	12.00	
蒋介石的1949:从下野到再起	刘维开	48.00	8.00	
蒋介石与国共合战:1945-1949	蒋永敬	48.00	8.00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戴煌	49.00	8.00	
难忘的非常岁月	陈瑞生	26.00	7.00	
启蒙与中国社会转型	资中筠	29.00	7.00	
雾霭 俄罗斯百年忧思录(内部发行)[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	陶菊隐	280.00	12.00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上、中、下)	秦晖	148.00	18.00	
共同的底线	[美]安妮·阿普尔鲍姆	48.00	8.00	
古拉格:一部历史	傅高义	78.00	9.00	
邓小平时代	汉斯·莫德罗	88.00	12.00	
我眼中的改革	莫德罗	45.00	8.00	
亲历苏联解体:二十年后的回忆与反思	李慎明主编	59.00	9.00	
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年的中国	沈志华	58.00	9.00	
逃向苍天:极端年代里小人物的命运沉浮	雷颐	32.00	7.00	
观念的水位	刘瑜	36.00	7.00	
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	孙越生	35.00	7.00	
决战:毛泽东、蒋介石是如何看待三大战役的	金冲及	32.00	7.00	
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	陈铁健	黄道炫	48.00	8.00
蒋介石石上台湾岛(1949-1953)	李庆	根志优	58.00	9.00
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		金雁	68.00	10.00
苏东剧变之后:对119个问题的思考	陆南泉	左凤荣等	246.00	20.00
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走出中国转型的困境		萧功秦	48.00	8.00
金正日与朝鲜		高秋福	36.00	6.00
陈布雷与陈伯达——历史转折点上的两个“秀才”		张希贤	56.00	8.00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		沈志华	148.00	18.00
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		赵诚	38.00	6.00
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	托洛茨基著	施用勤译	58.00	8.00
敬畏民意:中国的民主治理与政治改革		俞可平	45.00	7.00
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		李锐著	29.50	7.00
苏北利亚		于疆	22.00	6.00
《转折》《起点》:亲历中国改革开放	吴思	李晨主编	72.00	12.00
亲历记(一)(二)		吴思主编	58.00	11.00
天下得失 蒋介石的人生		汪朝光等	42.00	6.00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	119.00	12.00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	150.00	12.00	
国家记忆(一)		章东磐	98.00	10.00
国家记忆(二)	章东磐 晏欢	戈叔亚	88.00	9.00
可操作的民主	寇延丁	袁天鹏	28.00	7.00
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		杨奎松	48.00	8.00
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	萧冬连、谢春涛等著	88.00	10.00	
读史求实		杨奎松	38.00	7.00
历史的碎片:侧击辛亥		张鸣	26.00	7.00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共四卷)		金冲及	128.00	12.00
绝密档案背后的传奇(全七册)	北京电视台卫视频道《档案》栏目组编		216.00	26.00
母亲杨沫		老鬼	45.00	6.00
血色黄昏		老鬼	39.00	6.00
血与铁		老鬼	39.00	6.00
烈火中的青春:69位兵团烈士寻访纪实		老鬼	38.00	6.00
1911-1912 亲历中国革命	埃德温·J·丁格尔	36.00	7.00	
亲历民主 我在美国竞选议员		龚小夏	28.00	6.00
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		史景迁	19.60	6.00
李锐反左文选		李锐	22.80	6.00
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		杨继绳	42.00	7.00
通往立宪之路	刘刚	李冬君	60.00	8.00
1943 一盆红红的火(谢韬日记选编)	戴茂林、赵晓光	谢韬	49.00	8.00
高岗传		杨奎松	59.00	7.00
西路军——河西浴血、生死档案、天山风云		冯亚光	126.00	12.00
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陆南泉	黄宗良等	246.00	20.00
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		雷颐	29.80	7.00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杨奎松	88.00	10.00
底层的叩问——肖复兴人生笔记		肖复兴	25.00	6.00
地狱门前——与李真刑前对话实录(内部发行)		乔云华	58.00	8.00
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	49.00	8.00	
苏共亡党十年祭	黄苇町	26.00	7.00	
三野名将	吴东峰	28.00	7.00	
四野名将	吴东峰	28.00	7.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I	杨天石	60.00	8.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II	杨天石	38.00	6.00	
“中间地带”的革命	杨奎松	54.00	9.00	
烙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体记忆	林贤治主编	38.00	7.00	
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朱正	26.00	7.00	
走出个人崇拜	冯建辉	16.50	5.00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薄一波	88.00	11.00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	沈宝祥	39.80	8.00	
夹边沟记事	杨显惠	34.00	7.00	
定西孤儿院纪事	杨显惠	25.00	7.00	

《思痛录》 这是一本说真话的书。作者痛定思痛,用知识分子的良知来记述她所经历的时代。回忆是真诚的,反思也是深刻的,以新的视角,给人们启发和教益。文章以深刻反思和强烈的批判意识,表现出作者愤怒、痛苦、懊悔、自省的复杂情感,当愤慨地谈到那场荒谬的“反右”运动:“盲目的、毫无法律根据的‘中央精神’,随时变化的‘领导意图’,就可以随便支配几十万人乃至几亿人的命运”。作者当时已痛悔自己走错了人生道路,错误地加入共产党、投奔延安,“如果在一九二九的时候我知道是这样,我是不会来的”。“参加革命之后,竟使我时时面临是否还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的选择。这使我对于‘革命’的伤心远过于为个人命运的伤心。我悲痛失望,同时下决心不这样干,情愿同罪,断不卖友”。她以理解和同情的态度谈到民主党派中那些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如储安平、章乃器、罗隆基等人时说:“他们参加政协,“哪里晓得只有吃饭和鼓掌的权利?”……

作者追述往事,也反省自己,痛恨自己被党性所迫,在“反右运动”中“也干了些违背良心”的事,“写过违心之论的文章”,这些沉痛真言,是对荒谬年代里人情世态和政治风云、民族悲哀的剖析,直面惨痛历史,勇敢的暴露黑暗,思考和总结我们的历史。显示出一个有头脑、有个性的知识分子所具备的真诚品格。

韦君宜女士感叹:“这是一部血泪凝成的历史”。

《陈独秀全传》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以及中共早期领导人的陈独秀,在中国曾创造过辉煌的历史。但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1929年11月中央政治局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因他转向托派而被开除出党,之后又被扣上: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托陈取消派、反苏、反共产主义、反党、反革命、汉奸、叛徒等多项罪名。如果独立思考和以科学的态度对陈独秀一生的思想和活动重新考察,这些所谓的“罪名”均不成立,除了“汉奸”罪名是完全诬陷外,有的则属于权力掌握者的“理论解释权”(成王败寇)的产物,有的则是把革命阵营中的不同意见“妖魔化”的结果。在正义的立场上,此为中共党史上的最大冤假错案。

本书充分运用大量第一手资料,详尽梳理了陈独秀一生思想发展的脉络,他与共产国际、中国托派、民主党派和国民党的复杂多变和纠结的历史关系,以全新的观点和视角对陈独秀有一个重新评价!

《斯大林的战争》 在20世纪,约瑟夫·斯大林的残忍与有罪的名声,恐怕只有阿道夫·希特勒可与之相比。在斯大林生命的最后20年,苏联对他的个人崇拜曾登峰造极,称他是这个苏维埃国家的伟大舵手,而且还是人民之父,当代的列宁。然而他去世的三年后即1956年,苏联新的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就痛斥个人崇拜对共产主义原则的歪曲,将斯大林描绘成一个暴君:他处死自己的同志,大批杀害自己的军事指挥官。斯大林对自己数百万公民的死亡负有责任,在苏联农业强制集体化期间,农民被流放或饿死;在追查“人民的敌人”期间,党和国家的官员遭到清洗……

本书在揭露斯大林是一个冷酷、实行高压统治的独裁者的时候,也对他作为战争领袖的作用给予了客观的评价,但这不是为斯大林恢复名誉,而是通过有据可依的叙述使人们注意到他的历史作用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100045 收款人:北京炎黄春秋杂志社

(注: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10%付邮费)

炎黄春秋QQ在线:2368298257



全国免长途话费咨询
400-668-0650

愿人人都有作品传世

北京天禾佳诚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是国内一家从事图书合作出版的文化公司，公司成立以来与多家出版社建立了密切业务关系。

代理出版：

个人出书：诗歌、散文、小说、生平专记、学术著作等。
老人出书：回忆录、自传、诗词、散文、思想理论著作、书画图册等。
家庭出书：家庭照片画册、家史档案、家谱族谱、先辈遗文、家族音像等。
学生出书：优秀作文集、书画作品集、学生纪念集、孩子成长图册等。
学校出书：教学经验谈、教研论文集、名师纪念集、名校成就图册等。
博客出书：个人博客作品集、网络专题作品合集、社区网文合集等。
旧书翻印：旧书急用少量翻印、书刊资料整编重印等。
电子音像：音乐、戏曲、录像摄影、光盘复制、磁带复制等。

另有：合作出书 常规出书 宣传推广 合作教材 录入排版设计 著作/署名/挂名/编著

出书类型：

A类：国内出版社出版，国家标准书号，可在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备案查询。
可在国内主渠道（新华书店等）发行销售。
B类：无书号出版，用于交流与赠送，不进入书刊发行渠道，数量一般在300册以内

基本价格：

- 1、大32开本：封面用250克铜版纸，赠送勒口，内文用70克蒙肯纸或胶板纸。200页印刷100本三千元，300页印刷100本四千元；排版、设计与增加彩页费用另行计算。
- 2、16开本：封面用250克铜版纸，赠送勒口，内文用70克蒙肯纸或胶板纸。200页印刷100本5千元，300页印刷100本6千元；排版、设计与增加彩页费用另行计算。

（注：A类型代理出版的书，1000册起印；所有书籍无论开本印量越大越便宜。）

服务流程：

作者来电说明书稿详情（如需要公司寄送参考样书）→公司报价→签约支付定金→电脑录入编排校对→报送出版社（如需正规出版）→出版社三审三校（如需正规出版）→邮寄样书→作者终审签字付款→回邮样书→印刷送书（附赠成书光盘）。

欢迎“组稿代理”与“项目合作”

目前，中国中产阶层不断发展壮大，传统文化精神逐步回归，民间文化、家族文化的搜集、整理与出版渐成热点；本公司大力开拓民间文化、家族文化的网络数字传播与纸质书代理出版业务。尤其自（学生出版网）（老人出版网）（人人出版网）（出版发行网）开办以来，深受离退休老人与各地文联、作协、民间作者、学校老师和家长的欢迎，每年代理出版作品近百余部；为方便作者就近洽谈与交稿，我公司设立“地方组稿代理”与“编辑出版分站”，请有写作经验与组稿能力的单位或个人洽谈合作。

服务热线：010-57223540 58426176 58608409

传 真：010—58608407 投稿邮箱：5805191@163.com

登陆网址：（人人出版网）www.rrchuban.com（自费出版网）www.51isbn.com

（老人出版网）www.lrchuban.com（学校出版网）www.xxchuban.com

公司名称：北京天禾佳诚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邮编：102218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立汤路188号北方明珠大厦三号楼1509室

A类出版套餐优惠
(新华书店发行销售)

32开1000册23800元起
16开1000册27800元起

A类出版作品展示



B类出版作品展示



让每个老人都有回忆录

让每个家庭都有家族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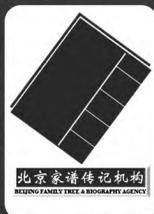
北京家谱传记机构由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家谱传记书店等实体与《个人出书网》、《家族文化网》等网站组成，机构致力于“个人文化、家族文化、姓氏文化”的产品开发与应用传播，提供“订制出书、采编创作、编写培训、家族文化堂设计制作、姓氏文化讲座与寻根游学”等特色文化服务。

我们的志愿是：让每个老人都有回忆录、让每个家庭都有家族史、让每个家族都有文化堂！

一千元起报名自传、家史、家谱函授班



三千元五十本起编印文集自传、家史家谱



服务电话：010—6892 0114 6252 5116

签约单位：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展示接待：中关村海淀图书城25号“家谱传记楼”

网 址：《个人出书网》 (www.grcsw.com) 《家族文化网》 (www.jzcswh.net)



北京回忆久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Beijing Memo99 Culture & Media Co., Ltd.

回忆久久
记录您的
真实人生故事

-  口述回忆录
-  画传回忆录
-  视频回忆录

咨询电话：400-688-9999

网 站：www.huiyi99.com

公司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歌华大厦B座11层1120室，邮编100007

欢迎踊跃报名参加“2013年‘回忆久久杯’老年书画、摄影展”。

详情请登录www.huiyi99.com；咨询电话400-688-9999

文革从华东局开始的三件史事

我参与起草《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两次长春之战与三位报人的命运

韦君宜：革命与知识分子的标本

蒋介石反贪枪毙孔祥熙亲信

读《古拉格：一部历史》

